

#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1  
2011. 10

## ◆ 學人專訪

- 1 萊頓大學講學記 / 吳展良
- 8 我的學習歷程——永懷師恩 / 呂世浩
- 14 我學歷史的歷史 / 宋家復
- 21 我的學思歷程——轉折與探索 / 許雅惠
- 25 《史原》憶往——走訪梁庚堯教授 / 梁庚堯口述，吳挺誌整理

## ◆ 學術小品

- 29 雲龍五井及相關聯之碑刻調查 / 楊偉兵

## ◆ 講論會 / 演講摘要

- 34 臺大歷史系講論會

## ◆ 回首·臺大夜歷史 / 進修學士班

- 37 一起記錄我們夜間部的四十年 / 甘懷真
- 39 韶光易逝卅五年——臺大夜間部歷史系憶往 / 胡平生
- 49 師友分享

## ◆ 校園展覽

- 56 國分直一藏書與標本文物展簡介

## ◆ 學術交流

- 60 浙江大學及杭州歷史文化遺產參訪紀要 / 李長遠

## ◆ 特別報導

- 68 2011 年臺大杜鵑花節「高中生旁聽歷史課程」活動心得

## ◆ 研究成果

- 77 臺大歷史系博士論文摘要（99 學年度）
- 80 師生編著新書簡介
- 83 99 學年度學位論文彙目
- 84 本系師生獲獎助及補助計畫

## ◆ 大事記

- 86 大事記（2011 年 5 月至 2011 年 10 月）

封面題字：葉國良

封面圖片：《回覽》第十二號「冬扇」目錄頁·借自國分直一家屬 / 臺大圖書館提供

封面設計：蔡偉娟

發行人：甘懷真

主編：陳慧宏

執行編輯：陳南之

編輯助理：蘇婉婷、劉昱妤、蘇聖雄

出版者：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電話：886-2-33664702

傳真：886-2-23620028

創刊年月：2008 年 10 月

刊期頻率：半年刊

歡迎投稿：history@ntu.edu.tw

定價：新臺幣 120 元

ISSN：2071-9825

GPN：2009703376

地址：(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chinese.htm

# 萊頓大學講學記\*

吳展良（臺大歷史學系教授）

## 荷蘭初體驗

2009 年 9 月中旬，應荷蘭政府的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之邀，我赴萊頓大學漢學系（Sinological Institute, Leiden University）講學一年。我與內人帶著小孩，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抵達史及普機場（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時，已頗有倦意，好在 IIAS 的人員特別包了一輛大車來接我們，解決了初來乍到所面臨的許多問題。車子在高速公路行駛了不久，便轉走地方公路。舉目四望，周圍遍布草地、牛羊、運河與各色建築，景緻非常優美，所走的路又頗為曲折，更讓我們對此大環境有一個難忘的初體驗。車行約 30 餘分鐘後，我們到達了一條周遭遍布樹木的小街。小街底是一條小運河，旁邊是一運動公園的入口，我們這一年將要入住的公寓，就在運河與公園入口旁。

我這次赴萊頓大學講學，主要係應漢學系施耐德教授（Axel Schneider，德籍）邀請，經過荷蘭的國際亞洲研究院、萊頓大學漢學系教授及臺灣教育部與臺灣大學同意而成行。雙方學校與教育部方面的手續都很順利，然而申請荷蘭政府「短期居留」的簽證手續卻非常麻煩，移民局本身問題也很多，

所以許多人都曾深受困擾。有些人甚至來了快一年，簽證依然有問題。我辦理簽證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波折，所以直到 9 月中才能抵達萊頓。

我們剛到的幾天乃至其後兩週，主要都在為基本生存奮鬥。萊頓不比臺灣一般的城市，除老城區外，住家附近極少有商店，更不要說餐廳。我們住在老城外圍的住宅區，一切採買都要靠步行與公車，頗為不便。萊頓城附近的人，平時都以腳踏車為主要交通工具。我們經過一番努力才弄到一臺腳踏車，生活能力因而大幅提升。然而一切的生活要靠腳踏車，其實也頗辛苦，我們之後還是買了一輛車。但荷蘭本地人不僅買菜、買東西，乃至接送小孩，一般都好用人力車，各種「運寶寶兼採購車」的設計，蔚為奇觀。他們的主流文化，長期以喀爾文教義（Calvinism）為基底，養成老百姓刻苦、勤儉、樸素的習慣，舉人力車文化可以觀其



▲萊頓市一角

\* 拙文本應擴充篇幅並及時交稿，但因 2010 年底以來，家中一直有人生病，難以完成。如今也只能匆匆寫其大略，希望讀者原諒。另外，初稿曾經編輯部仔細編校，特此致謝。



他。歐陸外來的居留人口很少，一切規定與作法均為本國人與歐盟人士設計，基本上是個封閉系統，而且各國的系統又很不一樣，要進入其系統的門檻非常高。除了居留手續，舉凡租屋、銀行開戶、上網路、買車等，若無接待機構及本地人的幫忙，基本上是辦不成的。在歐洲生活與美國截然不同，經過一番奮鬥，我們總算立定腳跟，可以進一步行動了。

### 萊頓大學與萊頓

萊頓大學位於護城河所圍繞的古城區中，離我住的地方騎腳踏車約十分鐘。大學的建築頗為分散，與民居揉雜，最主要的建築位於 **Rapenberg** 運河的兩側，多為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期的產物。其實歐洲各國的大小城市，尤其是其中心地帶，其建築風格往往保留或停留在其黃金時代。**Rapenberg** 運河兩岸，在荷蘭人心中，曾是世界上最美麗街道。兩岸早先多為貴族與富商的豪宅，而後逐漸轉變為大學相關建築以及一些高

級住宅。這裡的建築雖然講究，其風格依然表現出新教徒的樸實無華，與比利時、法國等天主教傳統區富麗堂皇的建築大為不同。荷蘭的建築多為兩層與三層，其房屋與街道均用磚塊砌成，與南部歐洲普遍用石塊大異。走在這樣式整齊樸實的磚砌世界中，分外能感受到荷蘭人節制而內斂的風格。荷蘭人的國民所得高於英法德等國，但民居及一切用品百貨均走儉樸風，房子小小、車子也小小，人人主要騎腳踏車，這不能不說有其特殊的文化堅持。

萊頓大學成立於 1557 年，是荷蘭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也是整體聲望及學術地位最高的大學。荷蘭王室的子女，尤其是王儲，依傳統都在萊頓大學求學，其重要性可見一斑。漢學系與國際亞洲研究院設於萊頓大學，並不令人意外。另外，首都的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也很重要，但在文法科方面，萊頓還是獨占鰲頭。荷蘭許多重要的文法科研究，皆起源於萊頓，漢學與亞洲研究也不例外。歐洲極重視傳統，一旦在某一地方有了突破性與重要的成就，往往就此形成傳統，並一路沿襲，其他人也會予以尊重。荷蘭的東亞乃至文法科研究，自然就以萊頓為主。

除了歷史悠久及學術聲望高，萊頓大學還有許多重要的特質，其中最值得介紹的，首推其新教徒的傳統及重視自由與寬容的精神。萊頓大學的起源頗具傳奇性。荷蘭獨立戰爭期間，萊頓市民奮力抵抗西班牙軍隊，遭圍城數月，城中死亡無數，卻依然不屈。解圍之後，領導反抗的奧倫奇王子



▲Rapenberg 街與運河



(Prince of Orange)問萊頓市民要選擇減稅或建立一所大學作為獎賞。萊頓人認為大學才能長久，於是選擇大學，從而締建了荷蘭第一所大學。因此萊頓大學自始便以追求自由、寬容與獨立自主為其基本精神。十六、七世紀時，歐洲許多國家迫害新教徒，荷蘭是他們尋求庇護的燈塔。英國的清教徒受英國國教排擠，萊頓市亦大表同情，清教徒在移居美國之前，曾大量移居萊頓，住了二、三十年，而後再轉搭五月花號去美國。市中心宏偉的聖彼得教堂，就是當年清教徒留下的紀念品。我去的那年10月3日，碰到萊頓解放紀念日大遊行，遊行的主題每年不同，這次主題恰好是「美國的開拓與文化」，從五月花號到今天的流行文化，令人印象深刻。不僅對於新教，十七世紀天主教對於學術的迫害亦非常嚴重，萊頓大學因而成為歐洲知識分子避難所與追求自由的堡壘，從而在學術上傲視全歐。萊頓大學設校早期，據說以培育新教宣道人員為主。後來逐漸發展，並充分重視學術自由，終成今日綜合大學規模。<sup>1</sup>

### 漢學研究傳統

萊頓大學的東亞研究創立於十九世紀前期，堪稱歐美歷史最悠久的東亞研究機構。除了東亞研究，大學還有南亞及近東研究，學門分類上均屬於人文學門中的區域研究 (Leide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 簡稱 LIAS)。其中東亞與南亞研究

又同屬亞洲研究學院 (School of Asian Studies)，經常有共同的活動。東亞研究院區在老校區的中心地帶，擁有一棟獨立的院館，是一個長方形、有漂亮屋頂的兩層樓建築。進門左手側，首先看到的是一個挑高透光的中庭大廳，經常有許多學生在其中讀書與討論。辦公室與老師的研究室環繞在大廳兩旁，彼此的溝通甚為便利。進門的右手側，則為萊頓大學引以為傲的東亞研究圖書館。這個圖書館的收藏以中日韓文為主，館藏質量在歐洲數一數二，除了擁有不少善本書外，於東西交流方面的收藏尤其豐富。館內中文書的收藏量雖然不如國內的圖書館，但使用起來非常方便，重要的研究用書幾乎都找得到，可見收藏得很精。館內的中文書最多，日文藏書亦頗豐富，韓文書則大為不如，這也反映了中日韓研究在萊頓的狀況。有關中、日的研究歷史起源甚早，學生也多。其韓國研究雖然也是歐洲最早起步，但規模與研究人數皆難與中、日研究比擬。



▲萊頓大學東亞研究學院大廳

<sup>1</sup> 萊頓大學目前共有八個學院，學生三萬餘人，教職員則約五千餘人。

萊頓的中國與日本研究開始於十九世紀前期，以設立經國王同意的教授職位為標誌。以設立教授職位代表一門學術的確立，這是一個重要的歐洲學術傳統，表示該學門有人可以達到學術上的嚴格標準，可以開始發展教學與研究了。萊頓的亞洲研究屬於歐洲最早的一批東方學專職研究機構，創立伊始，其研究便以區域文化為主，首重語文的訓練，並看重對所研究文化整體性的瞭解。這個傳統雖然在近年來開始受到美國專業學科化（disciplinary）研究趨勢的挑戰，他們卻依然以這個傳統為傲。

我有一次與院中的資深教授 W. J. Boot 談天，他告訴我，萊頓的日本研究始於日本的鎖國時期，當時外人無法進入日本，因此萊頓第一任的日本學教授是在馬來西亞學日文，為了達成目標，還必須同時掌握馬來文與中文，經過千辛萬苦，才能熟習東方的語言與瞭解東方文化。在此傳統下，萊頓日本學研究的眼光始終放在整個日本及其周邊文化，其目標則在於理解不同的文明。與此相較，英國與美國的區域研究往往起源於當年大英帝國或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的政治利益，他認為歐陸的區域研究才是真正為了科學的目的去瞭解其他文明的特質。在日本學系，沒有人專修歷史或文學，每一個學生都必須知道日本文化各方面的主要特質，並在此基礎上做更進一步的研究。Boot 教授所代表的固然是比較老一輩的看法，然而在凡事重視傳統的歐洲，這個看法依然有其深遠的影響。

萊頓的亞洲研究規模不小，聲名遠播，

堪稱歐洲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東亞研究機構之一。我有一次與普林斯頓大學的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談話，問他對於萊頓的看法。他說：「萊頓代表一個重要的學術傳統，我們視其為學術上同級的同儕（peers）。」作為歐洲的東亞學重鎮，不僅歐洲各大學，美國的許多名校也經常送學生到此處學習。

萊頓大學的研究與教學，一切由正教授決定。每一次教授出缺，都會向全世界徵求人才。然而如同歐洲其他的大學，萊頓亞洲研究院的正教授人數非常少，每一位教授所要負責的領域都非常寬廣，萊頓的聲譽與表現，也主要靠他們。歐洲的學風與美國不同，他們看重傑出的人才以及學術上真正有原創性的表現。一般學者就算各方面都表現不錯，若不能達到此境界，就終身無法升至正教授。漢學系的一位資深副教授曾對我說：「這裡只有教授是人類，我們都是動物，只能聽命辦事。」這話雖然有些言過其實，卻也可反映其組織結構的基本狀況。以漢學系為例，該系的規模在歐洲數一數二，全職教師有二十餘位，實際上卻只有三個正教授職缺，全系的發展方向完全由這三位教授決定。漢學系原有三位正教授中，田海（Barend J. Ter Haar）的專長是歷史與中國民間宗教及信仰，當時擔任漢學系主任；施耐德專長是中國現代史學史，對中國現代傳統派及國共黨史亦頗有研究，曾長期負責系務；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專長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他本人喜歡寫詩，很有藝術家氣息。我快走的時候，他當選萊頓大學區域研究（LIAS）的負責人。他們的年齡都在五十



上下，是學術上最成熟的時期。

這種菁英主義的作法，對每一個人而言，都構成很大的壓力。年輕學者固然必須拼命努力以證明自己的傑出，一旦升任正教授，更必須面對來自全世界的目光，一點都不敢鬆懈，以免辜負該職位所賦予的責任。我認識的院中教授，個個都是人才，每天均長時間工作，積極從事於教學、研究及行政。他們一般性的知識背景都非常寬廣，在專業方面則致力於原創性的研究，著作數量通常也頗驚人，確實優秀。歐洲的東亞研究圈子不大，彼此都認識。他們一則採菁英主義，一則重視彼此的交流與合作。合眾人之力，在各個領域往往都有突破性的成果，甚為學界所重視。

除了學術傳統與菁英主義外，萊頓大學還非常重視學生的培養與訓練。據系主任田海告訴我，他們的做法是重視語文、田野訓練以及研究方法（methodology）。大學生入學後，首先必須通過嚴格的語言訓練。他們發展出一套頗為自豪的語文教學法，有些優秀的學生在大三就可以開始讀文言文。另外，他們堅持學生要去華人社會待上一段時

間，學傳統文化的，他建議去臺灣；學當代的，他建議去中國大陸。我研究所課上的學生，全都去過大陸或臺灣，而演講課上的大學生，也有不少在積極做準備。至於研究方法，他們執行嚴格的科學研究方法，學生必須清楚地定義自己的題目及所採用的觀念，並系統化地檢視自己的論證架構及過程。換言之，即非常重視科學與哲學化的思辨過程。他說在此三項堅持之下，萊頓大學的博士，在世界上深獲肯定，人人都找得到工作。這在一位難求的歐洲學界，是非常罕見的現象。

### 異地授課

萊頓大學漢學系是全荷蘭唯一的漢學系。這是政府方面的決策，目的似乎在集中有限的人才與資源辦一個最好的學系。其他學校雖然也有與中國相關的課程與教授職位，但全荷蘭的高中畢業生若要主修中國相關研究，就必須到萊頓。這個政策確保了荷蘭漢學研究及教學的水平，看來頗為成功。

漢學系的全職教師除語言教師外，還有許多位教授不同領域的講師及副教授，加上客座教授與相關領域教師，開設的課程不少。至於世界各地來的學者與各界人士所作的演講與活動更是豐富，令人目不暇給。

我在萊頓漢學系第一學期開設「中國現代的反啟蒙思想專題」（Seminar on The Counter-Enlightenment in Modern China），屬於研究所的課程。學校是9月1日開課，因為簽證問題，我9月中旬到萊頓時，已經上課兩週了。本來擔心遲了兩週，學生會不會不來修課，結果通過郵寄課程大綱及參考



▲萊頓大學人文圖書館外景色





讀物之後，竟然還有五位學生。據說比該系一般研究所專題課程的人數還多，使我大為寬心。

萊頓的學制一年分春秋二季，秋季班十二月中旬便結束，一學期實際上課時間約 13 週（含補課），所以課程非常緊湊。荷蘭人的習慣是凡事講求本質，處處認真投入。他們的假期很長，玩得熱烈而花樣豐富。但一開學後，便緊鑼密鼓，每週要閱讀與寫作的功課很多。這裡課程的進度非常快，每週教學必須有明確而直指問題核心的主題，參考讀物每週以英文 60-80 頁加上中文 15-20 頁為度，學生一般都會唸完指定教材再來上課。上課的方式頗為自由，由老師自行決定，我通常演講 1 小時，再討論約 40 分鐘。

萊頓大學漢學研究的學生來自全歐洲乃至全世界。我的班上有一位荷蘭人、一位義大利人、一位羅馬尼亞人、一位歸化美國的俄國人及一位大陸人。課堂討論時，大家經常提出不同的看法，甚為有趣。萊頓研究所規定一律用英文授課，連本國教師教本國學生也不例外，這顯示荷蘭重視國際化的決心，與法、德等國的做法大為不同。學生的英文都還不錯，但是腔調各異。我班上的大陸同學來自北京大學，讀、寫甚佳，但口語方面明顯不足。

我這門課企圖處理中西思想交會時所產生的一種基本衝突，一學期下來，效果似乎還挺不錯。學生偶爾還會推薦一些認識的同學來旁聽；對於期末報告，更是非常認真。課程完畢之後，五位學生，除了一位必須次年畢業的研究生外，全部請我當他們畢業論文的指導教授。其中一位義大利學生，

還介紹一位他的同鄉好友來跟我寫論文。系主任對此現象非常驚訝，說是前所未有，在下學期的開學酒會致詞中，還開玩笑地說我搶了他的學生。

我在萊頓的第二學期，開設「中國近世道學史」(Neo-Confucianism from Song to Qing)。來修課的學生很多，使系方大感意外。這是大學部高年級課，學生都是荷蘭人，包括少數的華裔荷蘭籍學生，也有幾位上學期的研究生繼續來旁聽。每週指定英文教材約 50 頁，參考教材也有 50 頁，沒有中文教材。上課方式以講授為主，但每次上課留有 20 分鐘左右的時間讓學生提問。每個學生要做一次 8 分鐘左右的課堂報告，期末要考試，並交一份期末報告。透過這門課，我企圖建立對於近世道學史的發展與性質之現代詮釋，成效似乎也還不錯。學生反應頗為熱烈，同時有兩位學生請我指導他們的畢業論文。

此外，2010 年 4 月中，應該系博士生所主辦的學術講演會邀請，我在該系做了一場演講，講題為「生命與理智：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儒家」(Life and Reason 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With Focus on Liang Shuming and Modern Confucians)。聽眾的反應也很好，討論的時間據說破了紀錄。

我這次去荷蘭，首先要感謝施耐德教授的熱情邀約。然而我到的這一年，他因接受新教職而離開萊頓，自然有所不便。所幸田海教授十分照顧我，多次主動協助及詢問我的狀況，使我在教學與研究上都能順利進行。與此同時，施耐德教授也一直與我保持密切聯繫。他離開萊頓，回德國的哥廷根大



學（University of Göttingen）重建該校的漢學系，一年之內便開拓了許多新職位與領域，非常有建樹。過新曆年期間，他特別邀請我去他在哥廷根的新家共度假期，並於 2010 年 7 月邀請我去該校漢學系演講，講題為 “In Conflicts with Western Rationality: A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哥廷根大學有極優異的科學、法學乃至人文傳統，十八、十九世紀在數理方面幾可說領先全球，二十世紀曾出過許多諾貝爾獎得主，以及胡賽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哈布瑪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文大師，是以該校也成為我這次考察的重點之一。

施耐德教授在這段期間，聯合萊頓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日本東京大學哲學研究中心合辦「民族認同與歷史意識：審視近現代日本與中國的歷史學與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 年 12 月 14-18 日），在復旦大學舉行。我於會中發表了〈晚清思想的「生元主義」與反啓蒙傾向〉一文。

另外，我在 2010 年 6 月中旬還應國際亞洲研究院（IIAS）的要求與資助，在萊頓主辦了一場「反啓蒙與現代中國」的研討會，共有八位講者與三位評論人參加。講者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臺灣與荷蘭，評論人則來自德國、法國與荷蘭，多為資深教授。研討會為時一天半，論文八篇，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此問題，討論則熱烈而深入。會後臺灣駐荷蘭代表處，由劉融和代表領軍，還特別為我們舉行了盛大的晚宴。

寒暑及春假期間，我分別參觀了德、

法、比利時、奧地利、丹麥、瑞典諸國的一些古蹟與名勝。平常假期，我也經常帶著家人參觀本地的風物。實際的生活、教學與參訪，使我這一年對於歐洲的歷史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入體認。我們以前看現代化，總以為這是西方許多優秀的有形制度（含政府體制、法律、資本主義制度）及學術、思想的結果。來此居住與考察後，才發覺歐洲現代化其實是他們「生活方式」不斷演進的結果。而此生活方式，則是長期而複雜的歷史與文化所造成的一種社會整體運作方式。各國不同，卻共享一些極重要的歷史遺產，彼此不斷競爭與相互影響。學術、思想及有形制度還可以學，「生活方式」則實在無法移植。我因而對於東方社會與文化的現代化問題，又有了嶄新的認識。

學校課程結束後，研究生與大學部的指導學生仍忙著寫論文。在荷蘭，畢業論文要求的篇幅不大，但過程嚴謹而緊湊。從第二學期初便開始，其題目、大綱與內容均需經過反覆修訂，原則上半年寫完。我一路指導到回國前夕，幫助他們全體順利畢業。2010 年 8 月 20 日返抵國門，結束此次講學，隨之開始新學期的準備工作。



▲東亞研究學院外觀



# 我的學習歷程——永懷師恩

呂世浩（臺大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編按：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新聘呂世浩、宋家復與許雅惠三位老師為專任助理教授。

呂世浩老師，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北京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系博士，專長領域為史記研究、上古秦漢史及歷史考古學。宋家復老師，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歷史學博士，專長領域為宋代史、資治通鑑。許雅惠老師，耶魯大學藝術史系博士，專長領域為中國青銅時代的考古美術、宋代物質文化。本刊特邀三位老師分享其求學以至為人師表的心路歷程。

很榮幸也非常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在我的母系刊物——《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中，談談我的學習歷程。作為一個歷史人，有時候反而是自我的歷史最難講得好。在這裡，僅能就我求學過程的一些經驗和感受，希望藉此機會提供讀者們參考。

我是在 1991 年進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就讀的，進臺大是我長久以來的夢想。但為什麼當年會選擇歷史系呢？這大概和我小時候一件偶然的事情有關。

我從小就喜歡看書，喜歡看各式各樣的書，包括自然百科、人文圖書，甚至是小說、漫畫。但小時家中貧困，沒什麼錢買書，為了在書店白看，或是向別人借書，遭到白眼相待，是常有的事。在我小學二年級時，一次陪母親去市場買菜，途經一家小書店，在

我央求之下，母親終於答應讓我買一本 20 元以下的書。還記得當時一本最便宜的《機器貓小叮噠》漫畫，定價都要 25 元，最後我挑了很久，終於才在店中找到一本 20 元的書，那是一本文白對照的《古文古事》。此書陪伴我多年，反覆閱讀。如今回想，大概從那時開始，就種下我對古代史和文言文的興趣吧！

進入臺大歷史系後，我遇見了許多好老師，或學養深厚，或豁達大度，或平易親和，或熱心助人。舉個印象深刻的例子來說，在我大四那年，有位馬來西亞的僑生同學，本來已經高興的考上了研究所，卻在臨畢業前才發現自己學分不夠，心急如焚。當時的系主任古偉瀛老師努力奔走張羅，想盡辦法為他找到暑修補救的機會，他最後才能順利進入研究所就讀，近年聽說他已在馬來西亞找到不錯的大學教職。

而我在大三那年，遇見了改變我一生的老師，也是我後來臺大碩、博士班的指導教



▲2002 年攝於敦煌河倉城遺址前

授阮芝生先生。還記得開始聽阮老師的「史記」課，第一印象便是「望之儼然」。阮老師是個待人與待己都極其嚴格的人，不管是在為學或做人方面，他的眼中容不得一點含糊不清的事物。可想而知，這對學生來說壓力是非常大的。

當時一心想要上好阮老師的課，我不斷加強培養自己。為了厚植國學基礎，甚至每晚到校外書院聽課學習。而正因為阮老師的嚴格，這段時間成了我進大學以來成長最為快速的時期。還記得考上碩士班後，我拿了自己的一篇論文去請老師教正。結果兩天後，阮老師把我找去他家裡，從題目名稱開始罵，一直罵到結論，文章上密密麻麻全是老師批改的字樣，足足罵了我一上午，然後要我拿回去改，改好再來找他。過了幾個月，我把老師交代要看的書都看了，論文也改好了，再去見阮老師。老師又看了兩天之後，再找我去罵，這一次罵了兩個多小時，一樣批改無數紅字，要我回去改好再來找他。就這樣，我碩士班的第一篇文章足足被罵了五次，改了將近兩年，阮老師才終於點頭說：「可以了，這篇文章合格了。」這就是我後來讀博士班一年級時，發表在《燕京學報》新九期（2000年11月）的〈三王與文辭——《史記·三王世家》析論〉一文。

《燕京學報》是極為嚴格的期刊，能夠以學生的身分在上面發表文章，對當時的我是莫大的鼓勵，也堅定了我日後走向歷史研究道路的信心。看到現在很多在碩士班就大放異彩的年輕同學們，我常覺得自己並不算是天資卓異的人，能夠有今天，都得拜老師的嚴格教導之賜。

事實上，和阮老師相處久了，便會覺得老師「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他對學生的栽培，是全方面而不遺餘力的。在我的記憶中，這十多年來，不管在為學或做事上，遇到了任何問題去請教阮老師，老師一次也沒有敷衍過我，總是極其認真的，總結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經驗來回答。

在研究生的階段中，我也曾長時間擔任阮老師的助理。正也是在那段時間裡，我從側面不斷學習老師如何讀書、蒐集資料、選題、寫文章、備課以及辦理各種學術事務的方法，同時更便於時時向老師請益。這使我的學習歷程更像是傳統的師徒制，大大彌補了現代大學制度設計的不足。我覺得對歷史系同學來說，除了上課和論文寫作外，擔任老師的助理其實是一種非常好的學習方式。我希望學弟、學妹們，如果有這樣的機會，千萬不要敷衍以對或斤斤計較，而是要認真把握，好好學習系上老師們的優秀本領。

1998年碩士班畢業後，我曾有一年的時間擔任阮老師的專任助理。就在那一年，我遇見了改變我一生的第二位老師，也就是徐蘋芳先生。徐蘋芳先生是眾所公認中國考古學界的第一流學者，他曾在1999年接受本系的邀請，來系上擔任一學期的客座教授，徐老師和我的初識便是在臺大客座的這段期間。由於阮老師常常鼓勵我多聽其他老師的課，而他對徐先生之為人與為學一向推崇，因此素來仰慕先生的我，便立刻把握機會前去旁聽，從此啟發了我對於中國歷史考古學的認識。

接觸過徐老師的人都知道，先生待人極為溫和謙遜，但在學術上卻非常嚴謹認真，



因此上徐老師的課是一點也不輕鬆的。先生當時開的課是「中國考古學」，整個學期分為十多個專題講授，全面而深入的介紹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成就。先生上課沒有講義，沒有 PowerPoint 或其他花俏的教材，有的只是長篇的參考書目和極為精彩而充實的授課內容。先生博學多聞，又長期在第一線進行考古工作，上課內容除了豐富的考古知識外，還融入了許多個人長期從事考古工作的體悟。上課從鐘響開始，便如行雲流水一般接連講授。當時在講臺下的我，唯恐漏掉任何一句，只能奮筆疾書，拚命抄筆記。第一次聽完先生的課後，印象最深刻的是那酸痛的手指，和滿是開啓另一扇學術之窗的興奮之情，心中想到的只有當年孫中山初次赴美後的那句感言：「今日始見滄海之闊！」

徐老師和阮老師相同，除了學術研究外，更重視後進的品德修養。前面提到，我曾將自己的第一篇論文〈三王與文辭〉投稿到《燕京學報》，其實我原本想投到《臺大歷史學報》，但阮老師當時正好擔任主編，因此立刻要我迴避。《燕京學報》是學界公認的第一流學術刊物，當時貿然投稿，只能說年少的我血氣方剛，初生之犢不畏虎吧！結果過了半年多以後，大約是徐老師來臺後的學期中，有一天先生忽然約我見面，見面後和我談這篇稿子，我才知道原來當時擔任《燕京學報》副主編的正是徐先生。

徐老師對我文章的論點十分讚許，但指出文中對前人的錯誤往往多加指摘譏刺，這樣的態度是不宜的。先生對我說，前人的錯誤往往根源於時代的侷限性，錯誤固然要講

清楚，但心態應該寬容，不宜過多苛責。我年少家庭窮困，因此心中憤世嫉俗，但先生的那一番話確實點醒了我，促使我開始思考用另一種態度去看待世事。更讓我感動的是，先生當時和我足足談了一下午，理直而氣和，義正而辭婉，苦口婆心，諄諄教誨。

我常想，我的人生中最幸運的事就是能一直不斷遇上好老師。以阮老師和徐老師的學識和地位，他們大可不必花如此多的時間，在像我這樣沒有背景、沒有淵源的窮學生身上，但他們卻如此做了，而且始終如一。在兩位老師的身上，我看到了學者不遺餘力栽培後進之心，這也真正感動了我的心。

徐老師在學術上的畢生願望，便是能將歷史學與考古學加以結合。他所以在歷史學系開授考古學課程，也是這個用意。因此先生當時和我談論那篇稿子，更希望我能結合出土文獻和考古成果，讓論點更加堅實。先生當時幫我開了一連串的漢簡書單，特別是魯惟一（Michael Loewe）和永田英正的書，要我細心閱讀。先生當時跟我說，年輕人要厚積薄發，我由史記研究跨足漢簡和考古，固然會使文章發表時間要延遲許多，但對我的將來絕對是有益的。後來我足足花了半年多的時間，閱讀了相關書目（尤其是魯惟一的原文書，臺灣當時很難找到，後來蒙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邢義田先生慷慨借閱。但當時年少無知，卻是借了很久才還，對邢先生實在萬分抱歉），其間不斷向徐老師請益，徐老師總是耐心以對，認真回答，從不因我的淺陋而有任何責怪之意。到了徐老師客座任期結束，要返回北京前，先生特地送了我一





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並勉勵我好好努力。

1999 年考上臺大歷史所博士班後，有一天我讀到一篇報導，文中提到目前秦漢考古出土文獻的總字數，已經超過傳世文獻，而且兩者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當時我在阮老師的研究室中，讀後深深地嘆息。我開始意識到，在我們這一代學習上古秦漢史，已經無法迴避考古了。而且這更讓我深信只有歷史學和考古學的結合，才是 21 世紀上古秦漢史研究的未來。

我的個性一向是要就不學，要學就想學別人的真本領。因此我在碩士班時，選擇了阮老師最擅長的《史記》，做為論文題目；而既然想學考古，我就希望學到如何正確使用第一手的出土史料，而不是只能仰賴閱讀考古學者的二手研究。所以當時我立志排除萬難，必要到中國考古最好的大學去學習，並參與完整的考古發掘工作。

要做這樣的決定，在當時有許多難處。主要是我在經濟上很不寬裕，而除了旁聽和修習過人類系的幾門課外，更非考古科班出身。但當時的我，不斷想起小時候在《古文古事》中讀過的一篇故事：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再怎麼沒錢，我想我都比「一瓶一鉢」要強，「有為者亦若是！」就這樣，我下定了要去北京大學學習考古的決心。

但對我來說，最難的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如何跟一向關愛栽培我的指導教授開這個口，說我要再投他師。就在那天中午，阮老師和我吃過飯後，在椰林大道上漫步聊天，我鼓起勇氣向老師說這件事。阮老師聽後愣了一下，和我在椰林大道旁坐下來，出乎我意外的是老師竟然大加贊成，並對我諸多勉勵。後來我去北京大學的推薦信，便是阮老師和臺大人類學系的黃士強老師幫我寫的。

就在 2000 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系博士班，並幸運地成為宿白和徐蘋芳兩位中國考古學大師的學生。在臺大辦理休學後，我隨即遠赴北京大學求學，去陌生的城市研讀一門陌生的學科。剛到北京，有許多事情都不太能適應，徐老師特別要我到他家去，那是一間位在東四九條胡同的傳統房屋，古意盎然。還記得在滿壁書香的客廳裡，先生親切地對我說：「你到北京來求學，只要心中有任何不愉快，或是遇到任何困難，都不要客氣，即使是再小的事，都可以告訴我。有的時候，人心中有事就容易鑽牛角尖，只要有人談談就好了。」徐老師是一位真正的良師，他對學生的關懷，從這許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來。

徐老師唯恐我受學界浮躁的風氣影響，有急於求成的心態，當天中午請我吃飯，就認真告誡我：「世浩，你做我的學生，我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那就是一輩子不許寫和人商榷的文章。」後來我才體會先生的深



## 學人專訪

意，學術貴在正面立論有所貢獻，不在找人毛病以爲高人一等。還記得那一天，先生屢次的跟我說：「世浩，要切記，大器一定要晚成，厚積才能求薄發。」

徐老師十分喜好美食，時常帶許宏師兄（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和河南偃師二里頭考古工作隊隊長）和我去北京不同的名菜館嘗鮮。在輕鬆的氣氛下，不斷關心著我們的學術和生活情況。席間先生總要我談談對大陸的各種感想，有時年輕的我忍不住大放厥辭，先生總是面帶微笑認真聽我講完，然後一一對我的意見提出看法，令我受益良多。例如有一次內子到北京找我，徐老師請我們用餐。席間我對先生提到北京大學的學生有一種「較真」的風氣，校園中處處可以看到同學們爲了彼此一點學術上的不同見解，當眾爭得面紅耳赤。先生聽了笑著說，北京大學從以前就是窮學生唸書的地方，窮學生特別認真，不像燕京大學，盡是公子哥兒。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先生在生活中展現的儒雅風範和在學術上的認真精神，正是因爲他一人繼承了兩校的傳統，身兼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二家之長的緣故。

在北京大學念書期間，我接觸了許多優秀的老師，從他們身上學習到非常多的東西。但讓我印象最深也啓發最大的，還是在河南偃師二里頭農村三個月實習的日子。

二里頭是中國考古的聖地，它不僅是極爲重要的上古王朝都邑遺址，更特別的是，當地地層的疊壓打破情形非常複雜，是田野發掘難度極高的工地。其實二里頭並不是北京大學的考古工地，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

古研究所的工地。我想徐老師特地安排我去那裡實習，主要有兩個用意：一是希望田野經驗非常豐富的許宏師兄能代師授藝，帶領我學習田野考古；二是正由於二里頭的發掘技術難度高，才有磨練我的機會。在這段農村的歲月裡，我除了天天考古工地學習外，更認識了中國歷史真正的基層——農村和農民，這對我看待歷史的方式產生重大影響，是在北京等大城市生活絕對無法感受的。

2002 年，因爲我的畢業論文實習，需要用到大量未發表的懸泉置出土漢簡，徐老師特地親自陪我到蘭州的甘肅省考古所去。還記得當晚在房間聊天，談起先生剛故世的好友，也是國際知名學者張光直先生發掘商丘的事。先生提到他原本建議張光直先生合作發掘的地點是河南偃師二里頭，因爲他覺得那裡最有考古潛力，也最能做出驚人的成績。以 2001 年後二里頭豐碩的考古成果來看，先生的看法無疑是無私而正確的。但張光直先生當時不同意，堅持要發掘商丘，先生力勸無效，而最後發掘的結果並不理想。先生說起此事時十分悵然，因爲張先



▲2001 年春季，與二里頭考古工作隊合照，後排右二為筆者。

生與他多年朋友，卻因此而生嫌隙。但先生對我懇切的說：「我不能害朋友去做一件明知沒結果的事。」這讓我學習到先生對朋友的情義。

在甘肅實習期間，我幸運的獲得了曾參加居延新簡整理工作，並主持敦煌懸泉置發掘的何雙全老師的細心指導。在那三個月裡，何老師不僅作為我學習簡牘和考古的良師，他和師母對我這樣一個異鄉遊子，更像親人一樣照顧，至今感念不忘。後來因為何老師的引介，我還參加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簡牘研究班的敦煌居延考察旅行，更令我大大開闊了視野。

回到臺灣後的幾年，經歷了無數的轉折，先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的獎助，後來又到故宮博物院器物處任職。在這兩個機構，我幸運的承蒙邢義田、鄧淑蘋、嵇若昕等老師的教導，也得到朱林澤等前輩的照顧，還結交了許多好朋友，這些都讓我感念在心。

2011 年 2 月，我非常幸運的回到母系任教。當我打電話把這個消息向徐蘋芳老師報告時，徐老師非常非常高興，和我約定 8 月要在北京再會。沒想到 5 月時先生過世的噩耗傳來，竟是從此天人永隔。

回想徐老師一生，都在為學術、為大眾服務。我最常聽先生說的一句話便是「這是我應該做的」，而先生確實做到了將一生奉獻給中國考古和文物保護事業。他一方面為保護歷史文化名城，四處奔走，八方呼喊，得罪了許多官員和富商。另一方面，卻對一生所經歷許多波折和坎坷，時時心存感謝。徐老師常教誨我應與人為善，先生說他的一



▲2002 年與何雙全先生（左）攝於懸泉置遺址

生常因此而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受人幫助。當先生故去的消息傳到臺灣，就我親身耳聞目睹，認識先生的學者，無論社會地位、政治立場、學術派別，無不感懷傷痛，在今日多元的臺灣，這是何等難得之事，這完全是先生的人品道德力量所致。子貢曾贊美孔子所以得道多助，是因為「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每當回想先生的音容笑貌，我都會想起《論語》中的這句話。對我來說，先生一生的待人接物，正是「溫、良、恭、儉、讓」五字最具體的呈現。如今泰山已頽，哲人其萎，空留典型。馨香上禱，悲不自勝，僅借此文，聊表弟子景仰孺慕之情。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善歌者，使人繼其聲」，我能夠有今天，完全仰賴母校母系和諸多老師的栽培。師恩深重，永誌不忘，我希望能夠在未來的人生歲月，將我的所學奉獻給臺大歷史系，以回報老師們對我的關愛和提攜，讓母系在學術和教育上能夠日益昌盛，這是我衷心所願。

（2011 年 9 月 28 日教師節初稿，2011 年 10 月 4 日先師徐蘋芳先生 81 歲冥誕完稿。）



# 我學歷史的歷史

宋家復（臺大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這不是一篇「我的學思歷程」之類的自傳文稿，敝人在下的年齒、德位、學行各方面都不夠資格，這種題目要保留給院士、校長、院長或榮譽教授等級的前輩學者去做，才會實至名歸。題目「我學歷史的歷史」，其實是故意玩弄一點文字遊戲——一方面是「『我學歷史』的歷史」，說明我誤上歷史學門這條「賊船」的過程經歷，另一方面則是「我學『歷史的歷史』」，涉及我碰巧在這條「賊船」上搖搖晃晃、不知不覺地進駐到了史學史這個專門艙房裡。其實我真正想講的是後者的意思，但是因為這兩者不論就邏輯上或發生學上的關係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割，也就是說，要想解釋後者，就不可避免地必須談到前者，所以我才會甘冒僭越的罪名，在以下若干必要的地步，略微提及我自己讀書求學的過程，所想要分享的，往往也不過是些卑之無甚高論、毫無示範足為效法的意味可言。以上是定下這個有點拗口、誇飾的雙關語標題後，必須要先聲明清楚的。

退一步說，雖然我的年齒、德位、學行各方面都不夠資格來講「『我學歷史』的歷史」，但是我的確有兩點的優勢，讓我可能比絕大多數前輩學者們都還有資格來試著講講這個題目。第一、跟院士級的前輩學者相反，在學術界的金字塔結構裡，大概再沒有比我身為剛開始教書第一學期的助理教授更接近各位同學的位置了！整整一年以

前的現在，我還不過是一個研究所的學生，要到 2010 年的 5 月底，我才領到一紙博士學位畢業證書（還看不懂，因為哈佛大學畢業證書是拉丁文的），正式地告別我的學生身分。第二、我的博士班求學生涯（1994-2010）整整延續了十六年！如果再加上之前在臺大念碩士四年（1988-1992）、大學本科四年（1984-1988），扣掉當兵兩年，前前後後我總共在大學裡當了二十四年的學生！俗語說人生理當「活到老、學到老」，我的人生則是事實上從懵懂少年當學生當到了心寬體胖的中年，累積了這麼多年的學生經驗，難以自棄，所以在陳慧宏老師邀請之下，表面推辭、其實內心暗自竊喜地答應（有人要聽我累積二十四年的牢騷？），樂意與系通訊的讀者們分享一下這些年來的甘苦辛酸。

以下內容，部分是在十六年的博士求學（六年海外修課、九年在臺灣寫論文、中間曾返回美國任教一年）即將告一段落的時候，有感於人生能有幾個十六年呢？撫今視昔，不禁反省這些年來讀書寫作的歷程與思慮，進行的一番內心的自我對話。這篇短文最早是英文稿，寫給關心的師友看，之後用中文增補轉寫幾次，為自己留個紀念。至於對學術教育未來有所惕勵，則吾豈敢？一切還是要由博士論文〈龜鑑之間：十一世紀中國的史家與史學〉講起。



\* \* \* \* \*

我的博士論文是藉著書寫過去史家如何書寫過去來克服我自己。( *My dissertation is writing about the past writing on the past to overcome myself.* )

\* \* \* \* \*

首先，我的博士論文是關於書寫的書寫，因為我在書寫。無論我們喜歡與否，現今幾乎無法想像不寫一個叫做博士論文的文本而能取得博士學位(少數藝術科系或許可以用作品代替)。不從事學術寫作而能在當下安身於大專教職更是困難，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話。「出版，否則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早已是老生常談，但這至少是針對那些已經擁有職位的人。對於所有學位候選人來說，「我寫故我在(I write, there I am.)」，庶幾乎更逼近殘酷現實。除非一個學者書寫，要不然他／她在如今的學院中實際上就等於隱形不見。

(Publish or perish!)」早已是老生常談，但這至少是針對那些已經擁有職位的人。對於所有學位候選人來說，「我寫故我在(I write, there I am.)」，庶幾乎更逼近殘酷現實。除非一個學者書寫，要不然他／她在如今的學院中實際上就等於隱形不見。

問題是，我一直是個龜速的書寫者，可能同時寫的也很糟糕，但龜速是確定無疑，耗費近十年才寫出博士論文這個事實，已經說明一切。就此而言，書寫博士論文不僅僅意味著滿足取得學位的部分必要條件，更進一步代表了我個人想要克服自身寫作缺點孤注一擲的嘗試。當各章節的主題在漫長研究寫作過程中逐漸浮現出來的時候，在某一個時間點上，我突然意識到所有論文中所處理的宋代史家都是多產作家。也就是說，我無意中(或者潛意識地)將我自己拋擲進入一個作家群的世界，他們的書寫生產力之

高，是我這輩子連作夢都到達不了的程度。我多年以來始終好奇人們為何寫作，好奇的原因正是因為我不好寫作。既然我無法在論文裡囉哩囉唆訴說著我為什麼不愛寫作然後以此取得學位，但至少可以換個正面思考的角度，試著去瞭解為什麼其他人寫作，尤其是在某些例子裡，為什麼有些作者會在一本書上花上十年或十年以上的功夫！(司馬光《通鑑》、蘇轍《古史》都超過二十年，歐陽修《五代史記》從三十歲改寫到六十六歲過世，《冊府元龜》只用了八年，但那是二十三位一流學者團隊合作的成果。)

對我來說，書寫一直是個謎團，不論是現代或者古代的。很明顯的，四處詢問我的現代學界師友們為什麼長期筆耕不息(或者永遠苦陷在寫作瓶頸之中)，並不符合社交禮儀，所以我只好將問題意識轉移到古代。當我的博士論文寫作計畫在2000年起始的時候，舞台本來是設定在南宋初期的十二世紀。經過兩年的嘗試錯誤之後，我終於不得不向自己承認：不先瞭解前一個世紀的史學界發生了什麼事情，不可能把十二世紀史學發展說清楚。我猶豫，因為這個轉進，意味著我必須放棄兩年多的閱讀準備，幾乎等於另起爐灶，但是我知道除了向前推進一百年，別無選擇。理由如下。

《資治通鑑》的出現無疑是第二千紀裡中國史學史上最重要而影響深遠的事件。從史學的角度來看，關於《通鑑》及其後續系列史學著作至少有三個故事可以講。第一個是接受史的故事，將各種後續著作視為提供



閱讀《通鑑》(作為經典文本〔master text〕)在時空中展開之多元可能性。第二個是追溯《通鑑》如何成為一個經典文本的過程，主要是在十二、三世紀，這是一個晉封科典(canonization)的故事。第三是個史學史脈絡化的故事，亦即將《通鑑》與其他同在十一世紀中國產生的史學作品等量齊觀，進而理解他們各自在當時可能存在的史學意涵。這三個故事以複雜的方式彼此牽連，但是一次只說一個仍然可行，而且很可能比較清楚。我原先的南宋初年計畫引導我注意到第二個故事，之後我才意識到第二故事不容易說清楚，除非照順序先釐清第三個故事。

經歷了這個痛苦的轉折之後，我的博論逐漸聚焦於一群十一世紀北宋中期的史學家和他們的重要史學作品。很大程度上，這群我所書寫的十一世紀宋代史家和史學彷彿是「我意向投射的切身他者(my intended significant others)」。他們與我1994年進入哈佛大學念博士班之前與之後的生活切身相關(significantly relevant)。就自傳歷程而言，從1984年嚮往史學通識，以第一志願考進臺大歷史系，1989年懵懂走上追求跨文化自覺的近世中西思想史學研究，到1996年在哈佛修習用英文講寫宋代史學seminar，這三個轉折終於將野馬塵埃的我聚焦到了一個特定的範圍——傳統上所謂的史學史，但是我偏好將其擴大稱之為「歷史書寫學」。英文historiography一字至少可以有四種不同的意思與譯法：(1)在日常學

院美語中，泛指對特定領域或課題既有研究成果與基本史料回顧的概括用法，可稱為「研究文獻」；(2)對古往今來史學名家、名著的探討，大致相當於現代漢語中「史學史」的範疇；(3)當它指的是各大文明傳統中由來已久、對編纂史書體例與技術程式的論述時，「歷史編纂(學)」比較接近原意；(4)當這字在比較具有理論意涵，或者說，在所謂「語言學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觀照下的語境中的時候，我把它譯成「歷史書寫(學)」，關心的焦點則是書寫者之位置(positionality)、書寫本身作為一個事件(writing as an event)、文本及其脈絡(text and its context)等問題。這四者當然並不完全互斥，在使用上也常有語意重疊的狀況，但一旦打開了視野，在實際操作上，「歷史書寫(學)」研究是可以和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甚至廣義的文學(化)批評通盤考慮、相互為用的。

在博論中，我同時也刻意運用研究對象與我之間千年的時間差距作為「自我他者化」的一種策略，亦即，將十一世紀宋代史學建構成為與我們現今史學實踐相對照的天際視域。至少乍見之下，宋代史學界與現代史學界之間的差異是明顯到足以稱之為「他者」而當之無愧。十一世紀宋代中國是沒有大學歷史系這種東西，當時任何人也無需寫本叫做博士論文的勞什子才能獲得社會認可成為高級歷史教師，沒有專題討論課、沒有歷史學位、沒有長期聘約、沒有註腳、沒有學術會議、沒有教授分級、沒有國





科會補助申請、沒有匿名審稿……，幾乎所有現代史學界通行的制度習慣都不存在，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宋代的確有針對過去的歷史書寫。「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己的歷史書寫者（“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當時不僅僅是個令人嚮往的口號，而且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選項。在成為一個歷史書寫者的路上，制度性的路障，或者阻礙，在宋代並不存在，至少表面上看來似乎如此。業餘素養甚至還不一定就被輕易認定是業餘素養而已，因為當時是否有相對照的史學專業都還在未定之天；做一個民間學者也沒什麼不好，只要那時還沒有頂著博士、教授頭銜的所謂專家學者扮演太上權威四處嚷嚷。

我之所以會這樣問宋代史學這些問題，是因為西方也不是開天闢地以來就有「歷史學」（含學科、學家）存在的！Hayden White 在 1993 年 2 月 5 日接受 Ewa Domanska 訪問時就曾指出：「我一直就對人們為何研究過去比較感興趣而不是研究過去本身……，一個社會會有研究過去的專業人士是很奇怪的……。許多文化並沒有這種現象，為何西方產生這樣的專業？直到十九世紀早期，大學裡並不教歷史。從前歷史並非大學裡的一個教研主題，也沒有歷史教員和科系。……歷史是人人可寫之事。你無須寫一本論文然後取得執照去從事史學。」A. D. Momigliano（1908-1987）也曾指出，“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idea that one could write a history of Rome which

should replace Livy and Tacitus was not yet born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Both in Oxford and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was taught in the form of a commentary on ancient historians.”（見其“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一文，收於他的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書中。）

不過，這樣一來，宋代史學世界聽起來像是個現代學術界棄卒的天堂！但真是這樣嗎？宋代真的沒有任何史學建制或機構嗎？即使沒有現代職業史家所經歷的制度性壓力，那些北宋史家們在從事漫長認真的歷史書寫操作時，難道真的沒有任何行規準則必須要遵循嗎？除非十一世紀的史學境況是個徹底無政府狀態，那時一定有某些超乎恣意混沌的論述型塑規律存在，值得進一步研究。雖然我個人私心是希望所有史學工作者永遠不用受到任何截稿或者學科規訓壓力，但是我也瞭解，在自我他者化（亦即一個自我及其切身他者的真誠視域混融）與自我投射（無論是正面烏托邦或者反面烏托邦，utopian or dystopian）之間，是有一條臨深履薄的界線必須要區劃分明。過去並不總是比現在好或壞，他們只是不一樣而已。去理解過去之於現在的差異，需要將自我從當下「假釋」（bail out）出來，這就是我所謂的「自我他者化」。雖然一個自我可能永遠無法變成他者（為什麼要？），「自我他者化」仍然是一個有效而必要的策略措施，以便達到「控制、康復、還原自我（get over



one's self) 的目標。<sup>1</sup>朝這個方向儘可能走去，我就稱之為「克服自我 (overcoming oneself)」。

書寫另一個時代屬於「自我他者化」策略的一部分，用外語寫作也是。我以非第一語言的英文來寫作博士論文的這點事實，不僅倍增、更是具體呈現了達成「克服自我」與「自我他者化」使命的困難性。語言可能是當下這個日益全球化、麥當勞化的世界裡差異性的最後一道防線。<sup>2</sup>就我不管用英文還是中文寫作幾乎一樣龜速這點而言，英文並不構成問題。在解讀十一世紀的中國士人的學術語言的時候，我同樣需要大部頭辭書幫忙才能譯解，幾乎如同閱讀一個外語一樣，所以翻譯（古今中英）總是必要。英文和翻譯兩者都不是問題，並不是由於我個人的英文與翻譯能力多麼無懈可擊，相反的，正是因為這兩者永遠在需要改進的狀態之中，無論我的第一語言是漢語或英文。當然，身為現代漢語的慣用者，可能在讀寫宋

代史學的時候給我某些便利；不過，如果我們嚴肅看待長期間所造成的時空差異和語文變遷的話，宋代與我們現代漢語使用者之間的鴻溝還是有可能寬闊到如西諺所云：

「過去乃是一個異邦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某些從過去長留至今的語文積澱或者歷史殘存，既可能幫助、也可能妨礙一個二十一世紀的漢語使用者去理解千年以前形成的論述。語文與歷史遺產使人榮耀的程度，可能不亞於將人羈押於歷史延續性與本質主義 (essentialism) 的海市蜃樓之中。就像汽車換檔一樣，轉換進入一個非中文的前進檔，可以強迫（以及幫助）一個現代中文使用者排除各式各樣常識成見，進而對傳統智慧取得嶄新視角。

總歸而言，重點是學問思辨的目標究竟是克服自我，還是在自己的原生語言社群之中自我滿足。我個人「克服自我」與「自我他者化」的夢（理）想是：有一天這世上判定最好的學生和學者，會是那些能夠用外語流利地論述他們自己的歷史文化遺產的人。由於是自我認同的歷史文化遺產，所以理解的層次應該切身而不致於膚淺；能夠用外語流利地溝通，意味著個人勢必掌握非母語的語言文化到一定的程度。（還有什麼比這個方式更能有效測試一個人外語能力的限度？）這個夢（理）想不同於一般翻譯的關鍵點，在於「自我翻譯 (self-translation)」。

一般翻譯是將外語載物轉化進入個人的母語社群，自我翻譯則是將個人歷史文化遺產轉化出口為非母語形式。翻譯在目前社會型

1 “Get over”在英文裡有多重意涵：“To control, deal with...,” “to regain health or success after ...,” and “to believe, to learn to live with the shock of ...” 每個意義在這裡都可以有它各自的理論意涵。我正想取其多義綜合，並且順便提出一點 get over 與 overcoming 之間的諧音遊戲。

2 我仍然生動的記得，1990 年代中期剛到波士頓讀書的時候，日常生活最難適應的問題並不在課堂教室之中，反而是到各式餐廳裡讀懂菜單點菜。有時候為省麻煩，乾脆就到麥當勞之類的速食店，全球標準化的編號餐點可以省掉所有的尷尬不安。生活世界的食物或物質面或許可以全球化，但是語言仍會不斷提醒旅人異邦作為他者有所令人不解之處。我花了好幾次才聽懂波士頓口音裡 “here or to go” 是什麼意思。



態下經常委託給外文系、外國史、區域研究、翻譯作家等等專業人士負責，自我翻譯則是希望在面向未來全球村形成的過程中，作為高等教育中通識人文教養的必備成分。如果作的好，翻譯和自我翻譯都能夠成就雙語主義、文化互相施肥、前景化的比較研究、以及發揚光大混種和合（bilingualism, cultural cross-fertilization, fore-grounded comparativism, and the celebration of hybridity）。如果作的不好，兩者都可能滑落變成曲解、背叛或馴服（distortion, betrayal, and domestication）。就翻譯而言，其過程主要是為了將域外事物帶回家來讓同胞覺得安穩而可以瞭解，而不是出遊、放逐、遷徙、移居、離散，加上所有自我翻譯者所可能暴露其中的風險。翻譯與自我翻譯都是為了裨益溝通；不過，一個自我翻譯者更為主動先行，擔負起跨出善意第一步的責任，將自我轉變成為比較容易被他者了解的型態，以便吸引對方投入追求相互瞭解的共同冒險。翻譯是一份邀請，自我翻譯也是。然而前者主要瞄向的聽眾是相同語言使用者，後者則是語言社群的他者。就翻譯是為自己的語言社群製造攝取他者以豐富自身的便利這點而言，翻譯是自我滿足性質的；另一方面，自我翻譯則代表著有意識試圖進入另一個語言文化世界的成年冠禮（the rite of passage），它所造成的不方便是有可能達到舊的自我被超克、新的自我浮現的程度，亦即「自我克服」。（The older self may be “over” and a newer one may

“come,” namely, the self is “over-come.”）當然，翻譯的終極可能與否（translatability）從過去到將來都是一個問題，無論是不是自我翻譯，但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暫且不論。

在自我他者化與自我翻譯的脈絡裡，有必要構思一個更複雜、多層次的歷史文化遺產（heritage）概念。一個人的「遺產」，照定義講起來一定是繼承來的，但是一個人從他或她的原生家庭、社群、傳統繼承來的東西，尤其在今天，極少極少是單一流源而又同質同種的。我最喜歡舉的例子就是我自己成長的經驗。雖然作為一個在臺灣出生受教育的現代漢語使用者，但我必須承認，我幾乎同時第一次讀到王陽明和黑格爾兩個名字。那時我約莫十三、四歲，在父親的書裡亂翻。即使後來我發現那書裡對兩人的說明不見得正確，但直到今天我仍然納悶，王陽明和黑格爾兩人之中到底哪一個影響我對人的主體性與自我意識的構想比較深？如果我可以為自己畫一張思想祖譜的話，我想他們兩人都是我想高攀引以為榮的先賢。

因此，掌握一個非漢語語言以便儘可能貼近閱讀某些思想先賢，事實上是在找路回家，正如同我在本地的學校教育過程中，漸漸學會了文言文，才能夠上溯「良知」的字源到孟子，甚至更早。就這個意義講起來，自我他者化有時候並不真的是將自我變成他者，而是將某些早已是自我一部分的要素進一步深化與回歸；同理，



自我翻譯不過是在自我的多重遺產之間相互轉寫而已；同理，克服自我實際上往往是在漫長、時而曲折蜿蜒的尋找靈魂旅程之後驀然回首的歸鄉之路。這個旅程的終點在哪？我現在也不知道，但書寫十一世紀北宋中期史學確定是一個中繼站，一個反省我之所以為我，而且今天會走到這步田地的機會，藉著研究一千年前的士大夫文人史家們是為何寫作、怎樣歷史。

〈龜鑑之間：十一世紀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是以司馬光《資治通鑑》為十一世紀宋代史學最重要成就之傳統智慧為出發點。然而，重新檢視《通鑑》編纂史，顯示司馬光與一般官方史學、尤其與歷史百科全書《冊府元龜》之間，存在著啓人疑竇的悖反關係。第一章提議視官方史學為一種歷史書寫操作型態，在宋代制度與文化脈絡中具備其自身的生產位所、程序與產物。第二章探索《冊府元龜》的編纂及其史學意義。作為官方歷史書寫操作傳統的一個持續而富創造力的發展，《冊府元龜》同時重寫了實用取向的類書傳統與流傳下來的諸多正史，使之轉化成為一部關於歷代君臣事跡的分類通史。第三章轉而探討歐陽修的兩部「新史學」。《新五代史》和《新唐書》都是基於現存正史的重寫，但是兩部書構成強烈對比：一部徹頭徹尾屬於官方史學，另一部則被有意地保持私書身分，這對比表明了歐陽修之於當代官方歷史書寫操作的雙重角色，既是內行又是外人。他的「新史學」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被

詮釋成（實際也是）「舊史學」，因為兩者都超越比較晚近的正史範例而向上探求漢代偉大史家司馬遷《史記》的五重奏形式。第四章挖掘一部至今較少研究的歷史文本《古史》，其書與《史記》以及作者蘇轍其他作品之間存在的濃重互文關係，明顯而可疑地具現了宋代史學論述中「重－寫」(re-write)動作的歧義，《古史》的重寫是如此特別，我稱之為「覆寫」(over-writing)。結論重訪司馬光及其《資治通鑑》，透過前面幾章對比，發現《資治通鑑》從三方面以一種特立獨行之歷史書寫操作模式呈現其自身：（1）抗拒被館閣位所及其連結文化條件制約，（2）發展出一套非官式的有效率團體工作程序，（3）既非範疇分類亦非紀傳形式的批判性編年文本產物。綜合所有章節，一幅不同於過往瞭解的十一世紀宋代中國史學星圖於焉浮現。

和前文中引用的 Hayden White 不盡相同，我對「人們為何研究過去」與「研究過去本身」都感興趣，也懷疑兩者是不是一定分得清楚，所以就走上「研究過去人們為何研究過去」，也就是「我學『歷史的歷史』」的路子，至於本身不本身，那就看是誰的本身了！

（2011 年 5 月 3 日初稿）



# 我的學思歷程——轉折與探索

許雅惠（臺大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與很多自年輕便有志於研究的前輩比起來，我的起步相當晚，研究之路是隨著生命的進程逐漸浮現。通訊主編要我寫一篇自我介紹，想了很久，不知該如何下筆，最後我想可以說說自己的這個轉變，說不定對讀者會有些許幫助。

## 求學與工作

我從小喜歡讀書，讀各式各樣的書，從漫畫、歷史故事、翻譯西洋經典小說到三〇年代作家的書，無所不讀。對於文史，我有著濃厚的興趣，無奈想像力不夠豐富，也缺乏寫作天分，便死了以此為業的心。大學時

進入了熱門的管理學院，入學時還叫國貿系，畢業時已改成國企系。

大學四年讓我決定投考藝術史研究所的原因是博物館、美術館的參觀經驗。當時有個好友，兩人經常週末相約看展覽，看著看著，不禁想如果自己能在博物館或美術館工作，興趣與工作結合，該是多好的一件事呀！接著發現臺大有個藝術史研究所，於是我就這麼走上美術史研究的道路。

一開始並沒有打算繼續念博士，這條路對當時的我來說太陌生了，那時想畢業後從事文化工作，因此我曾在雜誌社短暫工作，時間雖短，卻也足以讓我決定是否以此為

業。記者的生活貼近社會的呼吸與脈動，接觸訪問的是熱門的話題與人物，對初入社會的我是相當新鮮有趣的。但在研究所初窺學術門徑之後，無法滿足於單向地接收整理來自他人的二手材料，於是還是回到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當助理（先前我已在庫房做過一年工讀生，整理殷墟、濬縣辛村、山彪鎮、琉璃閣考古文物），協助當時正在進行中的歷史文物陳列館的規劃與設計。



▲2005 年底寒假時去麻州玩，參觀梭羅（Henry D. Thoreau）離群索居的林子，他的這段名言令人回味再三。（2005 年 12 月 27 日攝）



我一直很感謝我研究所的指導教授陳芳妹老師與當時的史語所所長杜正勝先生。陳老師帶領我進入青銅器研究這條路，杜先生則信任我，將文物陳列館規劃的諸多事宜交給我們幾個助理。當時的壓力很大，但也讓我有機會接觸各類文物，得以發揮自己對博物館的興趣與想像，將深澀的考古文物研究轉成大眾可以理解的展示。

後來有機會進入故宮博物院，從事研究策展的工作。先前在史語所什麼事都要做，有時還要跟工程單位溝通，而故宮是個分工井然的博物館，各部門有各自的專業任務，我可以專心在研究與策展上，逐漸體會到研究的真諦。過去在研究生時期的學期報告或學位論文，雖說是盡可能努力去做，總不免帶有「交作業」的成分，沒能感受到研究的樂趣。在故宮，研究必須從收藏品、而不是從他人的二手研究出發，這讓我逐漸發掘出一些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課題，發現一些過去所沒注意到的事，首度嘗到做研究的快樂。

當我第一次翻閱故宮收藏青銅器的圖片之後，發現有一半以上都不屬於青銅時代，這與我之前對銅器的認知差太多了。說到中國青銅器，沒有人不直接想到商、周，但清宮中竟然有這麼多晚期仿古銅器，它們看起來與商周銅器既相似、又極不同，這些器物太怪了！打從心裡的好奇，讓我開始研究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器物。故宮 2003 年的年度特展「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是我與同事們關於這個課題研

究成果的初步呈現。現在看來，裡面有一些錯誤，例如有一件我訂為晚期仿古的器物，法國學者 Alain Thote 來參觀時告訴我，那件可能是秦的，經過討論與觀察，我想他是對的。當時心中很難過，只能以資深如 William Watson 也曾犯過類似錯誤來安慰自己。今日看來，好像也不能為了怕犯錯，就不去做新的嘗試，只能求在研究時更加謹慎小心。這幾年，開始有比較多人注意到中國晚期的復古藝術，我們當年辦「古色」展時整理發表了一些材料，也算是小小貢獻。

開始享受做研究的同時，隨之而來的是極度的心虛，覺得自己所知不足、所學太少，有限的知學在一檔檔的展覽中快速消耗。該是再充電的時候了！此時至耶魯大學讀書，正是水到渠成。對我來說，故宮三年半是關鍵，讓我從喜歡讀書到喜歡研究。讀書與研究是兩件不同的事，多數人或許可以在書本的世界中馳騁想像，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從研究中得到樂趣。如果不是後者，我大概不會繼續念博士。現在每當有人為是否繼續唸書問我意見時，我總是要他問問自己是否喜歡研究——這條有時相當孤獨的路。

### 負笈美國

經過幾年的工作，進入耶魯大學藝術史系就讀時，我算是年紀較長的研究生了。雖然沒有年紀輕的同學反應快，但我知道自己缺乏的是什麼，希望能善加利用國外大學的長處。當時剛剛到系上任教、同樣來自臺灣





## 我的學思歷程——轉折與探索

的助理教授曾藍瑩(臺大歷史系學士班和碩士班系友)，曾經給我一個很好的建議，就是儘量修些自己不熟悉的、臺灣上不到的課，雖然比較辛苦，學期成績可能比較差，但對自己是比較有幫助的。接下來的幾年中，除了中國藝術與中國史課程之外，我陸續修了希臘、拜占廷、文藝復興、馬雅藝術等課程，也旁聽羅馬、日本與韓國藝術，拓展了我的視野。也從老師們身上看到不同的人師風格：我的指導教授 David Sensabaugh 是溫文儒雅的傳統型文人；歷史系的 Valerie Hansen 總是充滿活力地工作與生活著；教授拜占廷藝術的 Robert Nelson 則是鼓勵學生的能手，具有將學生報告化腐朽為神奇的異技；馬雅藝術的 Mary Miller 則是具有舞臺魅力的表演者。

在耶魯的 TA (Teaching Assistant) 經驗也值得一提。身為外國留學生，要在博士班第二年便開始擔任 TA，並不容易，除了自己還要修課不說，英文也還不夠順口，所以我一開始很恐懼，希望能像其他科系從第三年再開始任 TA，但系上 DGS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類似研究生導師) 不同意。後來我就想去學校的博物館作研究助理，或是擔任只改考卷不帶討論課的 grader，無奈都找不著，還是得去當 TA。更不幸的是，系上中國美術的修課學生人數不多，不需 TA，最後只好硬著頭皮去擔任晚期西洋藝術史的 TA。兢兢業業一學期，總算安然度過，這大大增強了我的自信心，所以接下來我繼續擔任早期西洋藝術史 TA，等我擔任

Jonathan Spence 的中國近現代史 TA 時，已是駕輕就熟。這些經驗讓我對西洋藝術史的發展有比較整體的了解，而且得以近身觀察資深教授 Vincent Scully 與 Jonathan Spence 的教學，也領會到他們的教學理念。當年的痛苦經驗，今天看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我的博士論文延續在故宮時所關注的課題，並集中在宋代——晚期復古美術的開端，從宋代古器物圖錄與復古類型器物出發，探討在傳統上稱為「金石學」的發展與當時士大夫政治的關係，並探索這流行於上層知識分子的金石收藏與知識，如何透過各種印刷圖錄的轉化與媒介，對宋代以後的裝飾藝術產生廣泛影響。論文研究過程將我從原來的器物研究帶到另一個領域——印刷文化，宋代是雕版印刷發展的第一個高峰，



▲在博士論文題目選定過程中曾歷經一番波折，當時絕沒想到，幾年後會在畢業典禮時，從 Butler 院長(Dean of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手中接過藝術史系的論文獎狀。(2010年5月23日攝)



它在復古藝術中扮演的角色只是一個面向，今後我將繼續探討唐宋時期印刷與書籍文化的相關課題。

### 行萬里路

我的求學之路不是一路直上，中間有一些轉折，因為這些插曲，我走訪了世界各大博物館，有些是隔著玻璃霧裡看花，有些則得以進入庫房，直接觀察文物。從中國、香港、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到瑞典，各大城市主要的中國收藏，都走馬看花地看了一遭。早年我主要看中國的青銅藝術，包



▲ 2008 年冬天攝於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館（左邊建築）旁，其中收藏了瑞典考古家於二十世紀早期在中國發現的文物。

括早期與晚期，念了博士後，就什麼都看，總覺得有些東西也許將來會派上用場也說不定。

從事中國美術史研究，三不五時去中國大陸收集資料是不用說的，每次也都有些意外的收獲。我想特別提的是在耶魯唸書的過程中，有幾個考察工作雖然與我的研究沒有直接關係，卻令我印象深刻。一是系上老師帶隊去墨西哥考察馬雅、阿茲特克、西班牙殖民時期的遺址與建築，親睹宛如幽靈之城的 Teotihuacan，震撼自不在話下。在這裡，我意外地看到明代青花，那個航海時代的全球貿易體系生動地浮現眼前。另一次是跟著耶魯的絲路考察團去新疆，第一次切身地體會到在今日的政治版圖上劃屬中國的新疆，地理與文化的紐帶其實是中亞，不是中國。在歐洲各博物館中看到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史坦因（Sir Aurel Stein）與伯希和（Paul Pelliot）帶回去的絲路文物，霎時鮮明了起來。我想在研究之路上，不時要有這樣的活水，注入不知不覺便沉滯的思路與情感。

回顧所來徑，我覺得自己很幸運，一路上雖遇到不少挫折與關卡，但都安然度過。過去的我，在探索自己的人生之路，未來的我，也將繼續探索研究與教學的各種可能。

## 《史原》憶往——走訪梁庚堯教授

梁庚堯（臺大歷史學系特聘教授）口述  
吳挺誌（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整理

編按：

《史原》復刊第2期已於2011年9月出版，編委會成員為集思廣益，多次走訪活躍於學界之學長。此系列專訪名之〈《史原》憶往〉，前已訪問陳識仁、邱澎生先生，本期由復刊第2期編委吳挺誌訪問第6期主編梁庚堯老師。未來〈《史原》憶往〉將不定期在「學人專訪」欄位刊出。以下為梁庚堯老師訪談摘要。

吳挺誌（以下簡稱吳）：老師在第五期似乎就已經參與編輯《史原》，第六期則成為主編。老師如何開始參與《史原》的編務？而後是基於什麼原因接下《史原》主編？

梁庚堯老師（以下簡稱梁）：對我來說，《史原》第六期編務是個非接不可的工作。當時，照例由博士班研究生輪流編《史原》，那年正好輪到我這一屆。那時每屆博士班的學生並不多，當屆的博士班學生（63學年度入學）只有兩人：我和目前任教於東海大學歷史系的陳錦忠先生。陳先生從東海大學碩士班畢業，當時已經是東海的講師，平時都在臺中，上課時才到臺北，不能隨時處理相關事務。因此，編務就由我擔任。當時博士班人數不多，有時一屆一人，我那屆兩人，也有一屆三人的。如徐泓老師那屆（D58）有三人，另兩位是張元老師和何烈先生（畢業後曾任教於中興大學歷史系，已

過世），而我的上一屆（D62）張永堂先生那屆只收一人，下一屆黃寬重先生那屆（D64）也只收一人。

協助《史原》第五期編務只是幫忙跑腿，沒有負責特別的事務。因為第五期《史原》主編張永堂先生是我的熟朋友，我們大學、碩士班都一起修習方豪老師的課，他又是我上一屆的學長，因此找我幫忙。

吳：《史原》第六期的編務如何運作？編委如何選出？

梁：當時沒有編委，就只有一個主編，編務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主編一手包辦，臨時有需要再請朋友幫忙。我都是找黃寬重先生幫忙，他在碩士班、博士班都比我低一屆，兩個人都研究南宋史，所以很熟。收到同學的稿件，則是送請系上的師長審查。最主要的工作是邀稿，再找老師審查。其他的雜務還有與印刷廠聯絡，送印刷廠的校樣給作者校定，催促作者早日交稿等。

吳：當初《史原》的稿件是怎樣來的？怎麼決定要刊登的文章？

梁：我編的這一期（第六期），稿件有五篇專題論文、兩篇研究討論、一篇書評，大部分都是邀來的，由我向熟識的同學邀稿。有兩篇稿件是得自系上師長賜稿，分別是王德毅老師的〈宋文集中碑銘傳記資料不著名諱人物彙考〉及佐伯富老師的〈茶と歴史〉。





除了學術文章，《史原》刊物最後面附有當時學術動態的彙報，由系上提供，彙報記錄當時國內各個與歷史學相關學術機構的消息，當然也有本系記事。這是《史原》很大的特色，在漢學研究中心的《漢學研究通訊》出版（1982年1月）以前，《史原》蒐羅了最多、最廣的學術動態。

吳：老師當初為《史原》設定的目標為何？是否希望《史原》效法哪個成名刊物？

梁：我沒有想得那麼遠。這份刊物經過前幾屆學長的傳承，由我接手，只想到要盡力編好。系上師長對研究生都很信任，基本上不會過問《史原》的編務。當時系主任是孫同勛老師，遇到問題可以請他指點。

吳：《史原》第6期有臺大歷史系客座教授佐伯富老師的一篇文章，這好像是《史原》第一次刊登外國學者的文章，可以請老師談一下當時的情況嗎，他又是怎樣知道有這份刊物的？

梁：佐伯富老師是日本京都大學教授，著名的宋史學者，當年應邀到臺大歷史系客座，開授「中國近世經濟社會史」課程，是上下兩個學期的課，大部分講宋代，也有一部分講元、明、清，我和黃寬重先生都修習了這門課。他是否開授其他課程，我已經沒有印象。這門課程用日文講授，由鄭欽仁老師即席翻譯。

〈茶と歴史〉這篇文章，用日文寫成，是佐伯富老師的賜稿。我不太確定他如何知道《史原》這一份研究生刊物，或許是系上師長向佐伯富老師提及，或許是系上曾贈送《史原》給他，也有可能他更早就知道這份

刊物。

《史原》第二期的「後記」中講到，創刊號（1970）曾寄贈給各國的學術機構，包括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在內，日本的中國史學界應該已經知道這份刊物。當時臺大文學院印行已有二十年的《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950年創刊）兼收各人文學科的論文，歷史系的學報還沒有創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創刊於1974年），大學部學生編的《史繹》已經出版了好幾期（1964年創刊），內容很明顯是學生習作，而《史原》既屬歷史學專業，又有比較好的學術水準，創刊後引起國外學者的注意，是應該會有的事。

隨便一提，民國四、五十年代，臺灣刊登歷史學論文而較受重視的學術期刊，如《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創刊於廣州，1950年在臺續刊）、《大陸雜誌》（1950年創刊），都兼收歷史學以外其他學科的作品，民國五十年代末期以後，也就是《史原》創刊前後這幾年，專業的歷史學期刊才開始陸續出現。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史學系編印的《史學彙刊》（1968）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69）相繼在民國57、58年創刊，比《史原》早一、兩年；之後在民國60年（1971），《食貨》月刊復刊，我當兵時在高雄市的一家書店意外地買到這份新復刊的刊物；民國62年，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歷史系合編的《歷史學報》創刊（1973），接著是次年《國立臺灣



## 《史原》憶往——走訪梁庚堯教授

大學歷史學系學報》和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編印的《歷史學報》創刊（1974）。佐伯富教授的另一篇論文〈鹽與中國社會〉的中文譯文，就是分爲（上）、（下）兩篇，刊登在《食貨》月刊復刊第四卷第十一期、十二期（1975）上。

包括《史原》在內的歷史學專業期刊開始陸續出現，而且幾年之間就有好幾種，或許可以說明，這時臺灣的歷史學研究與教育已經成長到某一個階段。

吳：當年《史原》的編製情況以及經費的來源又是如何？

梁：當時《史原》的規格，包括排版、封面，是依循前幾期《史原》的格式。前幾期《史原》的設計，應該是在第一期就確立了。我不清楚《史原》創刊的經過，不過我想遼耀東老師是第一屆博士班研究生，他對這份刊物的創刊、風格應該有很大的影響，其他幾位較早期的博士班學長自然也貢獻了他們的力量。遼老師已經過世，這份刊物創刊的過程，較早期的學長應該清楚。

我是臺大歷史系第八屆的博士班（1974

年9月入學）研究生。在我大學畢業去當兵的那一年，正好《史原》第一期創刊。到我編《史原》時，已是第六期（1975年出版）。

順便一提，我當完兵回來，進臺大歷史系碩士班時，正值《史原》第二期出刊（1971），研究生曾開過一次會，夏德儀老師也出席。這一期刊登了那時在美國的汪榮祖先生寄來談《史原》創刊號的一封長信（頁142-143），他提出七點綜括批評和建議，夏老師當時特別提到汪先生。

當時大家都不用電腦，更不會想到有一天要用電腦來寫作或寫信，因此不像現在一樣用電子郵件來連絡刊物編製的各種事情；另外也不設徵稿收件信箱，稿件或是直接交給編者，或是交到歷史系辦公室，再轉交給編者。徵稿方式就是編者向同學邀稿，同學答應了，編者就向他催稿，索取文章。文章都是寫在稿紙上，交給印刷廠用檢鉛字的方式來排版，和現在用電腦排版不同。

當時經費來自哈佛燕京學社的補助，這是從第二期開始的，由系上申請。哈燕社會寄來支票，由我們拿到寶慶路上的中央銀行去辦請款。

吳：《史原》第六期的審稿如何進行？

梁：《史原》當時沒有像現在那樣嚴密的審稿制度，審查老師說通過就通過。我記得有一篇送審文章沒有分節，審查老師認爲要分。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審稿機制，沒有書面審查意見，如果審查老師有意見，就由編者與投稿人當面口頭溝通。

吳：老師覺得一個研究所有沒有研究生刊物的差別為何？



▲梁庚堯老師（左）於「《南宋鹽樵》新書發表會」後，與本文整理者吳挺誌合影。（2010年11月5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 學人專訪

梁：有刊物比較能凝聚同學的向心力，也可以鼓勵學術發表，表現研究所的活力。

吳：老師認為《史原》應該要朝向什麼方向努力？

梁：這份刊物已經有不短的歷史，中間

斷了一個時期，相當可惜。現在你們又將它復刊，第一個就是要長期維持出刊；第二就是採取跟目前一般學術期刊相同的審稿制度，維持刊物的學術水準。

\*\*\*\*\*

### 2011 年第二屆《史原》座談會暨復刊發表會

一、主辦單位：《史原》論壇、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二、會議日期及地點：2011 年 10 月 29 日（周六）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二十教室

監 交 人致詞：甘懷真主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卸任主編致詞：復刊第二期（總第二十三期）陳建守（臺大歷史所博士生） 新任主編致詞：復刊第三期（總第二十四期）黃麗君（臺大歷史所博士生）		
主持人	發表人及宣讀論文	討論人
陳建守	蔡明純 / 「外國文學門」課程在近代中國大學院校的建置與標準化——以北大、清華為討論中心	韓承樺
	吳俊瑩 / 政府資訊公開法制的誕生與臺灣史研究脈動（2000-2008）	黃唯玲
韓承樺	雷晉豪 / 《尚書·商書》「其如台」新探	林宏佳
	李冠廷、游逸飛 /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均輸律》譯注	林益德
陳建元	李海默 / 1947 年中山大學法學院學潮——薩孟武與廣東政局	曾冠傑
	馮卓健 / 不同的啟蒙——評 Gertrude Himmelfarb, <i>The Roads to Modernity: the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i>	王煜芬
高震寰	游逸飛 / 漢代法制研究新取徑——以《二年律令》與《名公書判清明集》的禁賭為例	楊曉宜
	黃庭碩 / 中國中古的「二元世界觀」——引介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	李長遠
黃麗君	韓承樺 / 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	陳建守
	黃旨彥 / 亞馬遜女戰士群像——古希臘人身體與性別觀的探討	涂育誠

#### 《史原》復刊，敬邀惠賜鴻文

我們選擇這刊物的名字，就是準備以現代為起點，回溯源頭，返回傳統裏去。但返回傳統卻不等於復古與保守，因為我們相信走過舊的蹊徑也可留下新的足跡。——《史原·發刊辭》

《史原》於 2010 年復刊並改版，由《史原》論壇主辦、臺大歷史系協辦，《史原》編輯委員會編輯。復刊第 2 期（總第 23 期）於 2011 年 9 月出版，復刊第 3 期開始徵稿，收稿時間為 2011 年 5 月 1 日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止。

本刊刊載專題論文、研究討論、學術書評，追求更嚴謹的史學訓練；也鼓勵發表學術書介、研究回顧、研究札記、史料或學術文章的考證、校釋或翻譯、敘事史學、歷史小說、報導文學、紀錄片前言等各種體裁的文章，嘗試創造更多元的史學風貌。為了在多元與嚴謹之間取得平衡，本刊採雙匿名審查制，每期均邀集專家學者從嚴審查稿件。

有意投稿者，請先加入《史原》論壇，入會資格不限，尤歡迎海內外歷史學研究生、青年學者。

史原論壇網址：<http://shi-yuan.blog.ntu.edu.tw/>

史原編輯部信箱：[shiyuan1970@gmail.com](mailto:shiyuan1970@gmail.com)





# 雲龍五井及相關聯之碑刻調查

楊偉兵（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編按：

楊偉兵先生於2011年6月2-29日至本系參訪研究，特受邀撰文，簡介其進行之碑刻調查工作概況。

「五井」，位於今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雲龍縣境，係明代所開之諾鄧、山、師、大、順蕩五鹽井。雲龍地區產鹽歷史悠久，明代特為盛行，《明史》有載洪武初年：「諸產鹽地次第設官。都轉運鹽使司六：曰兩淮、曰兩浙、曰長蘆、曰山東、曰福建、曰河東，鹽課提舉司七：曰廣東、曰海北、曰四川、曰雲南，雲南提舉司凡四：曰黑鹽井、白鹽井、安寧鹽井、五井。又陝西靈州鹽課司一。」雲龍開五井，大都供應永昌、騰越及周邊大理、麗江等地，嘉靖《大理府志》記載：「後開五井，始分行鹽，地方台井之鹽，專行大理；五井之鹽，專行永昌。」到明朝中後期，五井提舉司年上繳的鹽課銀曾達38,000多兩。

2004年以來，筆者先後受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和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復旦大學人文基金傑出青年學者計畫資助，組織相關人員對雲龍五井等地區進行五次調查。調查的目的不僅在收集和發掘資料，最終欲探求諸如鹽礦等特殊資源（物產）的開發，對於西南邊疆山地環境與社會的意義。

西南邊疆山地地處偏遠，又受限於山地

地貌和較高海拔，雖然中國傳統農業隨漢民遷入的影響仍是巨大，但這些山地山區並不能成為主要的糧食產區；相反的，山地所蘊藏之礦產富源開發，在局部地區甚至更大範圍內，對地方產生更為重要的影響，至少可以說具有明顯作用。承蒙各方關照，筆者藉於臺大歷史系訪問研究之機會，對這些年的調查做些介紹。<sup>1</sup>圍繞著鹽業，我們著重對鹽村環境和散落四隅的碑刻展開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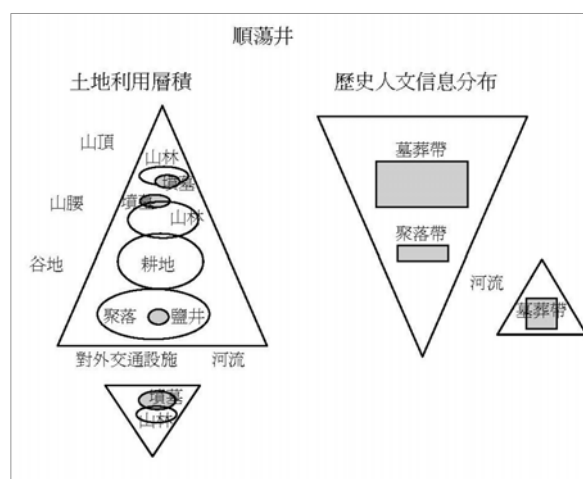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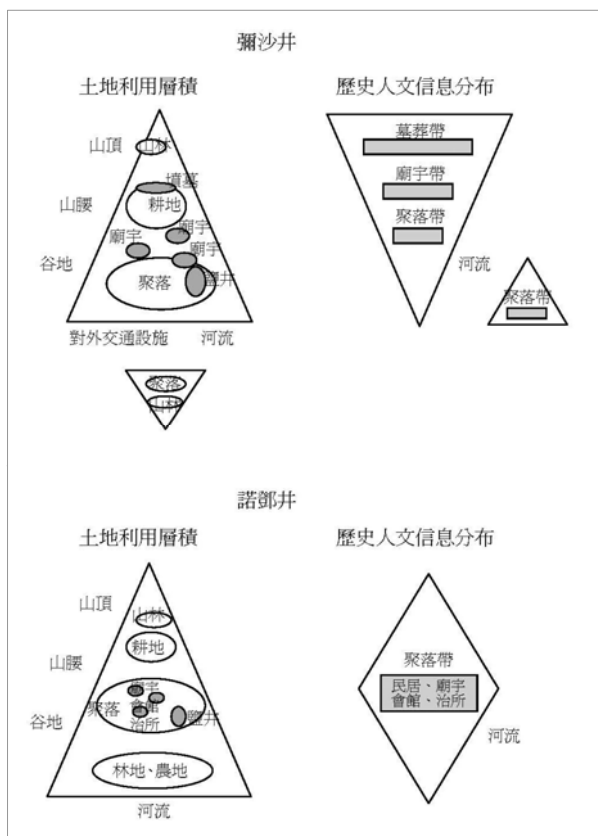
—

五井基本分布於滇西瀾滄江支流沘江之中下游峽谷，清至民國時又續開天耳（天）、駱馬（金泉）、石門等井，與毗鄰之沘江上游、今怒江州蘭坪縣拉井及大理州劍川縣彌沙井、洱源縣喬後井等，位於同一鹽層構造帶。歷代開發，使得今日之大理、怒江及麗江交界地帶形成鹽業生產聚集區。儘管雲龍五井現已停產，地位不及喬後，但明清興旺的遺跡比比皆是，亦使今日之雲龍絲毫無愧「鹽城」之譽。工作首先集中在鹽鹵源（井）與相關的聚落環境調查上。

五井中位置最北者為順蕩，鹽井雖已無存，但歷史上聚落和因鹽業繁盛帶來的大量明清墓葬遺存，卻保留最多，成為近年我們調查的重點村落（見圖一）。

<sup>1</sup> 因主要工作仍在進行中，本文僅做粗略介紹，敬請諒解。





圖一 滇西河谷鹽業聚落土地利用與垂直生態系統調查示意圖

- 說明：
1. 河谷地帶經濟與生業所產生的土地利用格局具有複合性，人地作用在山地上的非均一性分佈，強有力地擾亂了山地垂直生態體系。自然資源的地理分佈決定了這種格局的最初形成。
  2. 特殊性自然資源在歷史上的開發，對於山地聚落環境與社會、人地關係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3. 著色部分為考察點，也是現今所見歷史遺留較多的分佈點；歷史人文信息即當前考古踏查所見，反映聚落環境的主要資訊分佈帶。

實地查訪統計得知，順蕩村歷史上曾有十八寺之說，雖然村民記憶有可能將多個時代、廟宇疊加，但對於位處峽谷而空間無法拓展的狹小村落而言，這一數量已令人驚訝。結合廣泛存在的火、土墓葬遺存，順蕩井當年的人口及鹽業繁盛，可見一斑。調查研究還發現，除了鹽井必不可少的鹽鹵龍王廟與白族地方民間信仰本主廟、三崇廟外，順蕩井民間、廟宇、火葬墓葬中對女性的供奉和祭拜是一大特色，相關留存十分集中，為五井中僅見。例如，彩鳳橋（為出入村落唯一橋樑，屬風雨廊橋，明代建造，清乾隆重修，至今保存完好）到泚江西岸山坡一線，依次座落的女性相關建築，包括：大花

橋（彩鳳橋明代原名）、童子閣、大慈寺（觀音）、地母廟、火葬墓群等。在大理州文物保護單位園區所見之火葬墓群，根據碑文判讀，基本上都是女性，其中以明前中期的宣德、正統、成化、弘治年間墓碑居多，亦有少量年輕女性墓，調查所見年代最早為永樂時期。園區內部分墓碑亦有周邊地區遷入者。元明時期流布於雲南西部的火葬墓群，順蕩地區、泚江西岸沿線發現較多，保存也較為完好。碑身基本上均正面題漢字，背面刻有梵文佛經，並以趙氏居多。由於幾無文獻遺存，碑文本身銘刻文字有限，尚不能確

## 雲龍五井及相關聯之碑刻調查

知這些火葬墓群的詳細情況，包括來源、墓主職業、身分及後裔等。

至於目前旅遊開發最盛、產鹽最爲悠久、明五井鹽課提舉司駐地的歷史文化名村——諾鄧，多次調查顯示，當地與鹽井直接相關的遺存並不多，然而明清文教科第、民居建築倒是五井中保存最多、最好的，也是五井中村落最大者。

諾鄧村落分布於諾鄧河兩側，屬典型山地聚落。西村爲大村，地勢較陡，村舍密集，緊依山勢自河谷向山腰分布，係鹽井主要村址，分布有明清鹽業提舉司、文武廟、玉皇閣、科第大姓宅第等舊址，也保存較多白族民居（以三房一照壁、四合院等居多），村間道路橫坦縱陡，均爲條石或石塊砌壘。村週邊分布廟宇（如文武廟、玉皇閣、香山寺等）和鹽馬古道。

河東村相對高度低於河西，地勢較爲平緩，村舍相應寬大，分布有鹽局、龍王廟（鹽鹵龍王）、貢爺院及多座白族四合院建築。最古老的廟宇萬壽宮（即祝壽寺）已無存，據今址居民介紹，該宮毀於「破四舊」時期。

大村（河西）內並未發現廟宇，但卻有較爲罕見、作爲村落地位和文化重要象徵的文武廟與玉皇閣等建築，尤其是文廟；惟上述廟宇座落於村莊西北向週邊較高地勢處，距離村莊約有 500 米左右，兩地以古老的石板路連接。玉皇閣廟宇爲道教木結構多重建築，其核心是玉皇大殿，主殿上的兩重閣樓寬大高聳，四壁及穹頂上均有黑白水墨畫，穹頂上的生肖太極組圖最爲難得，整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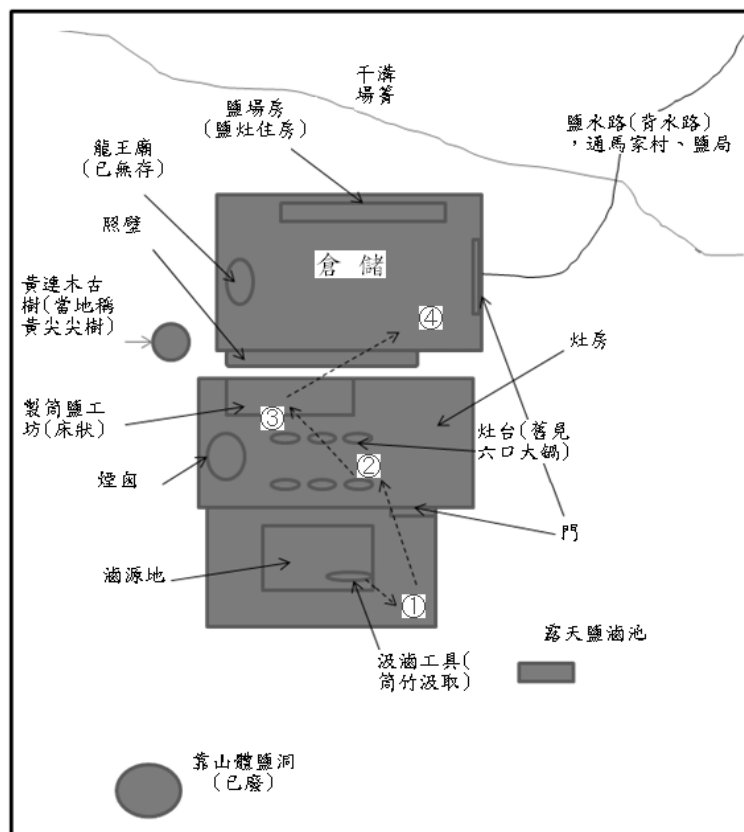
建築特色鮮明。玉皇閣南向庭院有兩廂房、山門殿等，今見數塊重要古代碑刻鑲嵌於土牆內，如〈皇圖鞏固〉、〈玉皇閣常住碑記〉、〈門會碑記〉等。

在玉皇閣大殿左後側有名爲「靜室」之廟宇，廟內已不見塑像，但從楹聯等文字判別，應是佛教寺廟。靜室殿內左右牆壁上嵌有碑刻，其中右側爲〈靜室常住碑記〉。

根據調查及以往碑文整理所見，玉皇閣留存較多這些地區重要的明清碑刻，特別是其中多通詳細記錄了舊時地方、寺院間的經濟社會活動，出現「坵」、「雙」、「段」、「派」等田畝計量單位及眾多鹽業活動相關材料，價值較高。如〈靜室常住碑記〉有「水田一雙，陸地一派」說法。「雙」所指爲何？自元代以來就有說法，最早甚至可上溯至南詔時期，《蠻書》、《萬曆野獲篇》等重要史籍也有記載，加之今人研究，基本能定義爲「一架牛犁出的田」。「坵」所指的地方，今日也能基本確定：山原水準耕作環繞山體一圈或一半以上，均認作「坵」，大小因山體實際不等。但「段」、「派」等卻仍難理解（前者文獻中常見），根據雲龍縣境多地訪談（含民族語言），大多認爲是針對具體地望所言之泛稱。

五井中鹽井及鹽鹵汲取、燒煮、倉儲、運輸等遺跡保存最爲完好的是位於縣城東北數里、泚江支流獅尾河左側的大井。上述鹽業產銷流程建築遺跡，在大井居然還集中於一處，對於考察古代井鹽技術體系，有著重要研究價值（見圖二）。





圖二 干溝場大井鹽井遺址暨製鹽生產流程示意圖

說明：1. 汲鹵水至 1 處（配有蓄鹵工具），再輸送至灶台大鍋 2 處燒鹽，然後鏟鹽至 3 處調製筒鹽，最後放至倉庫 4。

2. 干溝場大井鹽井遺址完整保存了鹽業生產之流程遺跡，為雲龍五井所僅見。

3. 於鹽井處實測大井海拔高 1798.70 公尺，經緯度為 N25° 53' 32.54"，E99° 23' 58.81"。

## 二

五井鹽業調查最大收穫之一便是順蕩土葬墓群的查找及碑文整理。位於泚江西岸山地的順蕩火葬墓群發現、保護較早，考古、歷史、民族學界關注也多，但密布於東岸村落後山的「官墳地」明清土葬墓群，至今注意者極少。2007 年，筆者至順蕩，在與路人交談時聽到「官墳地」三字後，上山查訪方才得悉。再經 2008、2011 年兩次仔細踏查（後一年實行三天駐點調查），基本摸清官墳地墓葬情況：訪得百餘座土葬墓，分布於順蕩村後山三片平緩坡地，愈往山巔時代愈久（實地調查是自山頭往下尋找），即便排除盜墓、荒廢無跡者，仍能斷定部分

文物普查記載此地近 500 座墓葬、有元明火葬墓的資訊不實。由於山地灌木叢生，加之成片的嚴重盜墓行為所致之冥室敗露、洞穴旁生、石砌墓閣塌陷危險等，調查難度極大。墓碑（文）數次測量、拓片、拍攝成功者僅 60 餘通，基本上都已無後人祭拜。而至今因無其文獻、口碑資料等支持，解讀工作進展十分緩慢。官墳地墓群，地方上稱楊、羅土官官家墳地，但筆者並未訪得羅氏墓碑，所見均為趙氏、楊姓墓。所訪年代最早一座為崇禎十一年（1638）墓（刻有較大篇幅墓誌銘，墓主等資訊尚在解讀中），其次有南明永曆二座，其後以康熙、嘉慶和道光年代者居多。2011 年 8 月調查途中，地

## 雲龍五井及相關聯之碑刻調查

方文化站工作人員說新發現永樂墓，但無從確證，筆者亦認為可能性不大，疑為永曆之誤認。

順蕩官墳地土葬墓的研究，應與之前泚江西岸山地火葬墓群相聯繫，二地均屬順蕩井歷史墓葬的重要區域，官墳地且為現今村子的主要墳地。從時代上看，兩地實可銜接：火葬墓群時代均為明代，前中期占絕大多數；土葬墓群最早為明末，並以清代居多。從有限判讀中初步可知，火葬墓主均是女性，且無身分介紹，更未發現職官名分，而順蕩井在明代已為官府管理；土葬墓主已發現土官身分（有直接管理鹽鹵之責者），題銘者大多為順蕩井後代科第入官在外履職者，且多數為雙閣夫妻棺葬。順蕩兩地古墓群為五井中僅見，必定是研究雲龍乃至滇西鹽業、西南邊疆山地社會的重要材料，目前看來，它們作為順蕩井明清兩代興旺繁榮

的證據已毫無疑問，但因文獻缺失，如何研究並得出結論，是件艱難的工作，需要多次和長久的調查。官墳地墓葬形制如圖三。

順蕩井村內目前僅發現有兩通碑刻，分別是嘉慶十七年（1812）八月「□□雲龍州正堂兼管□□白羊廠務世襲雲騎尉加五級記錄□□□」題〈永垂碑記〉，和光緒元年（1875）四月「雲龍井鹽課司儘先補用知縣加三級毗陵楊應駱」撰〈永垂碑記〉。後者脫落嚴重，僅判讀得鹽課和灶戶管理等內容文字，不過這也是五井鹽村中難以查訪到的鹽業碑刻。順蕩井地處明清麗江府、大理府及邊夷土司交界泚江河谷地帶，上下左右可通數個府縣，在古代仍屬交通便利者。也正因如此，歷來戰亂波及甚多，破壞也較嚴重，加之民國以後鹽鹵減少，村落境況不復往時，村內保留的歷史資料遠不如地處山間的諾鄧井。



圖三 順蕩地區清代官墳地墓葬形制

# 臺大歷史系講論會

Melanchthon 為馬丁路德所寫的第一篇傳記

花亦芬老師主講

人文學者 Philipp Melanchthon (1497-1560) 是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在德意志宗教改革過程中，最重要的「戰友」。路德過世後三個多月，Melanchthon 為路德的拉丁文文集 (*Omnia Opera*) 第二冊寫了一篇〈路德傳〉作為序言 (“Praefatio”)。這篇路德傳隨後以單行本 (*Historia D. Martini Lutheri*) 流傳，成為後世 (尤其是親基督新教陣營) 認識路德生平與思想最重要的依據。換言之，我們今天對路德的認識受到這篇傳記影響甚深。這篇傳記不僅是第一篇關於路德的傳記，在書寫上，Melanchthon 也將宗教改革所有的奮鬥與成就歸給路德，絲毫不提自己長年的努力與付出。在這篇傳記影響下，德意志宗教改革史的書寫也形成以路德個人為中心的傳統史觀。

隨著現代宗教改革史研究多元視野的開展，近年來的研究除了跳脫以路德為中心的英雄史觀，將當時一般社會大眾對路德改革思想的反應與民間宗教生活習慣的變動 (與不變動) 納為歷史觀照的範圍外，也開始檢視 Melanchthon 對宗教改革運動的影響。本文希望以 1546 年 Melanchthon 所寫的《路德傳》為基礎，討論他為基督新教開創了何種傳記書寫觀？這種書寫觀與古希臘羅馬的

傳記以及中古的聖徒傳差異何在？對基督新教的意義又是甚麼？此外，雖然 Melanchthon 在《路德傳》裡沒有花費筆墨談論自己對宗教改革運動參與的詳情，本文仍將析論，Melanchthon 在字裡行間還是清楚表達出，自己何以要放棄如 Johann Reuchlin (1455-1520) 與 Erasmus of Rotterdam (1466-1530) 等人文學者可以安然享有的學術尊榮，不懼時代風濤，與路德並肩奮鬥長達二十七年有餘。透過這個闡析，本文將進一步討論，Melanchthon 的抉擇與他對提升德意志社會文化的思考有何關聯？這些思考又與路德的宗教思想以及 Erasmus 的人文學教育理想有何差異？透過上述的討論，本文希望論述 Melanchthon 個人思想的獨立性，以此來重塑德意志宗教改革原本具有的多元風貌，並重新省思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的本質與特色。



▲花亦芬教授 (2011 年 3 月 31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 講論會/演講摘要

### 《奏讞書》中的法理言說和道德判斷

閻鴻中老師主講

近數十年來，秦漢律令與法律文書的出土，如睡虎地秦簡中的《封診式》和《法律答問》，以及江陵張家山漢簡的《奏讞書》，為研究該時期的法律和行政制度提供了極豐富的原始資料，若說這段歷史隨之大幅改寫，恐怕也並非過甚其詞，而且許多課題的探討至今還方興未艾。面對這些古代制度運作的直接史料，絕大多數的研究都以釐清制度規章，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樣貌為主要的目標；相對來說，對於制度與法理的思維，受到的關注顯然不多。本講演所要討論的法理言說，即是頗受忽略的一項課題。

法理言說通常是指對法律整體或內容的說明、解釋和論辯；由於在法律的背後必然存在著更根本的目的、價值和思維，法理言說經常透過對具體爭端的處理，而能對本質層面給予某種詮釋或者發展。從政治思想的角度來說，秦的律令是從商鞅變法以來逐步發展的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法家對法律和制度的諸多特殊主張，除了落實為律令規定之外，也必然反映在法理言說中，此乃可以想見的情況；漢初大致上仍是在秦律體制之下求變通，某個意義上反映出秦律體制的終結和轉型。那麼，究竟秦律體制下的法理言說有何特色呢？此次講演擬在這個未受注意的問題上做些初步的探討，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相關學者深入研究的興趣。

《封診式》內容是多種司法案件的調查程序與紀錄格式的範例，《法律答問》係對

法令中的名詞或疑問的解釋，《奏讞書》則包含十六則漢初奏讞案例及六則參考案例的彙編。

本次的講論包括四個子題。首先將極為扼要的回顧法家興起前後的法律思想和法文化，藉以提供檢視秦漢法律文獻的背景知識。接著的兩個子題，將從《封診式》、《法律答問》和《奏讞書》等案例資料和法律解釋著手，勾勒出秦律體系下法理言說的基本模式。這種模式有幾項極其特殊的性質，一是對於違反行為有著極為精準的論述，而且具體表現在詰問當事人的過程中；其次，是強烈支持倫理規範，對於親權尤其嚴格保障；第三，在倫理義務和道德判斷發生衝突時，卻仍然謹守律文，絕不使用一般價值判斷來進行論述。整體而言，秦律體系的法理言說，在整個中國法制史上獨樹一幟，這種情況似乎是我們以前所不知道的。最後一部份，將對於其所以形成的緣由，也就是法家的法律思想與政治思想間的關聯，進行回溯分析；並對漢初法理言說展開變革的契機以及困難之所在，提出嘗試性的解釋。



▲閻鴻中教授（2011年4月28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 講論會/演講摘要

功利思想儒者伊藤仁齋的《童子問》  
與其形成的時代——江戶時代學術與  
政治互動的一個參考座標

童長義老師主講

本文以江戶時代伊藤仁齋的《童子問》為分析主體，希望兼顧伊藤仁齋思想的內在邏輯，及其對外在生活環境變化的刺激與回應，了解其思想成長與政治力、社會脈動力之間的互動關係。

《童子問》自伊藤仁齋六十歲開始起草，至仁齋死前七十八歲中止講論會為止，其間經歷德川綱吉政治的四大方針：尊王（皇）系列措施，禮遇與迫害並行的待儒政策，嚴厲慘刻的儉約令，以及人不如畜的「生類憐令」。

本文分析《童子問》書中只對孔孟共同主張「儉」有相當篇幅的深入討論，此舉既可在仁齋滿是京都豪商、公卿貴人的交遊圈中發揮「以友輔仁」、「愛人以德」的善舉，又能迎合高壓統治者政令，乃一舉兩得的作為。另一方面，仁齋卻未以孔孟共同重視的「仁民而後愛物」思想，對時政「生類憐令」針砭，以及為了順勢迎合德川家帶來「元和偃武」、德川綱吉恢復失落九百餘年的尊皇傳統的種種偉大功業，極力稱揚管仲九合諸侯、尊王攘夷與開創和平盛世的事蹟，卻對有關管仲的評價，孔子與孟子之間有嚴重落差的問題，以至於在「童子」們對這一個問題的質疑時，仁齋也只能以老師的權威，捉襟見肘地要童子們「子當以意理會」、「不可以論語字面解之」，無法做具體直接的回

答。因為整個東亞儒學史上，伊藤仁齋大概是最強烈主張孔孟思想一體不可分性的儒者，由此突顯仁齋思想的內在邏輯的自相矛盾性，卻符合當時政治與學術思想間互動的實態。

有關仁齋思想學說的評價，在他生前到死後，乃至於三百年後褒貶迭出、正反對立的情況，大概是儒學史上相對少有的。對其如此曲折多變、起伏迭出的思想體系，後人在有限篇幅與一時一地研究視點的侷限之下，往往執其一端而擴大渲染，陷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的盲點陷阱中；閱讀者亦以為眼前拜讀論文所見，即為伊藤仁齋思想之全體。不只客體研究者及閱讀者難於擺脫這種知識論盲點的宿命，即使伊藤仁齋本身，對於自己的思想著作與論述主張也無法首尾相顧，自圓其說。雖然如此，如果兼容並顧思想發展的兩個主要面向——思想的內在邏輯理路，與思想家對外在生活環境變化的刺激與回應，也許較有機會逼近其思想的動態全貌，解釋其思想體系裡落差斷裂的原因與產生的機制。



▲童長義教授（2011年6月9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 一起記錄我們夜間部的四十年

甘懷真（臺大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編按：

臺大於1960年成立夜間部（前身為1955年成立的「夜間補習班」），可視為大學之第二部，1963年因故停招新生。1967年復開辦新制夜間部，定位為高等教育之推廣教育，初設外文、法律、商學三系，1971、1972年分別增設歷史系、中文系，此後未增設他系。

1994年，大學法修訂，刪除夜間部相關規定，促成夜間部轉型正規部或推廣教育學士班。臺大夜間部於1996年（85學年度）招收最後一屆，此後夜間部學士班改制為「進修學士班」，第一屆臺大進修學士班於1997年（86學年度）招生。2001年，最後一屆夜間部學生畢業，教育部廢止「大學校院夜間部設置辦法」，臺大夜間部即行裁撤。

2006年，臺大校方決議全面停招進修學士班，本系進修部自2007年（96學年度）停止招生，至2011年最後一屆學生（學號E-95者）畢業後，進修學士班即於2011年7月31日功成身退，走入歷史。



2008年8月我擔任系主任後，心裏一直在盤算進修學士班結束一事，也將「許進修部一個happy ending」當成工作目標。但直到2011年6月出席進修學士班回顧特展，再參加99學年度的畢業典禮，才真的進入曲終人散的情境，而有日子忽焉到來之嘆，終於要結束了！

臺大歷史系在1971年設立夜間部，至今整整四十年，其間在1997年改制為進修學士班。長期以來，臺大歷史系就是由三個單位組成：大學部（學士班）、研究所與夜間部（進修學士班）。如今，我們史無前例的要關掉其中一個單位，內心不捨，可想而知。

回顧歷史是歷史學家的專長，我們在系網頁上開闢「進修歷史翻新頁——臺灣大學歷史系進修學士班回顧展」專頁，利用師生感言、照片等方式，紀念我們共同走過的這一段歲月。本期系通訊亦製作「回首·臺大夜歷史／進修學士班」專題報導，刊登胡平生、呂世浩老師和幾位系友的感言，和大家一起記錄夜間部所走過的這四十年。

◀2011年6月1日，「臺灣大學進修學士班回顧特展」開幕典禮，甘懷真老師（後排右一）、李嗣浚校長（前排中）、進修推廣部郭瑞祥主任（前排右一）、文學院葉國良院長（中排右一）等多位師長出席，共襄盛舉。（臺大檔案展示館攝）





## 回首・臺大夜歷史 / 進修學士班

我個人對夜間部有很多美好的回憶，我長期擔任夜間部的導師，想念這段師生情誼。有幾年，我講授舊制的「中國通史」，這是一學年的課，一學期有四個學分，一週有二天晚上要在一個班上課。夜晚教室的種種情景，仍記憶猶新。2009 年 9 月，我在進修部開授「東亞古代政治史」，這是我在進修部教的最後一門課，走在晚上十點多的校園裡，別有一番心境。

既然同時上日夜間部的課，我也不免比較臺大的日夜間部同學的異同。剛進大一時，夜間部同學在上學期較不進入狀況，要多花些力氣教他們。但到了下學期，他們在學習表現上有很大幅度的提升，漸入佳境，許多地方不會輸給日間部同學。推其原因，夜間部同學當年聯考或有不如理想之處，尤其是與日間部同學比較，也有同學是因家庭等各種原因，而不能在求學之路上提早頭角崢嶸。但他們願意選擇臺大，在夜間上課，顯示其上進心與成就動機，這股動力會使他們在將來脫穎而出。如胡平生老師在〈韶光易逝卅五年——臺大夜間部歷史系憶往〉文中提到多位現今史學界的優秀學者，即畢業於本系夜間部，他們的成就無疑是本系成功的證明。

夜間部的學風，正如臺大校歌所說：「這百折不撓的作風，定使我們一切事業都成功。」

► 2011 年 6 月 4 日，臺大舉行 99 學年度畢業典禮，會場上方高掛著各學院的布幔，進修推廣部也在其中。最後一屆進修學士班學生在這一天畢業後，臺大進修學士班即走入歷史。（甘懷真老師拍攝 / 提供）



▲進修學士班回顧特展中展示夜間部各式印記  
（2011 年 6 月 1 日臺大檔案展示館攝）



# 韶光易逝卅五年

## ——臺大夜間部歷史系憶往

胡平生（臺大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1973 年的炎炎夏日，我猶在晨昏顛倒地趕撰臺大歷史所的碩士論文中，對於即將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威脅，亦未遑理會。終於在期限之前完成論文，通過口試，取得學位，並且幸運地於同年 8 月 1 日起進入母系任專任講師。這主要是由於教育部通令自該學年度起，各大學院校所有科系學生除必修一學年之四學分中國通史（以下簡稱中通）課外，另需必修一學期兩學分之中國現代史（以下簡稱中現）課。臺大係綜合性大學，當時六個學院所轄科系繁多，為此母系一口氣聘進了蕭璠（係我大學同班同學，碩士班則高我一屆，專研中國上古史，在母系任教十餘年後，轉赴中研院史語所任職至退休）、林維紅、古偉瀛及我四名專任講師，以爲因應。

記得當時系上資深老師的專長，絕大多數係近現代以前之一般史範疇，承擔全校各系中通課程的教學尚能支應裕如，至於中現課程的教學，則大半由林、古、我三名甫自碩士班近代史組（當時臺大歷史所碩士班分爲一般史、近代史、藝術史三組）畢業的「新進人員」任之。據當時校方規定，學生大一時上中通，大二時上中現課，因外系中現是一學期的課，故文、理、法三學院各系的大二生於第一（上）學期上該課，醫、工、農

三學院的大二生則於第二（下）學期上。當時臺大大一學生均集中於羅斯福路校總區上課，自大二起，法學院各系學生及醫學院部分學系學生，即歸返徐州路、中山南路其學院所在地上課、生活（醫學院其餘學系學生則自大三起歸返學院），與校總區殊少互動，以迄畢業。

猶憶剛開始在臺大教書的兩、三年中，十分忙碌辛苦，每週要上 14 小時以上的課，好在都是外系的必修課，而且都是兩學分的中現，每週只需備課一次，即可在不同的班別重複講述個七、八遍，有如播放錄音機一般，勞累的主要是身體而已。1973 學年度第一學期是我在臺大教學生涯的肇始，法學院各系組共開了十一、二班中現課，全由古偉瀛先生及我兩人擔綱教授。該學年度第二學期，我們自法學院回到校總區教課，我所教的電機系大二學生班中有來自緬甸的僑生崔湛泉（綽號「阿波羅」），其大一時曾與我同爲臺大籃球校隊的隊員（我時爲碩三研究生），並肩在球場上馳騁作戰，未料相隔僅僅半年多，雙方關係由隊友倏變爲師生，他感到難以適應，徒呼負負，大有「何上天待我若此」之慨。

自 1973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我除了在臺大日間部教外系的中現必修課之外，亦同



## 回首·臺大夜歷史 / 進修學士班

時在夜間部教授該課，此為我與臺大夜間部結緣之始。該夜間部是 1960 年成立的（其前身為 1955 年成立的臺大夜間補習班），初設有外文、法律、商學、農推四系，繼設有數學、經濟兩系，1963 年起因經費問題停招新生。1967 年復開辦新制夜間部，定位為大學之第二部。初設外文、法律、商學三系，1971 年增設歷史系，次年增設中文系，此後四十年間，未再增設他系。

我記得 1973 年秋第一次在夜間部開授的課，是外文系大二學生必修之中現，該班學生中之吳榮泰，竟係我高中低一屆的學弟。另有樊金虎者，畢業自國立復興戲劇學校，上課時常常舉手發問，語多尖銳，令人頭痛。宋樹涼，對歷史甚有興趣，畢業後曾赴美取得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校區）國際關係碩士，其後曾至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博士班攻讀，四、五年前尚在臺北偶遇他。該班尚有 1961 年自大陸駕 AN-2 民用機飛韓國濟州島轉來臺灣的「反共義士」邵希彥，時已年近四十，留著小平頭，身材略見發福，說話稍帶山東口音。猶憶其上課尚稱認真，1977 年其畢業後曾赴美取得碩士學位，回臺工作至退休，1999 年赴美，現定居舊金山。

1974 年 2 月寒假結束，第二學期開始，我在夜間部繼續開授中現，教的是法律系大二學生班。該班中不乏五、六十歲的「老學生」，多係早期臺大夜間補習班的修習生，在社會上已工作了二、三十餘年，如徐步雲於抗戰末期畢業自中央警官學校，時任臺北

市警察局督察，李元中時為臺北地方法院書記官，一劉姓者為臺北縣衛生局人事室主任等等。他們雖勤於上課，讀書認真，但誠如其常感嘆的，記憶力已不復當年，故績效不彰。他們頗重視師道，對我執禮甚恭，一再言稱「一朝為師，終身為師」，令我這「毛頭小伙子」難以消受。然此一尊師重道之「古風」，在我其後近四十年的教書生涯中迄未再現，而且每下愈況。1976 年 6 月，我考入臺大歷史所博士班為研究生，成為本系專任教師兼具學生身分之第二人（第一位為遼耀東教授），亦為最後一人。我那些教過的夜間部法律系老學生聞知後，尚在舟山路之「僑光堂」（即今「鹿鳴堂」）設宴為我慶賀，如今已為三十五年前之塵封往事，未審徐步雲等當年老學生猶健在否？

1974 及 1975 學年度我仍在夜間部教外系的中現，乏善可陳。夜間部歷史系的中現是由我的指導教授李守孔老師在教授，所以我對夜史第一、二、三、四屆的學生所知甚少，僅認識第一屆（學號 E-60 級）的蘇更生、謝耀鎬，因為他們會打籃球，我羅致他們為系籃隊（以日間部學生為主）隊員。謝耀鎬服役時曾打過軍團代表隊，身手不凡，蘇更生壯碩，球技則平平。第二屆（學號 E-61 級）有李仕德，來自戰地金門，省立金門高中畢業（比現本系楊肅猷教授高一屆），於臺大畢業後陸續取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博士，專研現代中英關係史，曾任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現致力於金門史之研究。該屆學生中尚有高佑宗





## 韶光易逝卅五年——臺大夜間部歷史系憶往

(1961 年與邵希彥同機飛離大陸轉來臺灣)、劉承司(1962 年駕 MG-15 戰鬥機飛臺)、李才旺(1964 年隨同李顯斌駕伊留申型轟炸機飛臺)三名「反共義士」,其中高、劉於 1977 年 6 月畢業。

1976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我開始接替李老師,在夜間部歷史系教授中國現代史之必修課,此後這門課一直由我教授,長達三十年之久(其間約有五年因出國研究或休假,而由系上其他老師代授)。與外系的中現不同之處,在於它是一學年的課,排於大二時開授,共六個學分,講述內容份量足足為外系中現的三倍,而且需介述相關之史料及研究成果,其教學的困難度要高得多,對我係一大考驗。我接手後所教的是夜間部歷史系第五屆學生(1975 年 8 月入學,學號 E-64,即民國 64 年入學者),全班學生約為五十餘人,其中並無老學生,大多數係女生,且多為高中甫畢業即考入者。其中海中天(僅比我小六歲,畢業於陸軍第一士官學校,曾為該校橄欖球校隊,退伍後考入夜史系就讀。臺大日間部史系 1975 級謝憲昌亦係如此,謝曾為本系男籃隊先發主力,畢業後一直在中國時報擔任記者迄今)、梁開泰(高中應屆畢業)兩位男生,以體型壯碩,被我羅致為史系籃球隊隊員,參加第五屆全國歷史盃(後改稱史學盃,該屆係由文化大學史學系舉辦,臺大史系男籃獲得亞軍)球賽,雖上場時間無多,然一旦上場,就能發揮近身肉搏、死纏爛打的即戰力。

該班的女生黃稔晴,係靜修女中應屆畢

業生,為該校籃球校隊、亞青盃(限二十歲以下者才能與賽)國手,及臺灣女籃甲組勁旅「台元」隊隊員。其個頭不高(約 165 公分),外表斯文秀氣,球場上卻靈動強悍。她不僅是臺大史系女籃史上第一好手,也是歷屆臺大女籃校隊中屈指可數的佼佼者,曾幾度入選全國大專女籃明星球員。另一位女生陳立文,畢業後至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取得碩士、博士,專研現代中美關係史,現任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國史館主任秘書。

1977 學年度教的是第六屆(1976 級,學號 E-65 者),男生中曾振富、黃寶隆是史系籃球隊隊員,惟均非主力。黃寶隆具服務熱忱,儼然為系籃隊管理,其畢業後不久,即赴美至新澤西州蒙特克萊爾州立學院(Monteclair State College, New Jersey,後改制為大學)攻讀碩士。金克斌,畢業後考取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1984 年以〈魏晉志怪小說中的世界——以搜神記為中心的研究〉之論文獲碩士學位,旋入神學院就讀,現任嘉義縣竹崎貴格教會牧師。女生中胡慧中,當時在臺大校園內即頗為活躍,一度打過史系女籃隊,然球技平凡,徒有身高優勢,作用殊微。其課堂上的表現尚差強人意,1979 年其大四時,因主演屠忠訓(曾為胡金銓之副導演)導演的電影《歡顏》而爆紅,其後即置身影壇近二十年,現居香港。片中李泰祥作曲之〈橄欖樹〉,由齊豫代唱,悅耳感人,風行校園,對該片的大賣,厥功甚偉。齊豫時為臺大考古人類系



## 回首·臺大夜歷史 / 進修學士班

學生，上過我的中現。與其差不多同時的臺大歷史系學生包美聖、鄭怡，亦為著名之校園民歌手。與胡慧中同班，課餘與其常在一起的為危美琳、涂英明，記得涂當年曾告訴我他酷愛攝影等藝術，他畢業後不久即赴美至今、為美國僑界知名的攝影家及禪畫家。該班的馮蕊芳，畢業後與曾為臺大史系男籃隊主將的方清河（大學部 1971 級，碩士班 1975 級，曾任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副總編輯，現任該公司執行長）結婚，現為瑜伽教師，開班授課。

1978 學年度教的是第七屆（1977 級，學號 E-66 者），該班學生畢業後留校工作的有周進興（在夜間部教務組任組員）、葉文輝（在體育組任組員，至 2007 年退休）、高閩生（在夜間部總務組任組員、組長以迄於今）。女生中吳瑞珠、江惠琪等，我曾於下課後帶她們練過幾次籃球，因進步有限而停止。

1979 學年度教的是第八屆（1978 級，學號 E-67 者），男生中莊金城、陳健宏，均曾為系籃隊員，莊金城畢業後考上輔大大眾傳播研究所，以論文〈分析荀子教育思想中的傳播概念〉獲得碩士學位，任教於興國高中、樹林高中，1999 年轉至北一女任歷史教師迄今。陳健宏則一直在北投郵局工作。董繼堯，年過五旬，為史夜罕見的「老」學生（史夜 E-81 級學生董子敬，似為其子，我有此印象）。女生中廖菊蘭，畢業後即留校在人事室工作，現任該室第三組（退撫保險組）組長。許瓊文，北一女畢業，鋼琴彈得不錯，畢業後與高其一屆的史夜學長許濟

國（時在中國廣播公司工作）結婚。孫鳳第，來自屏東，畢業後似曾在中正機場出入境通關組工作，記得有一次入境通關，把關人員恰好是她。

1980 學年度教的是第九屆（1979 級，學號 E-68 者），對這班能記憶者無多，只記得崔古雨家住辛亥路與泰順街交會處附近，我在那遇到過他。王惠芳畢業後留校在夜間部教務組任組員，後調至管理學院工作迄今。女生許美鳳，其男友（即後來的先生）為當時中華男籃隊國手許榮春（警光隊主將），偶而會問老師需免費球票否。

1981 學年度教的是第十屆（1980 級，學號 E-69 者），我已由講師升任副教授。該班男生吳堅國，為系籃隊員，惟身手遠不逮其口齒便捷。黃榮鑑上課認真，畢業後留校在教務處任組員數年，即赴日留學。

1982 學年度教的是第十一屆（1981 級，學號 E-70 者），班上有李文瑩，崇光女中畢業，係李守孔師的么女，以致我那一年教學未敢掉以輕心。李文瑩畢業後，隨夫婿羅君（臺大機械系畢業）赴美，現居底特律（Detroit），1993 年我在底特律機場內等候轉機，竟遇文瑩夫婦，亦云巧矣。閻愷林，是政大歷史系閻沁恆教授（時兼政大文學院院長）的獨生女，畢業後赴美，現居鳳凰城（Phoenix）。

1983 學年度教的是第十二屆（1982 級，學號 E-71 者），該班之李恆，與史夜 1976 級的李平為兄弟，兩人均勤奮好學，家住八里鄉，通勤上課，不以為苦。

1984 學年度教的是第十三屆（1983



## 韶光易逝卅五年——臺大夜間部歷史系憶往

級)，對該班我不復記憶，未悉何故。1985 學年度，因我前赴美國賓州州立大學（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University Park）訪問研究一年，第十四屆（1984 級）的中現由系上查時傑副教授代授，故我對該班一無所知。是年 12 月舉行的第十一屆全國歷史盃球賽，我亦無法參加，臺大史系男籃隊教練，也請前系籃好手吳光華（史系碩士班畢業，時在臺大訓導處工作）暫代。

1986 年 8 月，我自美返國，該學年度史夜的中現又歸我教，該班係第十五屆（1985 級，學號 E-74 者），學生中有三名系男籃隊員，其中王敬誠身高 186 公分，修長英挺，畢業於復興高中，曾為北市介壽國中籃球校隊，基本動作甚佳，遠投近射，均能取分，為史系男籃難得一見的中鋒人才。洪文正，身高約 182 公分，畢業於高雄三信高商，服役時曾與王敬誠同為總統府衛兵，係左撇子，動作較慢，但中距離投射亦偶能命中。陳憶均，身高約 171 公分，畢業於恆毅中學，服役時打過憲兵學校籃球校隊，動作嫻熟，瞬間爆發力甚強，能在長人陣中爭奪籃板球，惜投籃準頭不足。史系男籃隊因他們的加入，實力益見堅強。

日間部入選系籃隊的則為邱澎生（大學部 1981 級，與現史系甘懷真主任為同班同學，時係碩士班研究生，現任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劉熙明（碩士班 1982 級，現任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副教授）、江達智（1984 級，現任成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汪立華（1984 級）、戴文鋒（1984 級，現任臺南

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李正賢（1985 級，與現史系方震華副教授同班）、金仕起（1986 級，現任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鄒興華（1986 級，與現史系呂怡燕助教同班）等，堪稱人才濟濟。惟是年 12 月在淡江大學舉行的第十二屆歷史盃球賽，史系男籃隊僅得到季軍。接下來即大放異彩，第十三屆歷史盃（在東海大學舉行）及第十四屆歷史盃（在輔仁大學舉行），史系男籃隊均以全勝紀錄奪冠，此後迄今二十五年，史系男籃隊即與歷史盃冠軍絕緣（2010 年史系男籃隊獲史學盃亞軍，似又見中興氣象）。兩次奪冠的史系男籃隊先發五人為江達智（後衛）、魏智賢（後衛，1987 級）、王敬誠（中鋒）、金仕起（前鋒）、李正賢（前鋒）。

1987 學年度，教的是史夜第十六屆（1986 級，學號 E-75 者）；1988 學年度，教的是第十七屆；1989 學年度，教的是第十八屆。對這三班的情形，均不復記憶，後來方知第十七屆學生中的林玉茹（學號 E-76），極其用功，畢業後取得臺大史研所碩士、博士，現任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歐素瑛，畢業後取得臺師大史研所碩士、博士，專研臺灣史，曾為國史館簡任協修，2010 年調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副館長，並在臺大兼授「臺灣歷史與人物」、「臺灣近代史」通識課程。林榮澤，畢業後先後取得臺大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臺師大史研所博士，專研一貫道及清代民間宗教，現任東山高中歷史教師、佛光大學等校兼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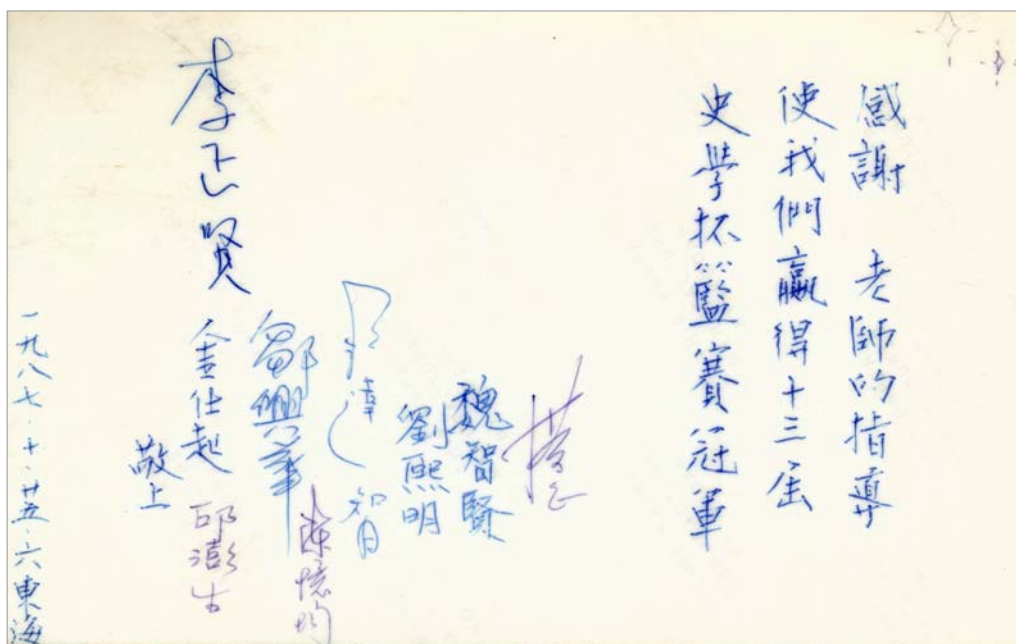


## 回首・臺大夜歷史 / 進修學士班



▲第十三屆全國史學盃男籃賽冠軍臺大歷史系隊，後排左起：魏智賢、金仕起、胡平生老師、李正賢、洪文正；前排左起：王敬誠（及其外甥女）、汪立華、鄒興華、江達智、邱澎生、劉熙明。

▼照片背後有擔任隊長的金仕起之題字：「感謝 老師的指導 使我們贏得十三屆史學杯籃球冠軍」，以及 9 位隊員簽名。（1987 年 10 月 26 日攝於東海大學籃球場，胡平生老師提供）



## 韶光易逝卅五年——臺大夜間部歷史系憶往

1990 學年度，我得到國科會補助，赴哈佛大學訪問研究一年，史夜第十九屆之中現由古偉瀛教授代授。

1991 學年度，我教的是第二十屆（學號 E-79 者），班上學生楊欽堯，畢業後考上臺大史研所，2000 年以論文〈唐代的節日——以七月十五日為主探討〉獲碩士學位，現為中興大學史研所博士班研究生。劉廉法，程度不錯，所繳交之中現學期報告〈再看陳炯明叛變的原因〉，經修改後發表於臺大歷史系系學會主編的《史繹》第 24 期（1993 年 5 月）。賴森華，對中共早期歷史頗有興趣，畢業後考上臺大史研所碩士班，現任安坑國小教務主任。此外黃世青、李宇光，為史系男籃及臺大夜聯籃隊隊員，都能打硬仗。黃世青畢業後任職於冠德建設公司，李宇光則任職於華信銀行。

1992 學年度，教的是第二十一屆（1991 級，學號 E-80 者），班上學生張崑將，畢業後先後取得臺大史研所碩士、博士，專研中國上古史，現為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並在臺大史系兼授「武士道文化與批判」。李毓中，畢業後赴西班牙塞維亞大學美洲史研究所深造，2011 年取得博士學位，現為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黃義杰，為史系男籃隊員，畢業後赴英劍橋大學攻讀國際關係，取得碩士後曾在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工作，八、九年前再度赴英攻讀博士，即未接其音訊，今悉有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國際關係助理教授黃義杰者，未知是其否？

1993 學年度，教的是第二十二屆（1992

級，學號 E-81 者），班上學生梁忠熙（因與當時韓國男籃隊著名神射手李忠熙同名，故不易或忘）、徐年生為史系男籃隊員。徐年生畢業後赴日取得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現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所屬之當代日本研究中心專任研究人員（據云改名為徐泮馨）。女生楊玉文，畢業後曾擔任史系助教六年餘，後通過甄試入臺大圖資所，於 2011 年 7 月取得碩士學位。

1994 學年度，教的是第二十三屆（1993 級，學號 E-82 者），班上女生劉尚青，曾在夜史之夜才藝競賽中，與高其一班的梁忠熙合唱一曲，贏得評審們（古偉瀛主任、劉景輝教授、我等五、六位老師）的青睞，給予最高分，而榮獲第一名。男生張睿杰、楊乃光、陳傳葉，為系籃隊員，張睿杰且為臺大夜聯籃隊隊員。王裕民，係金石書法家王壯為之子，家學淵源，且具幾分才氣，曾任李敖的助理，以「小李敖」自況，勤於著述，兼而針砭時人，然甫及三十，即英年早逝，令人唏噓。

又是年（1994）12 月初，第二十屆歷史盃球賽於臺中中興大學舉行。該屆竟顛覆已行之十九年的傳統，允許各校史夜獨自組隊參賽，惟各校史系隊為集中實力，多仍日夜合組一隊，故僅中興史夜及臺大史夜兩隊報名，此為臺大史系男籃史上唯一一次的「統獨之爭」，史夜有三名資深球員「棄獨從統」，仍續留史系男籃隊效力。更不幸的是，臺大史系隊與臺大史夜隊經抽籤竟分至同一組（共分四組）進行預賽，當兩隊「兄弟鬩牆」比賽時，在場外觀戰的古偉瀛主任

## 回首・臺大夜歷史 / 進修學士班

為秉持「行政中立」，均為兩隊加油，我則以答應擔任史系隊教練在先，方知史夜隊獨自報名參賽在後，只好勉為其難，此為我唯一一次與史夜「為敵」。此戰史系隊雖勝，但接下來輸給同組之臺師大史系隊（前臺大史系男籃隊主力射手江達智，因係該系博士班研究生，亦在陣中）七分（臺大史夜隊亦已敗給臺師大史系隊二十餘分），與臺大史夜隊均無緣晉級前四名之決賽，可謂兩敗俱傷，徒利他隊，足見團結之重要。此後，臺大史夜隊雖未再獨自參加歷史盃球賽（此屆之後，歷史盃又恢復一系只能一隊參賽之規定），其球員亦殊少加入臺大史系隊矣。

1995 學年度教的是第二十四屆（1994 級，學號 E-83 者），該班學生中有三位與中現史上人物同姓名者，故不易或忘，如王寵惠、林俊廷（1920 年代初期舊桂系將領、廣西自治軍總司令、廣西省長）、劉真（教育家，臺灣師範學校校長、省教育廳長）。顧立誠，畢業後取得臺大史研所碩士，專研唐、宋社會史。王右邦，畢業後任教於澎湖白沙國中，與曾任臺大史系助教的陳素淇結婚，並於臺師大史研所在職進修碩士班，以〈澎湖白沙地區的社會與經濟變遷〉之論文取得碩士學位，現任白沙國中教師、總務主任。

1996 學年度，輪到我休假一年，史夜第二十五屆（1995 級，學號 E-84 者）之中現已不記得由哪位老師代授，該班學生我自是全然不熟。

1997 學年度，教的是第二十六屆（1996 級，學號 E-85 者），該班學生胡雲薇，畢業

後取得臺大史研所碩士，現為博士班研究生。任鈞華畢業後取得中央大學史研所碩士，研究領域為日本十九世紀的思想和文藝，現從事譯著。

1998 學年度，教的是第二十七屆（1997 級，學號 E-86 者），因請假赴美研究，故僅教了第一學期，第二學期即請古偉瀛教授代授，該班學生陳億芳，畢業後曾任臺大史系助教兩年。

1999 學年度，教的是第二十八屆（1998 級，學號 E-87 者），該班男生鄧智睿，為人率性，喜找老師們談天說地，畢業後考上臺師大史研所碩士班，以唐宋史為研究範疇，2011 年 1 月，始以〈天下一家到一家天下——以唐宋廟議與君位強化為中心的討論〉之論文畢業。

2000 學年度，教的是第二十九屆（1999 級，學號 E-88 者），該班女生楊舒甯，為自美返國就讀的「小留學生」。江華蕾，畢業後赴深圳從商。

2001 學年度，教的是第三十屆（2000 級，學號 E-89 者），該班男生陳政峰，據云其已獲有東吳大學政治學士（或碩士）學位，熱衷於校內社團活動（曾任夜代會主席）及校外政治參與。2004 年 4 月的「民主運動」，大學生於中正紀念堂前絕食靜坐，其擔任總召集人，與同班同學趙偉杰堅持至休克而後已。其後陳政峰曾獲選為任期極其短暫之「末代國代」。與陳、趙同班，常混在一起的李清福，畢業後則在桃園某國中任教。

2001 學年度起，臺大夜間部改制為進





## 韶光易逝卅五年——臺大夜間部歷史系憶往

修學士班，亦即由大學第二部轉型為進修推廣教育。該年級學生（學號 E-90 者）升至大二，即 2002 學年度時，其中現必修課仍係由我教授。該班學生中胡修瑀，熱心服務，曾任進修歷史系系學會、進修部學生會會長，畢業後任教於苗栗國中，現任苗栗高中歷史教師，並在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班攻讀學位中。陳懷榕，服務軍旅，以不惑之年考入進修史系，深知得來不易，故倍加用功，其在學五年及畢業之初，每屆教師節仍寄來信卡，其現任中山堂管理所副隊長。何維德，穿戴整齊，有時打領帶來上課，令人印象深刻。劉代喬，球技不凡，在學期間一直是臺大史系男籃的得分主力，2011 年 6 月初，臺大史系學會舉辦之一年一度的導生盃球賽，劉代喬仍前來參加，與我同為史系系友隊，和研究生、大學部等隊競技，身手猶甚可觀。

該導生盃球賽，是我 2002 年 8 月接任系主任後所創辦，至今仍廣續舉行，主要項目為籃球及排球，進修史系多曾組隊參賽。猶憶 2002 年 12 月第一屆導生盃球賽舉行時，史系老師亦組隊參加排球賽，迭經鏖戰，竟然奪冠，當年奪冠陣容為古偉瀛、吳展良、李文良、方震華、閻鴻中、童長義、我諸位老師，以及楊玉文、鄭愛群兩位助教。

2003 學年度，教的是進修學士班第二屆（即史夜第三十二屆，2002 級，學號 E-91 者），班上李彩惠，幾乎每學年都獲得書卷獎。紀佩欣，該學年度第一學期結束後，因過半學分不及格（中現亦不及格），我遂指

點她如何參加轉學考試，結果該年（2004 年）夏順利轉入政大歷史系日間部繼續其學業，現已畢業。現史系辦公室專任助理蔡偉娟，新竹師院畢業後，曾入讀該屆，僅唸完大一，即考入新竹教大碩士班。

2004 學年度，教的是進修學士班第三屆（即史夜第三十三屆，2003 級，學號 E-92 者），該班王竹君、劉巧楹等三位女生，幾乎每年都報名參加導生盃籃球三對三的鬥牛比賽，雖敗多勝少，卻並不氣餒，精神可嘉。王竹君畢業後，在南山保險公司工作，劉巧楹則入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班就讀。杜嘉佳，畢業後工作三年，2010 年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就讀。林卓逸，對歷史極具興趣，至進修學士班就讀前，已獲得東吳大學音樂學學士及碩士學位，2007 年夏，其尚未畢業時，即考取北京醫學大學博士班，專研中國醫學史，2010 年夏獲得博士學位，現正謀職中。

2005 年 7 月，我卸下系主任職後，即行休假研究一年，該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大二（第四屆，即史夜第三十四屆，學號 E-93 者）的中現必修課，係由王遠義副教授開授。2006 學年度起，史系進修學士班的必修課有甚大之變化，即行之三十五年的大二中現必修課，改為一學期上完的「中國史四」（3 學分），俾與史系日間部一致（日間部早在 1998 學年度已改變）。我對教授該課興趣缺缺，故自該學年度起，至 2010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熄燈告停為止，我教的都是選修課，如「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史」、「民



## 回首・臺大夜歷史 / 進修學士班

國政治史」、「民國電影史」(都是學期課)，故學號 E-93 至 E-95 (即史夜第三十六屆、進修學士班第六屆)最後三屆學生，我未悉數教過。

猶憶 2006 學年度第二學期，我首度開授「民國電影史」，有七十多人選修，選修學生除期末考試外，尚需繳交期末報告一篇，我言明將於期末報告中遴選出前三名，第一名可獲百老匯影城電影票 (半年內有效) 十張，第二名六張，第三名四張，以資獎勵。結果大四之林卓逸以瓊瑤「三廳」電影研究之報告得到第一名，第二名為學號 E-93 之大三女生 (姓名已忘)，第三名為大四之杜嘉佳。大四王竹君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報告，雖圖文並茂，彩色繽紛，惟限於名額，算是遺珠之一。臨頒獎時，獎數略有所調整，前三名獲得之電影票改為六、四、二張，餘下之八張，則由未獲名次者抽籤得之。

2010 學年度第一學期，係我最後一次在進修學士班開授「民國電影史」，因在學學生無多，只有 E-95 之黃瓊慧等幾人來選修 (已選修過該課的 E-93 之邱盛彰則不時前來觀影)，仍勉力授完，為我三十五年之臺大史夜教學生涯，劃下難以或忘的休止符。

20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我亦在日間部開授「民國電影史」，係碩士班研究生與大學部學生共上的選修課，甫考入碩士班的 E-95 級畢業生瞿正瀛，雖已在進修部上過該課，仍再度來選修，且從不缺課，至為難得。

以上所述，雖冗長瑣細，且只是我個人的片面經歷而係我記憶所能及者，但已彌足珍貴。因為臺大史夜 (含進修學士班) 自 1971 年 8 月成立，至 2011 年 7 月結束，四十年間共招收三十六屆學生 (學號 E-60 至 E-95，每屆一班，以每班平均 55 人計，總人數已近兩千)，其中有二十五屆上過我的中現必修課，三屆上過我的選修課。史夜雖有其他的必修課，如中國通史、西洋 (世界) 通史等，都是由好幾位老師輪流開授。而且除了課堂之外，我尚參與史夜的籃球活動，也擔任過好幾屆史夜學生的導師及系主任，故所留下的記憶應該特多，今趁我記憶力未全然衰退之際，將猶存於腦際的相關往事不厭其煩地一一撰成文字，俾免日漸遺忘流失，並以此文致贈所有史夜系友，永資紀念。



▲胡平生老師於 2011 年 3 月 22 日校方舉辦的「卸任主管暨退休人員茶會」獲頒獎章，並代表退休人員致詞。胡老師在臺大專任教職逾 37 年，曾任歷史系主任，2011 年 2 月退休，並獲聘為本校名譽教授。(攝於臺大第一會議室，臺大人事室提供)

# 師友分享

## 生命中的美好記憶

呂世浩老師

夜歷史的同學們，恭喜你們畢業了！在國立臺灣大學四十年的夜間部歷史中，你們無疑的劃下了一個圓滿的句點。

對於夜歷史的同學們，我個人的感情是極為特殊的。在進入臺大歷史系成為專任教師前，我個人先在臺大夜歷史有著為期一年的兼任教師經歷。對於一個教師來說，第一年的授課往往是生命中難以忘懷的經驗，總是難免擔心，自己的授課方式，同學能否接受？講課的內容，對於同學會否太深或太淺？課後的要求，會不會太重或太輕？然而，隨著第一個學期的授課後，夜歷史的同學們給了我許許多多的鼓勵；而你們上課的認真表現和期末的答題內容，更往往帶給我大量的驚喜。也因此成為專任教師以後，我寧願在學期裡多開一門進修部的「史記三」，就是希望陪你們走過大學生涯的最後一段旅程。我真心的感謝你們，對於我在臺大歷史系的教學生涯來說，你們給了我一個最好的開頭。

相對於日間部的同學，夜間部同學的求學生涯往往更為辛苦。你們之中，有的是事業有成之後，再來立志求學；有的是就職多年後，仍不忘努力進修；有的是白天打工，

晚上和假日還要上課，過著勤工儉學的生活。雖然求學生涯未必都盡如己意，但你們絕不比任何人差，因為從你們許多人上課時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一顆顆追求真知和奮鬥不息的心。人生的路十分漫長，歷史中無數的例子讓我們知道，暫時的落後不代表最後的結果，追求真知和奮鬥不息的精神，正是上天給予人類最寶貴的資產，而你們已經擁有了。

心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心的強大才是真正的強大，希望你們都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在未來都能得到你們衷心所願的人生。

（撰於 2011 年 6 月 23 日）

## 文曲夜話

90 級系友周倍宏

夜影寂靜，舍外喧囂，椰林風影，千嬌百媚。  
日出影斜，學子紛紛，廬內鼎沸，九流十家。  
星光燦爛，湖波褶褶，燈火依舊，千綻萬放。  
時光荏苒，歷史悠悠，夜廬不再，一覺百年。

（撰於 2011 年 6 月）





## 回首·臺大夜歷史 / 進修學士班

努力不懈，點滴在心頭

88 級系友郭永發

我是 1999 年進入進修部歷史系的學生，白天在桃園工作，下班後立刻開車前往臺北上課，每日來回百公里的車程，不曾爲苦，因爲臺大校園的美麗，消除了我白天工作的煩累，尤其是每年杜鵑花開的季節，更使我的心情莫名地愉悅起來。回憶剛進臺大那年的 11 月某日，晚上十點多，下著滂沱大雨，開車在高速公路回家的途中，突然濺起一陣水花，造成車子的所有警示燈全部亮起，心裡想著，在這麼晚的時候車子拋錨會造成我很大的麻煩，所幸經過一會兒，車子恢復正常。這時候產生一個念頭，每天這麼辛苦的到臺北上課所爲何事？讀歷史系對我的工作完全沒有任何幫助，畢業後也無助升遷，爲什麼不像其他同事下班後回家休息或是看電視？能使我努力不懈地完成學業，箇中原因除了有美麗的校園外，更重要的是歷史系有許多良師。

大學新鮮人時，劉景輝老師的「世界通史」課程，開啓我對歷史的興趣。大二的時候，遇到學貫東西三千年的吳展良老師，老師的淵博學識，使我瞭解歷史並非我想像的那麼簡單。大三的時期，上過導師古偉瀛老師的課程，才知道如何從事歷史研究，其次，古老師對學生溢於言表的關懷，讓我倍感溫馨。另外，修過王遠義老師的課程，我這才明白現代世界體系的運行狀況。最後一學年，選修李文良老師的「臺灣史」，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對它有更深刻的認

識，也更加關愛這塊土地。除了上述啓迪我熱愛歷史的良師之外，還有許多老師的教導，使我點滴在心頭。

人生或許會有些意外，能進臺大進修部歷史系就讀，對我而言是一個意外，也更加珍惜這樣的意外。教育應該提供多元的管道，讓有心學習的人，經由不同的管道，達到學習的目的。感謝學校與歷史系提供這樣的管道，使我有機會繼續學習，經過這五年，培養我閱讀歷史書籍的習慣，這個習慣，將是我人生最大的收穫。

（撰於 2011 年 6 月）

生推月下門——進修部歷史系感言

90 級系友何維德

1999 年夏初，無意間收到永和社區大學一張招生宣傳單，裡頭開列了一門「臺灣史」課程，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時，剛成爲新手爸爸，被小孩搞得焦頭爛額。工作上的一成不變，精神至爲苦悶。老婆看我可憐，發了慈心，讓我每個禮拜一個晚上，可以出去上兩堂課透透氣。

這門課是前臺大歷史系教授吳密察先生和他三位碩士生高足（分別是黃智偉、林欣宜、李國生老師）合開的，從荷蘭時代一直講授到二二八事件。吳老師口才、功力自然不在話下，其他三位老師也很盡責銜接得很好。

對我而言，從小到大，過往歷史教育的



養成，是一種不假思索的知識灌食。但是，一旦開始掙脫教條被引導產生思索的空間，所有史料上的人、時、地與結論就馬上形成立體化與多視角了，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學習上的莫大刺激。老師可能看我讀得情緒高昂，就聊到臺大夜間部有開設歷史系一事。當下，興奮莫名的我就決定這「歷史系」是今生一定要進去唸的。

一年之後，社大課程結束，又恢復規律機械的上班族生活。讀書一事一直盤旋在腦海，揮之不去，生活被填塞到幾乎沒有空隙可以唸書。戰術上決定採用插班轉學考，但如何讀這上下四千年的中國通史？不過至少不會再接觸到惱人的數學。戰略上最大的假想敵，就是我自己讀書的動機與目的，究竟只是滿足某種歷史窺探究底的癖好？或是需要一張文憑來證明自己？我決定先考進去，邊讀邊尋求答案。2002 年初，恰巧香港老闆把公司收掉，我領了一筆資遣費，可以暫時不用工作。蹲在麥當勞數月後，終於如願以償地考上進修部歷史系。

重作學生後，爲了能準時在晚上六點半到校上課，白天出版業務工作很自然地被訓練成效率與紀律並重。下午的工作幾乎在上午就要完成，下午則預備處理隔天上午的事務及應付突發事件。如此，工作上不帶給同事、客戶困擾，才能讓公司長官在背後支持你。

離開校園太久了，一個人從二年級開始讀起，多虧班上的老大哥空軍士官長懷裕兄個性圓融，善於折衝，辛苦的班代倍宏兄到處奔波叮嚀囑咐同學，而架班級網頁留言版

的桂思強和組織共筆團的厚任兄，他們不只維持住班級同學的凝聚力，更讓我很快地融入這學習的新環境。

進修部歷史系同學很引以爲傲的一件事，就是咱們的授課教授，幾乎是日間部原班人馬，我真的很感謝他（她）們犧牲用餐與家庭生活時間。印象中，鴻中師大概是授課時數最多的老師，長義師某學期很有義氣地將自己的課，從 AB 堂調到 CD 堂，頓時化解許多同學必修課衝堂的困難。雖說世人常言「人師難尋，經師不再」，但系上的老師都有一股難言的特質。他們都很尊重學生們的獨特性，雖不是口若懸河、大家風範那一型，但在教學中不經意地流露出其人生哲學與治學態度，這是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共處，才能感同深受而內化爲個人心法。那時，周遭親友都建議我應該直接去考研究所，何必花這五年的晚上時間辛苦讀書，但我很慶幸當初讀進修部的抉擇是正確的。

課堂上授課的內容，很容易被時間沖淡，然而師長治學嚴謹態度，如庚堯師批報告，幫學生一字一句挑誤修正；震華師教授進修部最後一屆舊制的「中國通史」，備課如此戰戰兢兢；偉瀛師、鴻中師分享當初學習電腦經驗，都影響我轉變過往不嚴謹、逃避或畏懼的學習態度（比如再怎麼畏懼面對群眾，若有上臺報告機會，一定會積極爭取），甚至同事也隱約察覺到在我工作學習上的正向轉變。我想這種自我體驗得來的改變永遠不嫌晚，這一個轉捩點支撐我終生學習的開端。

被夜色墨濡滲透的臺大校園，是無法感



受到她的美感，除了刺眼的體育場照明設備。在課堂結束交錯，總是靠著雙腳飛奔在偌大校區中的暗幽曲徑，穿梭於普通教室與共同教室之間。無景可賞，也無心賞景，但總是有那深烙於心底的景象。特別是蕭颯淒苦的冬天雨夜，總是有莫名的孤獨感。往往上完最後兩堂課，在校工的吆喝催促聲中，趕緊檢查教室與投影機電源，匆匆走上歸途。這一段回家的路特別有感觸，課堂餘音裊裊，讓思緒還在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興奮與感傷中迴盪不已。那種興奮是可以和古人無止盡的交談對話，那種感傷是反映生命現實，我們無能為力但終究不能棄守信念或放棄努力。

在求學的五（2002-2007）期間，不免有些難忘與感傷的師長身影，縈迴久久，揮之不去。在今天後現代（應該算是後後現代了）懷疑、虛無、絕望論者高歌叫囂的時代，世宗師可以舌戰群生，從日間部放學纏鬥到夜間部上課，我不只因他捍衛真理撼動學生而感動，也看見他能享受真理而欽羨不已。那一陣子，常耳聞不少同學有憂鬱症傾向，旁觀世宗師對徘徊生命困境的學生，一個都不能放棄的堅持。在我不只一次與他交談中，我的宗教信仰一直被挑戰，被逼到死角重新審視，這痛苦的過程反而讓我靈命更新，重新走出信仰幽谷。

鴻中師上課就像一位帶著佩劍的儒俠，他話不多，就靜靜地等著您出招，只要學生一亮劍，保證往來交鋒都會迸發智慧火花，精采可期。有一學期偉瀛師要預備出國發表論文，請鴻中師先帶「史學方法（上）」，

第一天上課，他就設局請日間部學生來個無厘頭的攪局，當我們同學還愣在當下，老師笑瞇瞇地請我們回憶剛才發生何事？結果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連有幾個人、男女人數都沒有定論。接著他就讓我們討論何謂「真實」與「歷史事實」。老師果然像大俠，上課招無定式，且戰且走，一會兒練習傳記寫作（討論歷史傳記的優劣），一會兒口述歷史採訪，然後又搞影像史學，老師玩得開心，同學們也覺得獲益匪淺。

2007 年上半年，選修東華師「民國史學與史家」（他和庚堯師長期輪教大一「史導」），隨後李老師就自系上退休轉往輔大，我意外成為他臺大夜間部的關門弟子。而其備課認真及有始有終，毫無即將離開臺大校園之跡象。東華師上課臧否人物直言不諱，甚至包括系上其他老師，但態度非常嚴肅，總抵就事論事，頗有傅老校長大砲之風範。講到民國史學，對顧頡剛這一段學術風雲公案，老師感觸頗多，分析至深，提到顧氏弟子童書業及楊向奎後來與老師反目，東華師愈講火氣愈大，忠孝節義想必是課堂中他更為看重的部分。其北方漢子身軀猶歷歷在目，令人難忘，怎料世事無常，2010 年 7 月因病遽逝，這是我求學間最感傷的事。

在進修部（夜間部）劃下休止符那一刻，對於渴望博雅人文學科薰陶的社會在職人士（特別如我這種技職教育體系的背景）而言，無疑是關上了一扇門。社區大學因經費嚴重短缺，愈來愈趨向開設生活技藝或社團化之課程，公共圖書館資源有限，和借閱者互動性還是嚴重不足，毓太老師的奉元書





院如今也已成絕響。歷史學是文明遺產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現今一談到文明與文化就想到「文化產業」，幾乎沒人在談「文化傳承」。抑或需先形成「產業」才易於「傳承」？這些都是我不解與還在思考的地方。

沒有列名文中的師長，在我仰望充滿繁星的夜空時，除了感受到那不可知的力量外，總是會想起你（妳）們的容顏。謝謝進修部 90 級永遠的胡主任（我們這屆很特別，歷經高明士、胡平生、吳展良三位系主任），在 2003 年 3 到 7 月 SARS 肆虐期間，穩定人心，幫助同學甚多。系辦處理進修部選排課的助教、進修部的辦事先生小姐職員、晚上辛苦守候的校工，我喊不出您們的名字，但是謝謝您們在同一個夜空下與我的生命曾經重疊過。當然最辛苦的還是內人，求學期間家中還多添了一個寶寶，她是最偉大的幕後推手。

（撰於 2011 年 6 月 20 日）

### 熄燈了，淡淡哀傷

90 級系友陳懷榕

2001 年初，我以已逾不惑之年參加了學測。猶記得那天第一堂考試，當預備鈴聲響起，監試人員在講台上面無表情地宣布：請陪考家人離席，還直往我身上瞧，實在令我有些無地自容的窘迫。因為放眼望去，盡皆是 20 歲左右的年青人，唯獨我是已過 40 的中年人。不意，放榜後竟然接到臺大的通知單，著實讓我驚訝！說真格的，我自己都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直到開學後，某日行經小椰林道，望著過往的學生，自己猶如仍在夢中，不敢相信已身為「臺大人」了（雖然是有點二娘生的味道），還狠狠地咬了自己姆指一口，才確信這是真的！

臺大生活的確是人生中最精采的一段。尤其是師長們的教誨與啓迪，不但打開了我們的視野，更提昇了我們的眼界。在這一千多個日子裡，不論是普通教室、共同教室、圖書館、小巨蛋或其他教室，都曾讓我流連不已。其間的人、物、事，更是讓我魂縈夢繞。如今「進修部」的熄燈號即將吹起，確實讓人有股說不出的淡淡哀傷。

2011 年 6 月，校方舉辦「臺灣大學進修學士班回顧特展——夜讀同窗共剪燭」，我偕妻一起去回味這即將走入歷史的點點滴滴，因為要不是內人的全力支持，我亦無法順利地從臺大修成正果。如今，難得她已退休，正好趁此機會讓她檢視一下，她當年辛勞的代價為何！



▲進修學士班回顧特展展出「臺大夜間補習班」、「新舊制夜間部」及「進修推廣部」各階段之珍貴文物（2011 年 6 月 1 日臺大檔案展示館攝）

## 回首・臺大夜歷史 / 進修學士班

「臺大進修部」雖即將成為歷史，但我相信每個從「她」這裡走出來的學子，在自己的生命歷程中，這段時光都是人生中最璀璨的一部分，就讓這段歷史永遠在我們的生命中綻放著吧！

（撰於 2011 年 6 月）

### 夜闌人靜，誦習之聲不絕若縷

臺大法律系司法組林勇年

我個人雖非進修推廣部的學生，但與其緣分早從大一時就已開展，與進修推廣部的互動大約可分幾個不同時代，事實上也反映了本人大學生涯的轉變。適逢進修部徵文活動，有感而發，遂自不量力略發淺見，記錄這段過程，期許拋磚引玉，與上過進修部課程的師生共同保存一段回憶。

首先是「旁聽生時期」，很幸運的，我的本系也有進修部，是故在聽課上多了一些選擇。我那一屆不知何故，向來較受學生好評的老師恰好不是輪休就是借調，導致我無法一親名師之芳澤，好在有部分教師在進修部仍有授課，於是常與同學「揪團」去旁聽。遙想起甫步出藩籬踏進自由的大一，與高中舊識和大學新知每週四晚上與陳聰富老師「民法總則」之約，雖然如此譬喻並非妥當，但卻有種「補習班」的回憶湧上心頭的感覺。當然陳老師幽默風趣與深入淺出的教學讓人忘卻時間的流逝，很快地一個學期進入尾聲，迄今仍不時回想起陳老師最後一堂

課的勉勵：「法律是一門冰冷的學問，但是學法律的你們要有一顆溫暖的心。」民法為何物，也許早已退出記憶的倉儲，這席話卻依然言猶在耳。

之後也曾想過繼續旁聽其他進修部的課程，但隨著人際網絡的擴散，花在課業上的時間與精力受到壓縮，縱使心血來潮，也僅止於蜻蜓點水，未如前述般地完整聽取。臺大校園多采多姿的社團令人流連忘返，對於二十歲左右的青少年而言，終於逃脫考試的魔掌，獲得自在發展的舞台，誰還會想繼續待在教室裡？與進修部的邂逅也隨之停擺了一段時間。

青春大一終有變成老練大四的一天，與進修部的再次相遇，已來到了大學生涯的尾端。儘管早在大二時就已申請核准雙主修，但繁重艱澀的本系課業與琳瑯滿目的課外活動使之停滯，真正下定決心打算完成第二個學位時，卻驚覺學習生涯已步入尾聲。為求及早順利修滿學分，除了加緊修習日間部課程外，也求助於進修部課程，由此與其再續前緣，進入了「修課生時期」，課程選擇上也由本系相關轉向了雙主修相關。幸好進修部課程不易與白天正課衝堂，雙管齊下，一步步修完學分。

進修部與日間部課程形式上最大的差別也許在於人數的多寡，進修部歷史系小而美的氛圍，使人心嚮往之。衣若蘭先生的「中國史三」是極佳範例，老師很容易記得每位同學的名字，上課時也較有機會互動問答；除了正課外，不時分享學習歷史的心路歷



得學分，進修部也多了幾許浪漫，無論是師生間的亦師亦友、同儕間的世代交流或是進度上的雙向調節，或許都是日間部課程較難企求的層面，很幸運能搭著進修部的末班車，逐步朝向目的地前進。


(撰於 2011 年 6 月 26 日)

探索臺大檔案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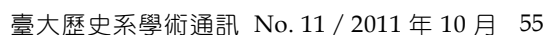
夜讀同窗共剪燭  
李士進修學士班歷史回顧

Evening Study and Wick Trimming by the Same Window: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Studies at NTU

名詞對聯是有趣的，巴山或高麗刺泡，  
別當典寶而高揚，卻挂巴山皮而時，  
李國瑞， 莊鴻春此



中文系李惠綿老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上進修部課程是「踩著夕陽上學，踏著月色回家」，詩意翩翩。除了求取學問獲





# 國分直一藏書與標本文物展 簡介



本刊編輯部

編按：

本期「校園展覽」單元，介紹「國分直一藏書與標本文物展」，該項展覽為「全方位的民族考古學者——國分直一」系列活動之一，由臺大圖書館、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主辦，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指導，展期自 2011 年 9 月 19 日至 12 月 2 日。本期封面與內文圖片及展覽相關資料均由臺大圖書館提供，特此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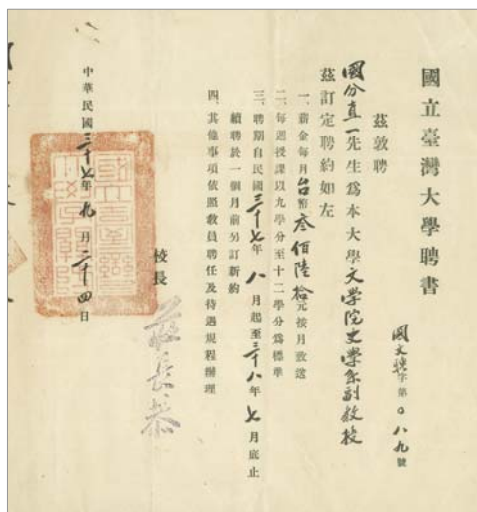
## 國分直一生平簡述

國分直一（1908-2005），出生於東京，1908 年即因父親工作關係，隨雙親遷居來

臺，小學至中學教育皆在臺灣養成。1927 年就讀臺北高等學校文化甲類科，著名的博物學家鹿野忠雄（1906-1945?）是高他一屆的學長，國分直一受其影響，喜歡爬山，尤其關心泰雅族的生活和信仰。1930 年，返日就讀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1933 年畢業；當年 9 月回臺灣，任教於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今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1939 年初，與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移川子之藏（1884-1947）、宮本延人（1901-1987）及醫學部金關丈夫（1897-1983）等人前往高雄大湖貝塚進行考古發掘與調查，為二次大戰前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的學者之一。此後

至 1949 年離臺前的十餘年間，國分直一在臺灣各地進行田野調查及考古發掘，並撰寫與考古學、民族學相關的文章，「臺灣可說是他從事科學研究的搖籃」。<sup>1</sup>

1945 年日治時期結束，臺北帝國大學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國分直一與金關丈夫被留用，1947 年 7 月至 1949 年 7 月間，



▲國分直一教授 1947 年 7 月-1949 年 7 月間獲聘為臺大文學院史學系副教授的聘書（臺大圖書館提供）

<sup>1</sup> 〈「全方位的民族考古學者——國分直一國際學術研討會」活動報導〉，見《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電子報》第 36 期（2011.9.29 發行），網址：<http://www.tiprc.org.tw/blog/post/1/409>（2011.10.11 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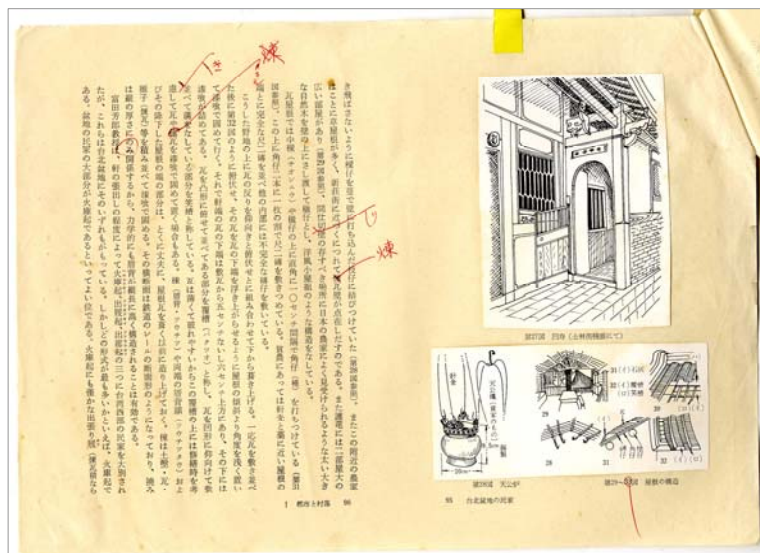


## 國分直一藏書與標本文物展簡介

國分直一獲聘為臺灣大學史學系（臺大歷史系前身）副教授。移川子之藏與宮本延人相繼返回日本後，史學系民俗學研究室（原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講座）的研究與教學工作即由國分直一負責。其後民族學研究室相關資源併入 1949 年成立的臺大考古人類學系，<sup>2</sup>臺灣第一代考古學者陳奇祿、宋文薰均為國分直一之得意門生。1949 年 8 月辭臺大教職，回日本定居，仍從事考古研究，筆耕不輟。

國分直一為臺灣平埔族群研究先驅，首先提出西拉雅族祀壺傳統研究。他的研究興趣廣泛，喜於四處蒐購並博覽人類學、民族學與考古學的圖書資料，更勤於田野調查，主要研究領域涵括臺灣、日本列島、琉球列島、朝鮮半島、中國東半與東南亞等地區，並進行全面的人類學與考古學探勘、記錄與深入分析。國分直一論述力與行動力皆極旺盛，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至今仍少出其右者，且其研究充分結合考古學與民族學，獲得「全方位的民族考古學者」之稱，在臺灣與日本學界皆佔有指標地位。<sup>3</sup>

國分直一重要著作有《台灣的歷史與民俗》（1968）、《環シナ海民族文化考》（1976）、《台灣考古誌》（與金關丈夫合著，1979）、《台灣考古民族誌》（1981）、《壺を祀る村——台灣民俗誌》（1981）、及《東アジア地中海の道》（1995）等，另譯有李濟的《安陽發掘》（1982）。至 2005 年以 96



▲《壺を祀る村》（法政大學出版局，1981）出版前，國分直一在頁 95-96 的校稿。（國分直一遺贈，臺大圖書館典藏 / 提供）

歲高壽辭世前，考古研究從未間斷，留有遺稿《日本民俗文化誌》，後由日本山口縣立大學安溪遊地教授親自整理手稿，主編日文版，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陳有貝副教授率領李作婷博士與邱鴻霖博士進行日文索引編輯與中文翻譯，臺大圖書館於 2011 年同步出版日文版及中譯本，在此次系列活動中正式發表，以紀念國分直一這位一生對臺灣文史研究充滿熱情的學者。<sup>4</sup>

### 臺灣考古發掘<sup>5</sup>

1939-1946 年間，國分直一與多位學者合作，在臺灣各地進行考古發掘，包括大湖

4 同註 1。

5 本節簡述國分直一在臺灣進行之考古發掘概況，皆引自「全方位的民族考古學者——國分直一系列活動」摺頁說明。本考古文物展由陳有貝副教授、李作婷博士等人共同策劃，詳細「參考資料」請見摺頁。

2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簡介，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anthro/>（2011.10.11 檢索）。

3 國分直一著作展簡介，見「全方位的民族考古學者——國分直一系列活動」摺頁。

## 校園展覽



▲國分直一收藏之臺灣考古文物，左起：大湖貝塚遺址陶器、營埔遺址陶片、蘭嶼遺址玉飾、卑南遺址陶器。  
（國分直一遺贈，2011 年 10 月 7 日編輯部攝）

貝塚、營埔遺址、卑南遺址、苑裡遺址、圓山遺址及蘭嶼等地。

國分直一最早參與的臺灣考古發掘，是大湖貝塚的調查。此地由國分直一與荻原直哉於 1938 年調查發現，1939 年國分直一與當時任教於臺北帝大的移川子之藏、金關丈夫、宮本延人進行發掘。出土的遺留中包含各種鹹水和淡水的貝殼，石器方面則有大型犁形石器、石刀和打製石斧等，陶片屬紅褐色夾砂陶、黑色泥質和灰黑色夾砂陶。透過這次發掘，國分直一除了確認臺灣黑陶文化所代表的中國南方要素是由大陸東南沿海傳入臺灣的論點外，更進一步指出臺灣的有

國大陸的文化要素。

除此之外，國分直一可說是最早對臺灣中部的大肚丘陵西部和大肚溪北岸一帶進行調查的學者，其中包括營埔遺址的調查工作。營埔遺址分別在 1943 年 8 月、1944 年 3 月與 1946 年 8 月進行三次小規模的發掘和多次調查。國分直一等學者注意到營埔遺址的黑陶與南部的黑陶性質不同，但也認為和大陸有所關聯。

1946 年，國分直一與金關丈夫對苑裡的貝塚遺址也開始進行發掘工作。同年，國分直一亦參與「蘭島科學調查團」，和金關丈夫、金子壽衛男等人前往蘭嶼，進行民族學和考古學方面的調查。

苑裡遺址的出土器物包括種類豐富的貝殼及大量的破碎獸骨，陶器部分則有黑陶、紅褐色和灰褐色印紋陶。這些陶片的燒製溫度高，質地也頗為堅硬；石器以打製斧鋤形器和凹石（石鏈）的數量為多，另外發現了兩把鐵製小刀。從石器與鐵器的共同出現，國分直一認為這是金石併用情況的證據。他也從黑陶的存在及陶質更為堅硬的跡象判斷，苑裡遺址可能屬於營埔黑陶文化的後期發展。



肩石斧、有段石鏃、磨製石刀和石鏃等石器和黑陶文化一樣，具有中

◀國分直一（左）至蘭嶼進行考古調查，與當地鄉民合影，拍攝時間不詳。（國分直一遺贈，臺大圖書館典藏 / 提供）



## 國分直一藏書與標本文物展簡介

### 畢生收藏遺贈臺大

國分直一畢其一生積極蒐集相關之學術研究資料，典藏豐富，有如一所專門圖書館。臺大圖書館自 2008 年 5 月起，即積極與家屬聯繫，並在金關恕教授（金關丈夫之子）與安溪遊地教授協助下，獲得家屬同意，將國分直一生前所收藏的圖書資料、手稿、標本等捐贈給臺大，而於 2010 年 6 月運抵本校圖書館。這些在臺灣挖掘出土、散置海外的史前文物得以重歸故土，深具意義，也將有助於推展本校與國際學者共同進行國分直一資料之後續研究。臺大圖書館五樓已設置國分直一專區，保存與展示這些圖書資料，器物部分則是放在人類學系，人類學系亦動員許多留日學者整理這批文物。未來這些文史資料將進行數位典藏，提供給國內外學者使用。

臺大圖書館近年來於國內外徵集相當數量之珍貴資源，國分直一贈藏不但是最大宗，亦最具有臺灣歷史文化價值，值得學校

與政府共同重視國分直一資料之整理典藏，並支持後續之研究出版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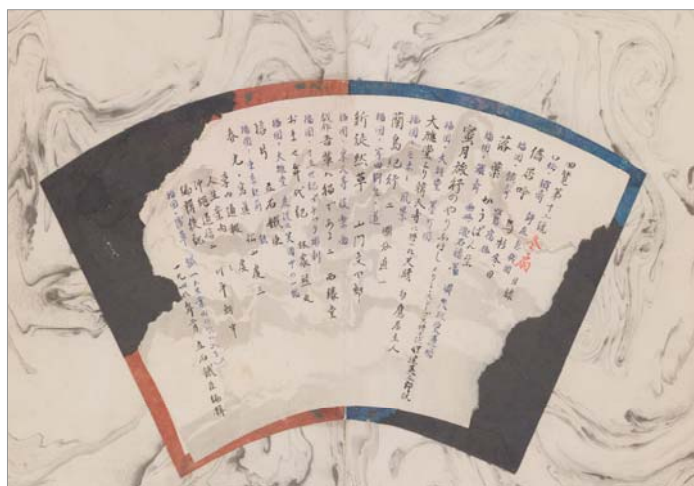
### 本期封面圖片簡介

臺灣光復後，部分日本學者被留用，以持續進行他們在日治時期的研究工作。以金關丈夫為首的一群學者，秉持身為知識分子對真、善、美的自主追尋，創辦了《回覽》雜誌。此撰寫工作，幫助留用的日籍學者超越困境，包括二二八事件帶來的困難，因此，該作品不僅撫慰在臺日人的心靈，亦可說是激盪中的時代紀錄。<sup>6</sup>

《回覽》雜誌成員大部分隸屬於臺灣大學，包括矢野峰人、宮本延人、立石鐵臣、池田敏雄、國分直一等人。雜誌由成員輪流主編，負責邀稿、編輯、命名和封面設計等，內容相當多元化，刊載文學作品、回憶錄和散文。1946-1948 年間，《回覽》雜誌出版 15 卷共 23 期。金關恕教授表示，父親回日本時，將所有《回覽》雜誌攜回收藏，晚年將其移交給國分直一保管。

此次國分直一捐贈臺大圖書館所藏物及圖書，館方亦借出整套《回覽》雜誌，進行數位掃描，以利永久保存。

本期封面是《回覽》雜誌第十二號「冬扇」之手繪目錄頁，頁末註明「一九四八年二月 立石鐵臣編輯」，該期並收有國分直一所撰之〈蘭島紀行〉。



▲《回覽》雜誌第十二號「冬扇」之手繪目錄頁。  
（借自國分直一家屬，臺大圖書館提供）

<sup>6</sup> 安溪遊地說明，〈「回覽雜誌」〉，見「全方位的民族考古學者——國分直一系列活動」摺頁。

# 浙江大學及杭州歷史文化遺產參訪紀要

李長遠（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杭州為南宋古都，歷史文化遺產豐富，杭州市的浙江大學為目前大陸研究宋史的重鎮之一。筆者有幸獲得臺大歷史系「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經費補助，於 2009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4 日赴杭州進行短期訪問考察，主要參訪杭州的學術研究機構，包括浙大歷史系、浙大的「宋學研究中心」和「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以及杭州當地的歷史文物遺址。

此次得以順利成行，感謝本系方震華老師代為聯繫包偉民教授。包老師在當地不僅提供諸多協助，並引介浙大歷史系吳錚強教授與杭州市社會科學院南宋史研究中心魏峰先生，為我介紹浙大及杭州當地文物古蹟。此外，亦蒙東景南教授與何俊教授的熱情款待，分享其研究上的經驗，令人印象深刻。謹向諸位老師致上誠摯的謝意。

10 月 31 日（六）

本日的主要行程是實地考察南宋臨安皇城的宮殿遺址。包偉民教授的學生、現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研究員魏峰，為我導覽南宋宮殿遺址。魏兄是甘肅蘭州人，具有北方人豪爽的氣度，他在路上向我說明，昔日的南宋宮殿現在已不可見，「宮殿遺址」本身不是已經整理好的遺址，而僅只確定了四至。也就是說，宮殿牆基仍深埋地下，經過近年來的發掘與調查，也只大致釐清位置和範圍。

我們從萬松嶺路轉上鳳凰山，先去拜訪目前擔任杭州南宋皇城遺址文物保護管理所文物科副科長洪俊先生。洪先生正著手修復的古蹟是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所建的兩座佛教柱幢——「梵天寺經幢」。兩座經幢建於北宋乾德三年（965），距今已逾千年，但仍保留大致原貌。這是一對南北對峙的經幢，結構基本相同，皆由基座、幢身、腰檐、短柱層及幢頂五個部分組成，雕有覆蓮、盤



圖一 筆者因修復工程鐵架而得以攀登上經幢



圖二 近距離拍攝梵天寺經幢的雕刻造像



龍、菩薩造像等，幢身並刻有不同的佛教經文和「建幢記」。由於正在進行維復作業，因此兩座經幢皆構築有工程鐵架，我們戴上安全帽和手套之後，可以攀架而上，近距離觀察每層經幢的造像和雕刻，可說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圖一、圖二）。

從梵天寺經幢向西遠眺，當年的南宋宮殿舊址已是一片為茂密林蔭覆蓋的山坡（圖三）。我們經由小徑一路往山上走，隨後即進入昔日南宋宮殿的範圍內，但映入眼簾的盡是荒煙漫草，已無法想像當時榮景。接著，在山壁上出現大大的「忠實」兩字題刻，據說是南宋高宗親撰，一旁的落款已不知去向，留下一方明顯的凹陷（圖四）。魏兄向我說明，現在我們所處的位置已在當年「聖果寺」的範圍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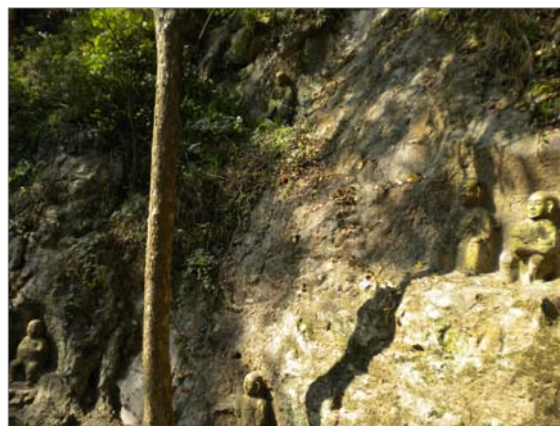
聖果寺始建於隋文帝開皇二年（582），至唐昭宗乾寧年間（894-898），無著文喜禪師復興開法，始稱聖果寺。宋室南渡，這裡被劃作殿司衙，和原來的御苑相連。此地雖迭經變幻，但存留的古物頗多，可以說是鳳凰山歷史遺跡最集中的地方。再往前走，便是所謂的北宋「十八羅漢造像」，聽魏兄說，當年文化大革命時，幸好有一群浙大學生圍著保護這群造像，才能免於被紅衛兵破壞。對於讀文史的魏兄來說，回想起文革仍相當痛心。現在近看羅漢像，依然能見到頭部有經過後世重塑的痕跡，而身軀則保留了歷經歲月摧殘的滄桑感。唯一較能反映「十八羅漢造像」原始樣貌者，可能是雕刻在山壁較高處的一尊，不僅較其他造像具一體感，也更顯得斑駁（圖五）。



圖三 已難想像這片山坡是昔日南宋宮殿舊址



圖四 據說是南宋高宗親撰的「忠實」二字，一旁的凹陷是原來的落款處



圖五 「十八羅漢造像」（照片上方的造像，可能是唯一保存原貌者）



我們繼續探訪了幾處遺跡，但因為有的雜草叢生，或經人為破壞，已不能清楚見到實物。在據聞為五代「西方三聖」造像殘跡之前，竟然還有一座小廟，並聚集了不少人在進行小型法會。不禁令人感慨，文化古蹟最終還是抵不住現實需求的破壞。

中午我們步行到附近的孔廟，參觀著名的「杭州碑林」。今日的孔廟乃據舊址重修，大成殿金碧輝煌，卻也門庭寥落，更少了一分歷史感。不過，孔廟周邊的房舍內外卻收集了大量的碑刻文物，據說在 1949 年後，有關部門便將新發現的碑刻集中存放於此。其中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南宋太學石經」（圖六）。這批石經是南宋太學所遺留下來的文物，刻印了《周易》、《毛詩》、《尚書》、《春秋》、《論語》、《孟子》及《中庸》等儒家經典。據考證，原來應有 131 石，現僅存 85 石，且多有字跡模糊毀壞的情況。傳聞這批石經還是南宋高宗和皇后吳氏的手書，可說是現存唯一的皇帝御書石經。魏兄透露，曾有朋友比對《論語》石經和今本《論語》內容，發現有不少差異處，如果進一步研究，或許可以作為《論語》版本發展的一條新線索。可惜因《論語》石經可辨識的部分並不完整，最後仍無法做全面分析。



圖六 杭州孔廟所保存的碑刻——「南宋太學石經」

傍晚，我們經由曾是民初金融街的中河中路，走到目前已發掘的「南宋御街遺址」的某一區塊前，可以看到從南宋、元代一直到民國的路板，呈現一種「層累式」的堆積，藉此能夠想像歷代都市修路的概況。雖然「南宋御街」的位址已大致明瞭，但地表上已是現代的道路和建築，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發掘，目前也僅能藉由小區塊的整理，提供後人和研究者緬懷罷了。

### 11 月 1 日（日）

本日主要行程為拜訪浙江大學宋史及思想史的相關學者與研究機構。上午拜會浙大古籍所的東景南教授。這是第二次與東教授請益長談，上一次已是大約一年前的事。本系「中國學術思想史教研平臺」於 2008 年 11 月邀請東教授來臺大進行一系列的專題演講，當時我陪同東教授參觀故宮博物院，藉機請教了許多治學方法。這次東教授則給我許多具體建議，特別是在進行唐宋之際的思想史研究時，應該放寬所採用的史料來源，盡可能利用所能得到的資料，以期建立一個長時間的思想史演變模型。

包偉民教授 2009 年已轉至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不過這段時間他恰好在杭州，所以這次很難得能和包教授在杭州碰面。吳錚強教授是包教授的學生，2006 年畢業於浙大歷史系，並留校任教，主要研究領域是唐宋社會史，而他與我同樣關心的議題是兩代士人群體如何在時代轉變的過程中，重新定義自己，或採取不同的策略、方式，與君主分享統治權力。從吳教授贈與我

## 浙江大學及杭州歷史文化遺產參訪紀要

的新書《科學理學化——均田制崩潰以來的君民整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便可大致瞭解他最近的研究方向。

下午與包、吳兩位教授在浙大歷史系的辦公室閒談。包教授談到很羨慕臺灣有長期的讀書會制度,像「宋史讀書會」便讀過《名公書判清明集》和官箴、墓誌等資料。包教授認為這能讓學者們時常交流研究心得,並給予研究生更多學習成長的機會。也許是由於臺灣幅員較小,相對集中了一群有共同研究領域的學者,因此能夠時常地聚會討論。對大陸學界而言,這樣的條件比較難得。不過,包教授也認為,臺灣的老師和學生也確實更有心致力於此,特別是他知道讀書會即使在臺北舉辦,還是有臺中的師生大清早便搭車北上,且不辭辛勞的當天來回,令他很羨慕。所以就這點而言,包教授感覺臺灣的學生其實比大陸的學生更為用功。

包教授還提到一點有趣的現象,他發現臺灣的學生對歷史地理的敏感度不夠強烈,因此在碰到歷史上的地理名詞或引用古地名時,時常會犯些小錯。他認為臺灣學子如能有多一點像我這樣的機會到大陸參訪走動,在研究中國史時或許會有比較不一樣

的空間感。對於這一點,我也深有所感,並談到前些日子與一位大陸朋友恰好聊到,杭州能不能代表中國的現代化城市?或者,杭州可以作為中國典型的城市嗎?那位朋友最後給我一個很有意思的結論:中國幅員廣闊,地北天南皆有不一樣的文化特色和生活樣貌,所以究竟有沒有一種中國城市的典型呢?其實問題本身就出了問題了。包教授似乎贊同這樣的看法,而且對於進行過深入的地方史研究的包教授而言,使用過於單元化的理論模型來全盤地看待中國歷史,確實必須多加警醒注意。我認為,這或許也是生活在臺灣的歷史研究者所該省思的問題。

吳錚強教授陪我走一趟西湖周邊的文化古蹟,並繼續我們的討論。首先搭車到西湖西側的岳王廟,這裡是杭州著名景點,也是祭祀南宋武穆王岳飛的廟殿,廟旁還有岳飛之墓(圖七)。根據吳教授轉述,當地的考古發掘,曾經出土墓俑證明岳飛確是葬於杭州,後來才移葬於今天的岳王廟旁。當時我對於這個說法很感興趣,可惜沒有機會進一步追究其中考證的來由。走到岳飛墓前,參觀的人非常多,墓前兩旁還有鐵欄,分別圍著害死岳飛的秦檜、秦妻王氏、萬俟卨、張俊四個人的鑄鐵跪像。

繞著廟、墓的庭園,則保存著歷代對岳飛忠勇行蹟的歌頌題碑。從江南四才子之一文徵明的「滿江紅」詞碑(圖八),乾隆御筆的碑石,到民國初年軍閥陸榮廷的「謁鄂王墓感賦」,以及馮玉祥所題「民族英雄」四個大紅題字等,皆可見岳飛長久以來作為一種民族精神象徵的歷史形象。



圖七 岳飛及其子岳雲的墓塚



## 學術交流

接著，吳教授與我走過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風荷」，但因為時入秋季，無緣見識西湖邊上荷花盛開的情景。

一路上，我與吳教授交換了許多讀書心得，他並提點了我一個意見。我長久以來關注的焦點是圍繞在宋代新儒學如何出現的課題上，也因此對唐宋之際思想史變遷的思考，不免預設了後來即將興起的理學問題，故看歷史的角度帶了某種目的論的色彩。他建議我不妨試著將理學抽離出歷史來重新思考問題，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想法。

傍晚，我與哲學系的陸敏珍教授及何俊教授餐敘。陸教授相當年輕，看上去和她一同出席的碩士生甚至有同儕的感覺。陸教授一開始便很熱情的與我談起研究的課題和興趣，巧合的是我們同樣關注在唐宋之際士人思想的轉變上。陸教授的專業原本是歷史學，拿的是歷史學博士學位，2007 年出版經修改後的博士論文《唐宋時期明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後來才轉向思想史研究。她打趣的說，自己在哲學系顯得太「形而下」，

思考問題也比較接近「脈絡化」(context)的路徑，因此目前正處於「改弦易轍」的階段。陸教授現階段研究的主題，是韓愈以降儒家內部所興起的一股關於「師道」的重振過程。她認為，藉由觀察士人群體中「師道」觀念和議題的逐漸發展和流行，可作為探索唐宋之際儒學復興的一條線索。

何俊教授的風趣爽朗，令人印象深刻。原來，陸教授在歷史系的指導教授正是包偉民教授，包教授和何俊教授相識多年，他們和古籍所的束景南教授同屬於浙大「宋學研究中心」研究社群的一員，交流的機會也多。此外，何教授早年的指導老師即是著名的宋學研究者陳植鏗先生，陳植鏗先生與包偉民教授又同樣是近代宋史大家鄧廣銘先生的學生，所以何教授可以稱得上是陸教授的師叔。聽何教授談起這些人物掌故，非常有趣味，而且何教授多次來臺訪問研究，對臺灣的學術環境甚為熟悉，勉勵我要好好珍惜現有的資源。

何教授可說是中國思想史研究這一領域的著名學者，在宋代思想和浙東學派的相關研究上，成果非常豐富。他知道我也用心在思想史的研究上，便以陳植鏗先生為例告訴我，研究中國思想史最好也有目錄學的底子，這是很基本也很重要的事，卻常常被忽略了。有傳統目錄學的根基和視野，才能對學術思想的演變和脈動有整體性的把握。何教授還談到了許多當年到美國向余英時先生問學的情況，以及人文學術的自我定位問題，更重要的是針對我所從事的研究課題，即唐宋之際士人思想的演變，提供了一些具



圖八 文徵明作於嘉靖九年的「滿江紅」詞碑



體的建議。何教授透露，他也一直對這個課題感到興趣，但他認為我們在探索這個問題時，最好能先釐清斷代問題，也就是這個變化的起點究竟起於何時？是從安史之亂開始？或者從韓愈的時代發軔？何教授點出許多問題，也啟發了我在這個課題上的思索，讓我感動不已，久久不能釋懷。

### 11月2日（一）

杭州周邊的歷史文化遺產非常豐富，接下來的兩天時間，我打算盡可能地探訪其中一二。本日首要目標便是慕名已久的「靈隱寺」及附近的「飛來峰」石窟造像。飛來峰又名靈鷲峰，山體主要由石灰岩構成，長期受到地下水的溶蝕作用，形成許多奇幻多變的洞壑。就在這些洞壑間及沿溪潤的懸崖峭壁上，遍布五代時期至宋、元數代的石刻造像，總數大約 345 尊。然而，由於開放自由參觀，不少石刻遭到磨損（圖九），而裸露在外的低處石刻，更有因時代動亂所造成的明顯破壞痕跡。

不過在溯溪而上的峭壁間，較大型的佛、菩薩及天王像仍保存得相當完整（圖十、圖十一），可以看到歷代石刻造像形式遞嬗的痕跡。就我印象所及，今日飛來峰的大型造像，大多數為元代建造，且有不少元代所刻之碑記。由於當時崇奉喇嘛教，因此造像的風格也頗有不同。

循著飛來峰石窟造像走至半山處，就是有名的靈隱寺，我還特地登上山頂的永福寺，參觀該寺所藏的佛教藝術繪畫。在藏畫館閣外還有八大山人親題的「文景閣」三



圖九 飛來峰洞窟中某些造像已有磨損現象



圖十 飛來峰石刻群中最大的造像——坐臥的彌勒佛，為宋代的作品



圖十一 飛來峰石刻群中保存較完整之崖壁上的造像之一

字，其中「景」字的「日」和「口」還被互換，暗示了他對當時權力當局的不滿。從永福寺回到靈隱寺，這是杭州最著名的古剎之一，最爲人所熟知的是流傳民間的濟顛和尚故事。從歷史的眼光來看，靈隱寺建於東晉咸和元年（326），距今已有近 1700 年的歷史，後來在吳越國時期進行了多次擴建，五代和宋的著名僧侶永明延壽、大慧宗杲等人，都擔任過住持，足見它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相當重要。文化大革命期間，浙江大學的學生們極力保護靈隱寺內外的文物和建築群免於破壞。今天進入寺院參觀，仍然可見到保存良好的「理公塔」，和殿內許多姿態各異、栩栩如生的佛教造像雕刻。

下山後，我驅車前往「胡雪巖故居」，這是幾位教授都推薦的歷史遺產，堪稱清代江南典型的園林住宅。故居已經過良好的整理，並有紀念館的性質，確實能使人瞭解當初江南鉅富的生活樣貌和人生起伏。但園庭深廣，臺閣雅緻，卻不免讓人有人去樓空的感嘆。

胡雪巖故居的對街，就是杭州「鼓樓」（圖十二），它曾是古代濱海的敵樓，舊稱

「朝天門」或「鎮海樓」，始建於南朝，千百年來屢建屢毀。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鼓樓」，已是歷經文革毀壞，2001 年才按照明代建築形式所復原的建築。

### 11 月 3 日（二）

在杭州的最後一天，上午計畫經白堤和蘇堤穿越西湖，參觀沿途的文化遺跡，下午則到著名的雷峰塔，探尋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即使是非假日，清晨遊西湖的人潮依然很多。我從西湖十景之一的「斷橋」走進綿延約一公里長的「白堤」，盡頭是湖間的天然島嶼「孤山」。白堤雖因紀念著名的唐代詩人白居易而得名，但並非由他所建。今日的白堤歷經後世修築，堤上則廣植柳樹，景色非常秀麗迷人。

走過白堤，便是薈萃許多人文風物的「孤山」，包括白（居易）、蘇（軾）二公祠、浙江圖書館孤山古籍部、西湖美術館及「西泠印社」等。由於時間有限，我到美術館參觀正在展出的「揚州畫派」書畫，緊接著至「西泠印社」欣賞近代名人篆刻，包括吳昌碩、李叔同、齊白石等名家作品（圖十三），



圖十二 夕照下的杭州「鼓樓」一景



圖十三 齊白石的篆刻作品「魯班門下」



## 浙江大學及杭州歷史文化遺產參訪紀要

並無意間看到正在整理的俞樾碑刻，以及當地出土、有兩千年歷史的漢代「三老諱字忌日碑」，令我相當驚奇。

中午在孤山名聞遐邇的「樓外樓」餐廳用餐，聽說當年有許多名人皆是這裡的坐上賓，包括孫中山、宋慶齡、魯迅、吳昌碩、馬一浮、郁達夫和周恩來等，是深具杭州特色的菜館，但價位也不便宜。

繞過孤山，即將接蘇堤之際，座落著包括革命烈士秋瑾、南齊時的錢塘名妓蘇小小，以及傳說中的武松墓碑。杭州一地歷史文化遺跡之豐富，不禁令人驚嘆。走上蘇堤，道路比白堤更為寬廣。蘇堤是北宋蘇東坡任杭州知州期間，疏浚西湖，並以淤泥和葑草所築成聯繫西湖南北的長堤，全長將近三公里。行近盡頭，高聳的雷峰塔隨之映入眼簾（圖十四）。

西湖南側的雷峰塔是《白蛇傳》故事的發生地，人們早已耳熟能詳。它實際建於西元 975 年，傳為吳越王錢弘俶所建，歷宋、元兩代，到了明嘉靖年間，杭州遭受倭寇侵襲，塔身的木質部分也被焚毀。後來或迷信塔磚能治病，或想挖尋塔磚內的經卷，塔基長期受到盜挖的破壞，民國年間便已圯毀崩塌。今天所看到的雷峰塔，由杭州市政府斥資於 2002 年重建，並未破壞原來舊有塔座，所以進入內部仍可看到一千年前磚造基座（圖十五）。而且近年來考古發掘的結果，在塔基下確實掘出「地宮」，其中埋藏有佛祖的髮舍利的鐵函。經過整理後，這個鐵函內部的物品已開放參觀。其中「鑲金塔」是一座精美的四角金色塗塔，鑲金銀質，在塔的四面還飾有佛祖故事題材的淺浮雕。如此

保存完好的佛教藝術文物目前已十分罕見，它顯示了五代時期吳越國極高的宗教藝術水準。

在臺灣做中國史研究，既有一種親近的文化根柢，卻也充滿了諸多的歷史想像。這一次真正踏上了熟悉故事的展演舞臺，幾天的參訪行程雖然緊湊，卻收獲豐碩，每每有意外的啟發。當我登上雷峰塔的最高處，俯望浸淫在夕陽和煙嵐之下的西湖時，那種打破時空疏離的神往，或許恰是一種歷史記憶的縫合吧！



圖十四 近照雷峰塔——今日的塔身是 2002 年於原址重建



圖十五 雷峰塔內部的磚造基座原貌



# 2011 年臺大杜鵑花節

## 「高中生旁聽歷史課程」活動心得

編按：

配合本校 2011 年度杜鵑花節之學系博覽會活動，本系特開放數門歷史專業課程與全校性歷史類通識課，給予高中學子旁聽機會，讓高中生更早瞭解本系的教學內容與大學上課方式，體驗大學生上課情境。

本次開放旁聽課程有二十門，授課教師及課程詳下。活動對象為全國在校高中三年級學生，二周活動期間內，每人至多旁聽六門課，計有 71 人報名，反應頗佳。以下為部分學生所撰寫之參與活動心得節錄。

授課教師	課 程 名 稱
古偉瀛	歷史的轉捩點
克思明	兩岸關係史
吳展良	明清思想史
吳啟訥	現代中國民族議題
李君山	海峽兩岸關係史二
李貞德	中國中古女性史
衣若蘭	明清女性傳記專題
周伯戡	佛教文獻
周樑楷	近代西方歷史意識
張 元	資治通鑑選讀——三國兩晉
張谷銘	近代歐洲的科學與醫學
張崑將	日本歷史與人物
陳宗仁	台灣早期史暨研導
陳俊強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社會
陳弱水	中國史二
陳慧宏	文藝復興
黃俊傑	大學之理念：傳統與現代
黃進興	歷史與宗教
楊典銀	日本近代歷史人物
閻鴻中	先秦史

（依姓氏筆劃序）

王慈華（延平中學）

感謝臺大歷史系提供這次機會，使我得以提早了解大學的授課方式及歷史系的教學內容，並對未來志向的規劃有進一步的思考與構想。

旁聽的第一門課是陳弱水老師的「中國史二」，這是專業基礎課，因此在授課的內容與面向上盡量延伸，目的在使學生對這一段時期有通盤詳實的認識。有別於高中課程故事性的敘述，大學課程著重於整合各類資訊的能力，並須具備藉由閱讀資料擴充自己知識的積極態度。

在「歷史的轉捩點」這門課中，古偉瀛老師由耶穌談起，講述基督教對西方文明的重大影響。由於討論內容和高中課程有所連結，我迅速進入狀況，並能跟隨老師的腳步，探究羅馬帝國執政的背景及基督教由異端成為國教的轉變過程。老師帶著和藹笑意娓娓講述，並配合圖片及影片幫助學生將資訊存入腦中，使我獲益匪淺。

第三堂的「先秦史」，閻鴻中老師以龍山文化的相關文獻為起點，佐以大量各種領域的知識，重構出先秦時代的社會形貌。討論內容涉及考古學及經濟學等學科，證實了老師所言：「先秦史是一門跨學科的研究。」閻老師詳盡而有條理的講述及深入淺出的分析，令我由衷佩服，並在研究態度及方法





▲陳弱水老師「中國史二」上課實況

上帶給我更充實的體認。

這次旁聽的經驗，除了獲取新知和對大學生活的預習外，也接觸到不同的上課方式及多位老師的學識與思路，開拓了我的視野。感謝臺大歷史系提供這次獨一無二的學習經驗。

### 余佩樺（竹科實中）

我漫步在三月的公館街頭，傅園裡通泉草、兔兒菜遍地開放，陽光鑽過樹葉輕輕灑落草地。趁著上課前的空檔，我坐在臺大門口，靜靜感受大學的氛圍，一切是如此和諧而令人嚮往。

張谷銘老師的「近代歐洲的科學與醫學」是一門討論課，我在選課時得知此課程使用英文授課，覺得很特別，便決定報名旁聽。我一進入教室，就看見不同國家的學生，或閱讀資料，或分組討論。上課時，全班二十幾人圍成一個大圈，以英文討論「培根與經驗主義」，一組學生報告培根的生平，一組做閱讀資料《新方法論》的摘要，另一組則提出問題讓全班討論，老師也不時提出意見，引導大家思考。

我們文組班也有類似的讀書會，進行方



▲張谷銘老師「近代歐洲的科學與醫學」上課實況

式與此課程相似。我想，這樣的課程安排能讓學生對所學有更全面的了解。分工合作閱讀經典、認識歷史人物，可以提高學習效率，也能在討論中激盪出不同的想法。也因為上課的語言是英文，課堂就像一個小小地球村，除了臺灣同學，還有索羅門群島、韓國等地的學生一起學習。

另一門旁聽課是陳慧宏老師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常被描述為「黑暗中誕生的黃金年代」，但是陳老師不斷地向我們強調歷史是連續的，文藝復興的文學奇葩薄伽丘與但丁，其實也是「一腳已進入了新時代，另一腳卻依然牢牢地踏在舊時代中」。

我們學習歷史時，常常需要把自己轉換到另一個時空，來理解那個時代的氣氛。在這樣的過程裡，難免就會忽略歷史演進之連續性，以太過絕對的眼光來看待各個時期，而偏離了歷史的真實。

### 利昕潔（協同中學）

高中的歷史課和大學截然不同，高中課程內容囿於課本，對許多事件的解釋都只有一句話，雖然涵括範圍大，卻是「大而化之」，無法仔細推敲討論；也因為學測、指

## 特別報導

考的壓力，課程十分制式化。

在臺大旁聽的四堂課，讓我看見了大學和高中教學的不同之處。我旁聽的課程都有一個主題，例如「文藝復興」、「歷史與宗教」，但並非「斷代史」，因為歷史是有脈絡的，事件的發生必定有前因與後果，尤其像「歷史與宗教」這樣的專題課上，老師講課的內容更是穿越各個時代，橫跨東西。

在臺大第一堂旁聽的課，就燃起我對大學課程的興趣：老師從上週發的 paper 開始，介紹了一個我前所未聞的理論，同時也讓我曉得在大學上課，預習資料、寫摘要是不可或缺的作業，老師講述的新理論非常特殊，是我在高中完全沒有接觸過的，甚至挑戰了一些高中所學的知識，原來歷史也能夠這樣玩！

事實上，老師在課堂上與其說是介紹，不如說是引導。上課時學生隨時都會發問，老師們更沒有想像中嚴肅，反而都會開玩笑，非常的風趣，而且個個旁徵博引，短短兩、三個小時根本不夠用。他們除了介紹一堆我完全沒聽過的人和著作外，還留下了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大學的老師們不會像高中老師一樣有問必有答，他們

喜歡讓一個問題在最高峰時戛然而止，留下無窮的餘韻讓人細細品味與思索。老師們不只為我開啓了看待歷史的新角度，更讓我破解了不少自己以往的迷思，就像其中一堂課的老師所說，「你們還正處在每一週都要感受自己成長的階段」。在臺大的四堂課，我就已經切身的感受到了。

這次的旁聽也讓我初步知曉自己要面對什麼：大量閱讀和思辨。而這閱讀並非單指歷史閱讀，還包括了其他學科。不只一位老師提到涉獵其他學科有助於解讀歷史、研究歷史；思辨則是一個對高中生而言較為陌生的概念，即在思考的同時，去質疑、檢驗自己的答案，並進一步提出新的問題。那種「啊！原來我錯在這裡，原來可以這樣想！」遠比高中的「啊！答案出來了！」還更要吸引我。

一趟旁聽之旅，我到了臺大，離去時——滿載！

### 姚惠耀（精誠中學）

很高興能聽到大學歷史系的課，我受益良多。這是我第一次聽大學老師講課，也希望日後有機會能考上一直嚮往的科系——



▲黃進興老師「歷史與宗教」上課實況



▲閻鴻中老師「先秦史」上課實況





▲李君山老師「海峽兩岸關係史二」上課實況



▲克思明老師「兩岸關係史」上課實況

臺大歷史系。

我是從彰化來的學生，對歷史充滿熱忱。這次活動，我旁聽了三堂課，第一堂是李君山老師的「海峽兩岸關係史二」。李老師講解得相當仔細，在這堂課上，我更了解1945年國共內戰的情形和1949年政府播遷來臺的背景。除此之外，老師也剖析了臺民和國民黨人士的心態，雖然礙於時間限制，授課內容不多，但相當深入，希望日後有機會向李老師請教歷史的問題。

第二堂是吳啓訥老師的「現代中國民族議題」，授課內容主要是關於中國在清代到民國時期對外族的態度，也提到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包括新疆、西藏和蒙古，這些地區的管理一直是中國從清代至今所重視的議題。吳老師對各民族的性質以及清代至今對待外族的態度說明得很詳細，也說到兩者之間密不可分的因果關係，十分精采。

第三堂是我最期待也是收獲最多的：古偉瀛老師的「歷史的轉捩點」。該課程聽課的學生擠滿了演講廳，幸好我被安排到前面，否則可能看不到投影片的內容。老師在這節從猶太民族開始分析，一直到耶穌誕生和基督教前期的發展，最後說明耶穌在歷史

上的定位和影響。除了宗教的觀點外，還有歷史的觀點，另外還提到基督教兩位重要人物——保羅和彼得；以及羅馬時期對基督教的迫害、基督教合法化的內外在因素。古老師講得十分精采，下課時，全體學生報以熱烈掌聲。真希望日後能再聽到古老師的課。

雖然只有三節課，但我已稍稍感受到臺大的上課風氣，學長姐都很專注，老師也十分和藹，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正式進入臺大歷史系就讀，和諸位學長姐、老師一起探索歷史的世界。

### 馬嘉駿（麗山高中）

此次旁聽活動，我選讀了三門課程。首先是克思明老師的「兩岸關係史」，老師的教學方式輕鬆愉快，猶如讀書會般，深入淺出地介紹與課程相關的歷史書籍，但其中令我敬佩的是，在歷史系所必須的閱讀質量是如此紮實雄厚，無論是嚴謹的專書或通俗野史，都是吸收內化的材料。因此老師在談吐間使人感到像一口深不見底的知識井，汲出的知識源源不絕。

第二堂課是古偉瀛老師的「歷史的轉捩點」。在第四講中我們遇到的轉捩點是羅馬

## 特別報導

帝國，雖然高中歷史在羅馬帝國這個章節中著墨不少，但許多的細節是我從未思考或省思過的。究竟一段歷史帶給後代的視野是什麼？我們在羅馬帝國的歷史中學習到自由、民主、法治與公民精神，然而在 The Ides of March 凱薩被殺的日子，我們不也看見了現在仍紛紛擾擾的權力鬥爭嗎？

最後一堂課則是周樑楷老師的「近代西方歷史意識」，這是不曾接觸過的領域，課程內容有點像是「歷史的歷史」，在老師的教導下條理清晰，並不如想像的枯燥乏味。在科學派史學和實證史學之中，我看到了不同的治史方式，二者都是嚴謹可信的知識，合乎社群公認的知識論和方法論。於是歷史學者的研究不再聚焦於 high culture，而擴大到 popular culture 的各個層面。

「觀於海者難為水」，在這次旁聽活動中，深刻體會學術之海的無涯。回頭省思，高中課程應是那涓涓細流，終將匯聚悠游在廣闊海洋之中。

### 陳志明（光啟高中）

首先，很高興能夠參加「杜鵑花節歷史課旁聽活動」。在參加活動之前，一直覺得自己在學校所學的似乎稍嫌不足，但旁聽之



▲古偉瀛老師「歷史的轉捩點」上課實況

後才了解，不只是稍嫌不足而已。從第一堂吳展良老師的「明清思想史」，到最後一堂衣若蘭老師的「明清女性傳記專題」，都讓我體會到高中所學的不過九牛一毛，也讓我重新省思，高中三年來所學的歷史究竟是為了什麼。是爲了有良好的基礎來銜接大學課程嗎？

上過「明清思想史」這堂課後，我就完全否認了這個想法。高中所學的是帝王們的豐功偉業，大學所學的是從民生背景的角度來解釋王朝的覆滅。高中所學實在太雜而不深，學起來就像只是爲了應付考試；大學所學不但深入而且具備思考性，上課不光是一味聽講，同時還要思考老師講的每一句話，老師還會冷不防的丟出問題來詢問。

在「明清女性傳記專題」這堂課上，我看見大學生上臺報告的作業，作品中的標點符號全由學生標註，意義也由學生解釋，老師只從旁協助，完全打破了我十二年來求學經驗的模式。

古偉瀛老師的「歷史的轉捩點」選修的人尤其多，文學院演講廳內座無虛席，即使如此，老師依舊有辦法提出問題，讓同學們思考並作答。

上完了全部的旁聽課程，我對老師們開



▲吳展良老師「明清思想史」上課實況

## 2011 年臺大杜鵑花節

始上課的方式感到新鮮，每位老師開場白的方式都不相同，唯一的共同點是沒有一位老師是一進教室便打開課本上課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教授「資治通鑑選讀——三國兩晉」的張元老師，開始上課時，老師唸了一段關於人體內在時間的研究文章，還說每位傑出的人都有的共同性，即是內在時間非常的長，讓我一度以為走錯教室，不懂這與歷史有什麼關係。直到老師解說，內在時間是指人能延續的思考時間，好比一道題目有 5 分鐘思考，內在時間長的人可以把 5 分鐘的思緒延長成 10 分鐘，進而思考得更深更遠。這個開場白講了近 20 分鐘，在高中或許會被認為是浪費時間，但下課後，我立刻了解那 20 分鐘的真諦——雖然少了 20 分鐘的講課時間，但所剩的 80 分鐘卻變成我 160 分鐘的課程。

很感謝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開設這樣的旁聽課程體驗活動，讓我學習到更多知識。

### 陳忠昀（德光中學）

6 歲以前，我最喜愛「恐龍」；國小期間，「昆蟲」是我的最愛；12 歲以後，我陷入了「歷史書籍的閱讀」中。2011 年學校的寒假作業「升學與志趣」，我選擇了一位

臺大歷史系的學姊為訪談對象，訪談中得知「臺大 2011 杜鵑花節系所博覽會」將舉辦高中生旁聽歷史課程活動，讓面臨升學壓力及選系抉擇的我們體驗大學生上課情境，進一步了解歷史系的課程內容。當時我選擇三門最有興趣的課程，結果分發到黃進興老師的「歷史與宗教」課堂，上課時間是 3 月 8 日 14：20-16：20，非常適合我與父母親三人「優雅」地當天往返於臺南與臺北。

我原以為歷史與宗教是介紹各派的宗教思想，旅途中我再次翻閱《世界史——黎明前的黑暗》為課堂做準備，但實際上課內容是一些宗教理論，像「圖騰主義」等，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由於我對圖騰（Totem）甚感興趣，故從岑家梧《圖騰藝術史》（1996）一書中找出解釋——圖騰是宗教信仰，也是社會的結構，在起源上無法分開。該著附錄（頁 192）提及圖騰主義發生的確實年代甚難考察，我們僅能從史前各民族遺物中發現若干遺跡，並得知各民族處在何種文化階段中。維爾金（G. A. Wilken）也說：「原始人類相信人死後的靈魂轉為植物，這種思想就是圖騰主義的起源。」圖騰主義學說，有起源於靈魂觀念和魔力說，有源於實際的經濟社會結



▲衣若蘭老師「明清女性傳記專題」上課實況



▲陳慧宏老師「文藝復興」上課實況





## 特別報導

構之說，亦可能是原始共同制到氏族制的轉變中不可少的產物。

老師也常提起一些著名的社會學家，如康德、黑格爾等，這些都是我在學校的歷史課中未曾學過的。上課時黑板上一半是英文，內容豐富，十分新鮮、精彩、有趣，令人獲益甚多，我做了筆記，以便返校後與「歷史達人」分享。此行後，我決定更加努力，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系上的一分子。

### 陳冠蓉（臺中女中）

因為對歷史濃厚的興趣和對大學歷史課上課方式、內容的好奇，我報名參加臺大杜鵑花節的高中生旁聽歷史課程活動。

我選了三堂課，分別是古偉瀛老師的「歷史的轉捩點」、閻鴻中老師的「先秦史」及陳慧宏老師的「文藝復興」，三堂課都令我印象非常深刻。通識課程中，古老師言談幽默風趣，陳老師規劃分組討論課程，授課嚴謹但氣氛卻很愉快，讓我無限神往。其中又以閻老師的「先秦史」最「刺激」，課堂上，學生針對課前規定的閱讀資料提出見解或疑問，老師則從中找出問題反詰學生。這種討論模式，讓我想起蘇格拉底教育青年的方式，在一個又一個更為深入的提問中，大家慢慢將結論找出來——這是一堂需要投入較多心力準備的課，我在課堂間也一直反覆思考，雖然有點辛苦，但非常有趣！

初次進入臺大文學院，我像小學生一樣，拿著地圖在一、二樓穿梭探尋，深深為美麗的校園著迷，課後很幸運遇到熱心的助教和學長向我們介紹歷史系，並提供詳細諮

詢呢！參加這次活動著實獲益良多，更堅定我一定要進入臺大歷史系的決心。

### 張巧羚（景美女中）

抱著期待、興奮的心情參加本次旁聽課程。走進臺大校園，沿路的杜鵑盛開，感染了我渴望學習的心。有別於高中一板一眼制式教學，在大學裡，我看到歷史活了起來。

吳啓訥老師的「現代中國民族議題」，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切入「征服」與「被征服」，在我們所熟悉的「帝國」裡，我看見「文化」是如何由下而上的影響外來民族，以及東方與西方不同的「統治」觀點。到現在，北京當局該如何處理西藏問題，不同的民族如何在一個政權下和平相處，這堂課教我從歷史演進的角度去思考。

古偉瀛老師的「歷史的轉捩點」是一門很搶手的通識課。讓我最感興趣的是老師出版的通識課本，書中娓娓道來十五個對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這門課的作業要求，竟然是闡述其中一個事件，並提出自己的觀點。針對歷史事件提出自己的見解，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

閻鴻中老師的「先秦史」由於是夜間課程，採小班制，以閱讀資料、上課討論的方式進行。以前我從未思考過「先秦史」的定義與範疇，它可以涵蓋遠古、上古、三代；或說舊石器、新石器、青銅器、鐵器時代，不同的分類方式對之有不同的定義，使先秦史的研究並無定論（以上是課前先行閱讀資料的部分）。上課內容為龍山文化與酋邦社會，老師提到龍山文化的經濟、政治、社會





▲張元老師「資治通鑑選讀——三國兩晉」上課實況

型態，資源分配與交換，也探討「酋邦」的定義與實際應用。上完課後我才了解現行高中教材學習的意義——提供未來進入大學的根基與背景。

張元老師的「資治通鑑選讀——三國兩晉」，一樣以史料閱讀進行，獨特的地方是，藉著史料中人物的動作、發言，去了解其背景，而教授會將之延伸至現代生活中。好比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國中時就會背的句子，至今我才了解，這件事情在當時是幾乎不可能的——尤其漢獻帝並非我原本所想像的傀儡皇帝，而是個機靈聰明的人。從歷史中看成敗、對照古今，再反省自己，我在這裡找到了讀歷史的意義。

陳弱水老師講授的「中國史二」是高中課程的延伸，目的是建立史學知識，對事件及其影響有紮實的認識與了解。我很認真的上了兩堂課，對於南北朝歷史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兩週的課程，發現自己對於歷史的愛好程度遠超乎想像，並著實讓我明白，大學的歷史課程究竟是什麼樣子，而我是否適合這門學科。大學的歷史課不再是考試，而是去思考有關「人」的議題，以及事件背後的原



▲吳啟訥老師「現代中國民族議題」上課實況

因和動機，在這樣的思考過程中，歷史就活了起來。運用這些反省面對未來，正是我最想學習和了解的。謝謝所有的老師和學長姐，能夠給我親自走訪歷史系的機會。

### 黃威慈（中山女高）

「認識一國的文化，必先探其根、查其源，雖不中亦不遠」。這是張崑將老師在開始上課時談到的一句話。我喜歡接觸各國的風土文化，並致力做一個跨文化工作者，聽到這句話，深有同感。

對於日本文化有十足興趣的我，選擇了「日本歷史與人物」這門課，旁聽當天剛好講到神話與天皇。張老師告訴我們，想了解西方世界，必須讀過《聖經》；要清楚中國人的想法，該閱讀《論語》；若希望認識日本，就一定要了解日本神話。的確，在法國當交換學生時，我發現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兩星期的假期，而這些假期往往是天主教的特殊節慶，若是對聖經了解不深，根本不可能知其起源。

於是，在張老師的帶領下，我們進入日本神話與天皇間的奇妙世界。首先，認識「日本天皇的發展」，從天皇概說一直到波茨坦

## 特別報導

宣言後的變革，小結為「沒有天皇就沒有日本」。第二，介紹「日本國形成神話」，這部分我從未接觸過，上課之後，讓我明瞭日本神話為其文化的源頭，從神話中還帶出日本天皇的神聖性及萬世一系的遠因。第三，談及「現實日本」，夾雜神話、儒家文化圈與佛教的日本，如何進行文化的吸收與轉化？面對明治維新，日本進行的方針是「復古趨新」，而當時神道教更成為超越所有宗教的宗教。

這堂課給我很多新的收穫，在短短兩小時中，我發現大學的文史課程很有趣，並非只是閱讀密密麻麻的史料，其中也有很多學生的思辨與回饋；再者，我對日本文化越來越感興趣，也更深信要了解一國的文化，不能忽略其文學累積與對該國的持續探索。

### 楊易修（建國中學）

有幸參加這次旁聽活動，讓我初步體驗到大學生活，同時也見識了歷史系的熱情。

聆聽完黃進興老師的「歷史與宗教」，雖然確實有所收穫，但對我來說，課程內容稍嫌艱澀。一來是我對許多學者的認識不夠深，不了解每個人的個性或背景，甚至還因

為看習慣中譯的名稱，而對某些大師級人物的原名感到陌生；二來，講義上的書單，我不曾接觸過任何一本，以致於當老師分析各著作的細節時，我只能盲目地汲取瑣碎的片段，無法將老師口述的內容和我的背景知識串接在一起，實屬可惜。

周樑楷老師的「近代西方歷史意識」這門課中，提到不少我熟悉的內容，而「科學派史學」與「實證史學」的異同比較，是最感興趣的部分。更因為周老師擔任龍騰版《世界文化歷史篇》課本的主編，其中關於「從文明到自然」的部分，令我會心一笑，比照課本，老師的「史譜」概念搭配著各式各樣的事例清楚呈現。老師生動活潑、深入淺出的上課內容，吸引了對歷史著迷的我。

我也許不會進入歷史系，但經過貴系舉辦的課程旁聽活動，無疑加深了我對歷史的熱愛，若有能力雙修或輔修別的科系，歷史系將永遠是我的第一志願。

即將步入大學生涯的我，將謹記這份美好的經驗。短短兩天在臺大歷史系旁聽，我體驗了最早的大學生活——同時也是最珍貴的回憶。



▲張崑崙老師「日本歷史與人物」上課實況



▲周樑楷老師「近代西方歷史意識」上課實況



# 臺大歷史系博士論文摘要（99 學年度）

## 冷戰、國家建設與治理技術的轉變——戰後臺灣宏觀經濟治理體制的形成（1949-1973）

陳思宇

本研究旨在藉由敘述一種新型態「經濟行政體制」形成的曲折故事，重新拼湊 1949 年以降臺灣「國家體制建設（state-building）」的歷史圖像；另一方面，則跳脫偏重於「戰爭」的「軍事衝突」層面，或僅視「戰爭」為一種「國際關係」形式的既有研究框架，運用「組織與制度」演化的研究取徑，進而反思「全球冷戰（the cold war）」與中國內戰（以下簡稱內戰）的歷史進程與內在意涵。

具體而言，本研究將圍繞「戰爭」與「國家建設」二者的相互關係，採取多元的思考路線，組織歷史演變的「敘事情節」，嘗試說明在中國大陸遭逢軍事潰敗幾近崩解的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在混亂中遷移至臺灣這個原屬日本殖民地的邊陲島嶼，甚至在美國霸權的各種支援下，通過「模仿—移植」美式行政治理的思維與技術，展開一系列國家建設工程。而由一個原為統治中國廣闊領土與眾多人口而建構的龐大機器，演化成一個以治理島國臺灣為目標，並且融入美國全球體系的「新」國家。

如眾周知，專業的官僚行政組織乃是維繫現代國家治理的核心機制，此種新型態的組織運作方式，透過一連串模仿、移植的過

程，由西方向各地擴散，而在全球掀起幾波「國家建設」的風潮，並且伴隨國際關係的形成，共同構成現代國家體系，亦成為形塑當代世界面貌的重要力量。每一波現代國家組織體系的擴張，多半與大規模的戰爭有密切關係。戰爭除被定義成是發生於國與國之間的軍事衝突，亦被視為是一種國際秩序與社會活動的「異常狀態」。戰爭引發的大規模破壞與軍事需求，迫使參戰各國必須調整組織型態與治理方式；當軍事衝突告一段落後，各國若試圖恢復社會活動與秩序，通常必須先著手重建各種不同機能的行政機構，方能協調社會運作。然而，「國家重建」理論上是企圖使國家體制脫離以軍事動員為主的「戰時狀態」，而重回「常態」，但實際上，在重建國家組織的過程中，大都融合許多在戰時發展出的新知識與治理技術，重建國家體制的過程，往往亦是建造另一種「新」國家的過程。因此，「戰爭塑造（war-making）」與「國家體制建設（state-building）」不僅有密切關係，甚至可視為是一體的兩面。

本論文指出，戰後臺灣的國家建設，乃是一項與「全球冷戰」同步進行的艱鉅工程，這既是現代史上第一次以臺灣為領土範圍建立完整國家治理體制的嘗試，同時也是「中華民國政府」展開蛻變的歷史故事。

（指導教授：陳永發；2011 年 1 月獲得博士學位）



## 研究成果

### 日治時期臺灣唱片流行歌之研究 ——兼論一九三〇年代流行文化 與社會

黃裕元

本研究統整與考訂零碎紛陳的三〇年代唱片業與流行歌史料，並初步分析現存之歌詞、樂譜與錄音資料，從唱片流行歌界的詞曲創作者、歌手、詞曲與音樂風格等面向，探討三〇年代唱片流行歌的發展與特色。在歌曲發展史的基礎之上，再綜合市場概況、社會議論的資料，包括詞曲創作者的概念、社會觀察家的評論以及總督府唱片管理制度的影響，藉著流行歌界與社會受眾的互動，呈現其社會文化意涵。

「聲音的印刷術」——錄音與唱片製造，隨著二十世紀的展開而不斷進步。聲音成為可複製傳播的資訊，也成為有利可圖的商品，掌握相關技術與資金的唱片公司四處找尋具有市場價值的聲音。本土藝人從兼差性質地參與灌錄，進而參與發行、販售的工作。三〇年代之後，受日本、上海等流行歌市場的刺激帶動，出現以本地多數族群語言——「臺語」演唱的唱片歌曲，從西洋管弦樂伴奏的民謠長歌開始，逐步定型為形式較短、多段歌詞的創作歌曲，配合電影與唱片公司、販賣點的宣傳活動，展開「流行歌」新紀元。

從歌壇人士與詞、曲、演唱和音樂內容綜合觀察，本土唱片流行歌在誕生初期帶著濃厚的都會青年性格，並以爵士樂、愛情為

歌曲主題，而廣獲都市摩登青年的喜愛，而後新創短歌的格式逐漸定型，歌詞與音樂內容也逐漸向歌仔、南北管與山歌等本土歌樂文化傾斜。於是唱片歌曲的創作界與新文學、西洋音樂界間固然有人員與作品的交流、互動，其創作慣例與生存法卻有所不同，他們對社會上流動議論的現象與觀念，也自有其一套詮釋的慣例。

就流行歌的內容與社會文化而言，許多關於都會文化的歌曲，吐露出臺灣人對「現代」、「摩登」、「毛斷」所帶來的新穎社會現象的矛盾情結。開始是以新奇的眼光端視，尤其對所謂「烏貓」、「烏狗」的街頭奇景深覺趣味，狂歡與閃躲過後，表現出更多的孤寂與疲憊，對人、事、物快速流動的都會生活表達深刻的無奈與反感。而在愛情抒情歌曲當中，自由戀愛的信仰確已深植青年世代，但男女互動的描述卻趨於空洞，在世代觀念變遷的夾縫中，自由戀愛與其說是新社會觀念，不如說是流行文藝家們編織的、迎合青年們的綺麗夢想。

此外，二〇年代政治運動喧騰以來，本土政治運動者標舉的「臺灣」群體認同，以及對「亞細亞」或「東洋」的和平扮演的關鍵角色等認同與主張，在三〇年代流行樂界獲得傳誦，1937 年中日兩國政府全面交火後，「東洋」或「東亞」更儼然成為新流行語，包括「新東洋音樂」的概念，以及「咱是東洋人」的聲明。而相對於日本歌壇，臺灣本土流行歌對戰局的反映冷淡，自陳要促進日華親善的臺灣人，面臨時局的變化卻也



只能無言地旁觀。

當本土歌壇解散後，臺灣人只能成為配合國策的演出者，回到野臺去找尋新的身分、定位與生存方式。熱鬧多元的第一代臺語流行歌，就在喧騰的軍歌之間，悄悄地走下了舞臺，然而他們的創作與演出，不僅奠定近代歌唱文化的基礎，更為世代臺灣人留下至為珍貴的文化資產。

（指導教授：吳密察；2011 年 7 月獲得博士學位）

### 國家與邊區社會的治理——以中北部臺灣金廣福、廣泰成墾號為考察中心（1834-1920）

賴玉玲

自臺灣收歸版圖，清政權在中央財政乏力中展開對臺灣的治理，從康熙六十一年（1722）制定番界，執行過程顯示清朝的臺灣邊疆政策未能遏止漢人越界侵墾，以致邊陲衝突不斷。清代做為漢人和原住民區隔的「界」，經過不時清釐或重定，成為土地拓墾和國家版圖擴張的前線，並不斷往內山推移，逐漸形成漢人為主體，進行土地拓墾的邊區社會。本文在清代臺灣以界做為人群區隔的邊疆治理基礎下，由道光十四年（1834）官方諭令籌組金廣福墾號，實施較為積極的隘防行政為始，採取金廣福到廣泰成墾號不同時期作用於新竹、苗栗地區的官民合作拓墾組織，做跨

區域、實時的分析和比較。

根據傳統封禁、分治和隔離辦法，臺灣邊陲設立的人群區隔被清廷作為鞏固清政權、限制漢人活動，以及調整漢番關係的最後防線，由最初鬆散的人群區隔，到逐步建立固定武力的防備線。另一方面，臺灣邊陲邁向水田化過程，政權未能有效規範的邊區，國家的治理透過官民合作和擴大地方代理體現。受國際市場和經濟利益影響開放番地，清廷逐步展開與邊區種種合作，使十八世紀末的隔離政策到十九世紀已經呈現消融，邊陲控制必須倚恃邊區的協力來實踐。

由於內層山面以樟腦利益為重要開發目的，清末金廣福和廣泰成墾號的設置，就在人群關係緊張和山林資源開發背景下，展現官民合作和擴大地方代理的統治技藝。金廣福墾區以客籍移民為主體，並且以與墾首原鄉相同祖籍為優勢，到廣泰成墾區內不同認同的地域區形成，除卓蘭明顯以宗族型態發展外，其餘區塊在客籍為認同指標下，藉拓墾整合，呈現擬血親擴大宗族關係，都表現邊區的地緣社會發展特色；而墾首影響力與山林資源開發因素，或許也可為臺灣客家人群聚近山地帶的發展，提出新思考。

（指導教授：許雪姬；2011 年 7 月獲得博士學位）





# 研究成果

## 師生編著新書簡介



### 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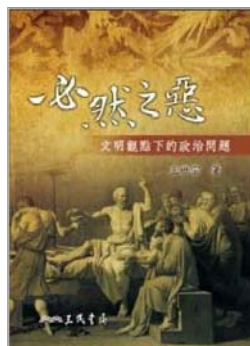
衣若蘭 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419頁，ISBN: 9787544048248(平裝)

中國史學史與性別文化有何關係？女性入史的傳統至明清時代有何傳承與變革？清代史家如何編輯採摭前朝女性入正史《列女傳》中？

本書嘗試從性別的視角，分析《明史·列女傳》之建構，思索女性如何被男性史家表述，及此表述如何在中國史傳傳統與明清女性傳記書寫風氣下，交織而成。本書的研究一方面從史學的角度考察，試圖彌補婦女／性別史研究中史學史探討之闕如；另一方面由性別的取徑來研究中國史學史，最終期待能開拓婦女史學史的研究方向

（作者為臺大歷史系副教授）



### 必然之惡：文明觀點下的政治問題

王世宗 著

臺北：三民書局，2011年8月，416頁，ISBN: 9789571455334(平裝)

政治所以為必然之惡，乃因人是善心不足的社會性生命，一則現實上不為善必作惡，二則權力鬥爭使人性之惡作用擴大，以致政治成為少數善人對抗多數惡人的公共事務。儘管人的惡性可能強於善性，但人的本性畢竟是善而非惡，故「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是政治事實的陳述，也是政治良心的省思，如此政治之惡在事實上縱令是必要，良心卻不以為然，這證明政治只是必然之惡，因其為惡，所以不具絕對的必要性。

政治的必要性隨人的惡性而存在，人若可以上進，則政治可以消除，然下達者眾，故政治成為舉世最大的勢力，而一切人事的政治化便是其活動的強化與其性質的腐化，此即政治是人可以控制的天災。政治愈蓬勃，表示人性愈墮落，若人本是政治的動物，則人的使命自當是提升其萬物之靈的層次，而使政治進化至無為之境，易言之政治雖乏目的性，但政治的目標無疑是政治的消滅。此理顯示原罪也是罪，原罪的承擔是為去除原罪，是謂「無恥之恥無恥矣」。

（作者為臺大歷史系教授）





### 唐代的歷史記憶

廖宜方 著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 年 5 月，602 頁，ISBN: 9789860280791

本書分為上、下兩卷，分別採取思想心態與社會文化的取徑，探討歷史記憶中的時間與空間維度：久遠的歷史與晚近的歷史、遠方的歷史與近身的歷史，如何編織個人和群體的認識與認同。

讓我們設想，唐代有位姓崔的士大夫，他在朝廷上遠舉堯舜治世的典範、近舉經驗見聞的前例進言立論；在同儕間，他誇耀家族、郡望與姓氏的輝煌歷史，對故鄉的史跡也瞭若指掌；當他出任地方官員，標舉漢代循吏為施政模範；當他出使江南，則拜訪各地的名勝古蹟；登臨賦詩、追憶六朝文人。本書從上述不同面相揭露唐代士人歷史記憶的面貌，最後提出歷史記憶與地理空間的問題：傳統士大夫如何克服歷史記憶與地理空間的錯位？古典文化的傳承是維繫認同的紐帶嗎？中國是一個文化想像的共同體嗎？文化認同是由政治權力建構而成？抑或文化有其自主的運作，進而導引政治的動向？

（作者為臺大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 臺灣代書的歷史考察

吳俊瑩 著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 年 5 月，318 頁，ISBN：9789860231724

本書以人們所熟悉的「代書」出發，剖析代書在臺灣經歷性質相異政權統治下，內涵與意義呈現何種轉變，以及代書深根民間社會的歷史動因，嘗試發掘這個過去受人忽視的現代型西方法律制度向下傳播的中介管道。今日臺灣社會的法律事務分工具有濃厚「日本因素」，代書的存在即是著例。代書在日治時期「生活法律化」脈絡下，逐漸職業化與專門化，在臺灣人首次接觸現代型(modern-style)法院訴訟、土地登記、政府行政規制等面向上，都與代書密不可分。戰後來臺的國民黨政府在其歷史經驗中，並無相似臺灣的代書發展歷程，長期消極以對，不過民間仍舊延續日治以來與代書的互動經驗，以其在民間法律生活的分量，終於讓原無代書之制中華民國法體制，融入臺灣在地經驗，承認代書的存在意義與價值。

（作者為臺大歷史學系博士生）



## 研究成果



### 臺大歷史學報第 47 期

《臺大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主編，2011 年 6 月，294 頁

- 梁庚堯 南宋溫槽考——海盜活動、私鹽運販與沿海航運的發展  
吳翎君 民初美國企業對黃河鐵橋和南方大港的投資——企業、政府與外交關係的考察  
劉 慧 土地與叛亂——十三世紀中期英格蘭貴族改革運動的一個面向  
劉巧楣 想像的字體——布萊斯·馬登的《王紅公蝕刻》圖冊  
肖清和 故紙堆裡覓新知——評張先清、趙蕊娟編，《中國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輯要》  
韓承樺 引介尤根·歐斯特哈默著，劉興華譯，《亞洲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  
艾立德 評介達索彬，《地緣民族主義在中國——歷史地理學思潮，1900-1949》



### 史原復刊第二期（總第二十三期）

《史原》編輯委員會主編，2011 年 9 月，284 頁

- 蔡明純 「外國文學門」課程在近代中國大學院校的建置與標準化——以北大、清華為討論中心  
李海默 1947 年中山大學法學院學潮——薩孟武與廣東政局  
吳俊瑩 政府資訊公開法制的誕生與臺灣史研究脈動（2000-2008）  
黃旨彥 亞馬遜女戰士群像——古希臘人身體與性別觀的探討  
雷晉豪 《尚書·商書》「其如台」新探  
游逸飛 漢代法制研究新取徑——以《二年律令》與《名公書判清明集》的禁賭為例  
韓承樺 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  
李冠廷、游逸飛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均輸律》譯注  
王萬雋 〈謝鯤墓誌〉考釋  
黃庭碩 中國中古的「二元世界觀」——引介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  
馮卓健 不同的啓蒙——評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Roads to Modernity: the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







### 史繹第 36 期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36 期史繹編輯小組主編，2011 年 7 月，119 頁

- 袁偉杰 體用觀念來源之爭議考  
劉百里 瓦舍文化在宋代社會中的歷史意義——以北宋開封瓦舍為主軸的討論  
李沐恩 朱子語類所見王安石形象  
李孟衡 從上海看一九四八年的中國幣制改革——以《申報》為考察中心  
鄭宏興 國民黨政治菁英與解嚴以前臺灣的政治轉型（1950-1988）

### 99 學年度學位論文彙目（2010.8-2011.7）

（依作者姓氏筆劃序）

#### 博士論文

- 陳思宇 冷戰、國家建設與治理技術的轉變——戰後臺灣宏觀經濟治理體制的形成（1949-1973）  
黃裕元 日治時期臺灣唱片流行歌之研究——兼論一九三〇年代流行文化與社會  
賴玉玲 國家與邊區社會的治理——以中北部臺灣金廣福、廣泰成墾號為考察中心（1834-1920）

#### 碩士論文

- 石秀英 民國時期內蒙古教育政策中的國家意識  
朱祐鉉 清代杭州的火災、火政與社會生活（1644-1861）  
艾立德 晚清民族主義中的省籍意識——以新知識分子關於湘、粵的論述為例  
吳挺誌 北宋中後期的文臣統兵：以陝西沿邊五路經略安撫使為例（1038-1100）  
邱建智 漢魏南北朝墓誌的起源與發展  
范珮芝 抗戰之際的救亡思想：戰國策派的文化改造主張  
徐乃義 荀子思想中的「知慮」問題  
高震寰 漢代地方大姓與政府的依存關係——以成陽仲氏為例  
陳珮璇 東漢的三輔士人  
陳昶安 東北流通券——戰後區域性的貨幣措施（1945-1948）  
傅 揚 從喪亂到太平——隋朝的歷史記憶與意識形態  
楊月惠 試論十八世紀的「世界觀」——以伏爾泰《風俗論》為例  
蔡耀緯 雖非真而近於真矣：庚子年武昌假光緒案鉤沉  
黎康翰 法西斯主義、反理性主義與中國三〇年代的思潮  
羅貫倫 閻錫山參加北伐的決策歷程——從保境安民到出師討奉（1926-1927）

## 研究成果

### 本系師生獲獎助及補助計畫

#### ◆ 臺大文學院跨領域研究總計畫「臺灣與世界的對話」（執行期限 2011-2015）

計畫主持人	執行計畫名稱	隸屬之分項計畫	分項計畫主持人
陳弱水	漢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東南的原住人群——一個實驗性的探討	人文多樣性與跨文化：理論探討和實例研究——早期中國社群與地域的多元性	陳弱水
梁庚堯	宋元時代的真州		
方震華	讀書與治軍——宋代文人對軍事的參與		
楊肅猷	十八世紀歐洲啓蒙文化的多元性		
花亦芬	德意志中古女性的信仰經驗與文化創造——爬梳多元的歷史訊息		
陳慧宏	近代歐洲天主教的海外傳教——非歐洲接觸視野下的十七世紀歐洲史		
劉 慧	十二、十三世紀聖物與基督教世界中的族群關係		
甘懷真	東亞古代的「國」概念	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	甘懷真
古偉瀛	20 世紀初期天主教與日韓的現代性		
楊典錕	清末民初中日兩國間的軍事交流——以留學人才的培育和軍事制度的傳釋等為中心的探討		
周婉窈	部落遇上國家——臺灣北部原住民的歷史考察	島嶼的形成與流動	童元昭
花亦芬	莎士比亞與歐洲十六、七世紀視覺文化裡的寓意象徵研究	臺大莎士比亞論壇	雷碧綺
閻鴻中	先秦秦漢出土文獻與制度研究	先秦兩漢出土文獻與學術新視野	徐富昌
呂世浩	先秦兩漢出土文獻與古代時制研究		



## ◆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行期限
方震華	從書院到政壇——晚宋理學家的政治活動	2011/08/01-2014/07/31
王遠義	試論柏克與毛澤東的宇宙觀	2010/08/01-2012/07/31
古偉瀛	澳港臺三地天主教關鍵期研究——兩頭蛇時的澳門，不平等條約時的香港以及冷戰時的臺灣	2011/08/01-2014/07/31
甘懷真	中國皇帝制度中的「化外人」理論	2010/08/01-2012/07/31
衣若蘭	毛奇齡的女性史著與史論	2010/08/01-2012/07/31
李文良	民人從無議敘之例——清代臺灣的「義民」及其身分	2011/08/01-2013/07/31
林瑞翰	《魏晉農業》專書寫作	2011/08/01-2012/07/31
花亦芬	Titian 的繪畫與文藝復興的「藝辯」(“Paragone”)	2011/08/01-2012/07/31
秦曼儀	法國舊制度時期巴黎貴族的社群規範與出版活動的變動關係考察	2010/08/01-2012/07/31
陳慧宏	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格物窮理	2011/08/01-2012/07/31
劉巧楣	現代性的體現——馬內的童年形象(II)	2011/08/01-2012/07/31

## ◆ 國科會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獲獎人

博士候選人	論文名稱	指導教授	執行期限
王萬雋	秦漢魏晉南朝的國家與蠻族	陳弱水	2011/08/01~2012/07/31
胡雲薇	中晚唐五代北方的新興士人	陳弱水 甘懷真	2011/08/01~2012/07/31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文社科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

博士候選人	論文名稱	指導教授	執行期限
王一樵	天下之患為人滿：清朝嘉、道、咸以來的棚民問題、士人議論與官方政策	王汎森	2011/07/01-2012/06/30





# 大事記（2011 年 5 月至 2011 年 10 月）

## 一、 學人動態

- 5 月 20 日：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文學院（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院長 Prof. Jan Palmowski 及歷史系主任 Dr. Paul Readman 為拓展雙方未來學術交流之合作關係參訪本系，劉慧老師負責接待並安排座談會與午宴，與會教師有古偉瀛、陳弱水、衣若蘭、宋家復與許雅惠等老師。
- 5 月 28 日：周婉窈教授應邀出席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之「臺灣海洋文化的吸取、轉承與發展國際研討會」，發表主題演講，講題為「山、海、平原：臺灣島史的成立與展望」。
- 5 月 31 日：張嘉鳳副教授自 2010 年 7 月 27 日赴美國 Dominican University 講學，擔任 Fulbright Scholar-in-Residence Program，於 2011 年 5 月 31 日回國。
- 6 月 2-29 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楊偉兵副教授於本系擔任訪問學者（客座副教授）。
- 6 月 16 日：本系秦曼儀助理教授開授之「法國社會文化史一」課程，獲選 98 學年第 2 學期「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績優計畫。
- 6 月 28 日：陳慧宏副教授、劉慧助理教授應邀出席北二區教學資源中心教學成果展「椰林講堂」，分別就所開授之通識課程「文藝復興」、「西方文明史」分享教學經驗。
- 7 月 5-26 日：法國里昂第二大學羅蕾雅博士（Marie LAUREILLARD）至本系擔任訪問學者（客座助理教授），其研究領域為中國美術史，此行來訪研究主題為「臺灣當代文學與藝術中的女性主義」。
- 7 月 8 日：周婉窈教授於第十一屆國科會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擔任講師，主講「山、海、平原：臺灣史概論」。
- 7 月 8-20 日：古偉瀛教授赴香港天主教區檔案室蒐集資料，並進行短期研究。
- 7 月 10-20 日：衣若蘭副教授赴廈門、溫州短期研究並蒐集資料。
- 7 月 22-23 日：周婉窈教授於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夏季學校第十四回「彼 ê 時代、咱 ê 青年——台灣文化協會 ê 歷史光影」擔任講師，主講「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探討」。
- 7 月 30 日-8 月 30 日：呂世浩助理教授獲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邀請，依據兩校學術交流協議，至該院駐點研究。
- 8 月：李文良副教授、花亦芬副教授自 100 學年度起升等為教授，劉巧楣助理教授自 100 學年度起升等為副教授。
- 8 月：陳弱水教授自 100 學年度起兼任臺大文學院院長，任期至 102 學年度。
- 8 月：甘懷真教授自 100 學年度起續任本系系主任，任期至 102 學年度。
- 8 月：本系退休教授胡平生先生獲聘為臺大名譽教授。



- 8 月：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新聘顏杏如博士為專任助理教授，顏老師為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研究領域為臺灣史、日本殖民地社會文化史、日本帝國圈內的人群移動與異文化接觸。
- 8 月：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新聘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客座特聘講座張廣達先生為兼任教授。
- 8 月：100 學年度與本校語言學研究所合聘謝金蓉先生為兼任講師，為本系開授「史學英文寫作」課程。
- 8 月 6 日-9 月 5 日：劉慧助理教授赴英國國家檔案館短期研究並蒐集資料。
- 8 月 12-17 日：楊肅猷教授應邀出席由北京大學研究生院主辦之「英帝國及其殖民擴張國際專題學術研討會」，並擔任論壇主持人。
- 8 月 18-27 日：衣若蘭副教授赴成都參加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蔣經國基金會、四川大學及宋慶齡基金會等單位合辦之「第一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
- 8 月 18 日：李文良教授、方震華副教授、衣若蘭副教授、秦曼儀助理教授與劉慧助理教授獲頒本校 99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教師」。
- 8 月 18 日：劉慧助理教授開授之「西方文明史」課程，獲選 99 學年第 1 學期「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績優計畫。
- 8 月 20 日-9 月 5 日：閻鴻中助理教授赴蘭州出席由甘肅省文物局主辦、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西北師範大學承辦之「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秦律體制下的法律判斷和法理言說〉，並轉赴西安、南京等地蒐集資料。
- 8 月 25-26 日：呂世浩助理教授出席「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漢代時制初探——以懸泉置出土時稱木牘為中心的考察〉。
- 9 月 1 日-12 月 31 日：本系獲國科會補助延攬武漢大學歷史系徐少華教授為客座教授，為本系開授「先秦南方民族與文化概論」與「楚文化探索」課程。
- 9 月 16 日：日本南山大學人文學部日本文化學科准教授松田京子先生於本系擔任訪問學人（至 101 年 9 月 15 日），由周婉窈老師接待。松田先生研究領域為日本近現代史、文化交流史，長期關注近代日本和東亞地域之文化交流史，及殖民地主義和臺灣先住民等研究。
- 9 月 17-25 日：古偉瀛教授赴濟南山東大學短期講學。
- 9 月 28 日：方震華副教授與花亦芬教授獲頒教育部 1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 10 月 11 日：陳弱水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15 屆國家講座「人文及藝術」領域主持人殊榮。

## 二、學術討論會

- 6 月 23 日：臺大文學院「人文多樣性與跨文化：理論探討和實例研究」研究計畫第一次討論會，姜台芬先生主講：「從『唯獨欽定本』（KJV Onlyism）主張談聖經中譯的幾個問題」，由計畫主持人陳弱水先生主持。



## 大事記

---

- 7月4日：臺大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討論會，國發所鄧志松先生主講，講題為「Google Earth 與歷史、地理時空資料整合：以孫中山一生的革命行旅為例」，由計畫主持人甘懷真先生主持。
- 7月19日：臺大文學院「臺灣太平洋研究中心」日文史料學術座談會，邀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研究員王學新先生主講，由周婉窈老師主持。
- 9月21日：臺大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討論會，日文系徐興慶教授主講：「解讀《東アジアの時代性》：兼談跨領域研究、國際共同研究如何可能」。
- 10月27-28日：本系與臺大文學院、臺大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蒙古國立大學外語學院、臺大圖書館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合辦「元代以來漢蒙的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 10月31日：臺大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討論會，人類學系謝世忠先生主講：「地域的融合與心域的跨越——北海道愛努族的境遇」。

### 三、專題演講

- 5月6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黃銘崇先生蒞系演講，講題為「也讀『天書』——晚商王朝政治地景的重構」。
- 5月18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吳莉葦先生蒞系演講，講題為「十八世紀的清朝是否為一帝國（主義國家）？反思耶穌會士敘事與中國傳統觀點」。
- 5月19日：黃富三教授榮退演講暨茶會，講題為「世界史中的臺灣史：學術生涯回顧」。
- 5月27日：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教授陳景修先生蒞系演講，講題為「19世紀在波士頓的亞裔美國人」。
- 5月30日：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羅新先生蒞系演講，講題為「說北魏孝文帝之賜名」。
- 6月9日：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許松源先生蒞系演講，講題為「從『六經』到『傳記』——蒙文通對經學源起問題的研究進程」。
- 6月22日：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勞悅強先生蒞系演講，講題為「思想史研究」。
- 10月6日：耶魯大學歷史系韓森教授（Prof. Valerie Hansen）先生應邀蒞系演講，講題為「絲綢之路新史」。
- 10月13日：前本系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杜維運先生應邀蒞系演講，講題為「文明史的展望」。

### 四、本系講論會

- 6月9日：童長義助理教授主講「功利思想儒者伊藤仁齋的《童子問》與其形成的時代——江戶時代學術與政治互動的一個參考座標」。





### 五、出版訊息

- 5 月：文史叢刊（140）廖宜方所著《唐代的歷史記憶》出版。
- 6 月：《臺大歷史學報》第 47 期出刊。
- 6 月：衣若蘭副教授專著《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出版。
- 7 月：《史繹》第 36 期出刊。
- 8 月：王世宗教授專著《必然之惡：文明觀點下的政治問題》出版。
- 9 月：《史原》復刊第 2 期（總第 23 期）出刊。
- 10 月：《臺大歷史系訊電子報》發行至第 47 期。

### 六、師生活動

- 5 月 17 日：夏國安系友返系座談。
- 5 月 24 日：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至本系舉行招生說明會，由該所所長梁其姿女士主持。
- 5 月 24 日：公告第五屆臺大歷史金品獎得獎名單：
  - （1）論文類（研究所組）：優等－林盈君、陳志豪；  
佳作－吳國聖、王萬雋、吳挺誌。
  - （2）論文類（大學部組）：優等－許潑；佳作－陳彥臻、范里。
  - （3）記敘類及創意呈現類：優等－徐柏涵；佳作－林昆緯。
- 6 月 4 日：2011 年歷史系撥穗典禮。
- 6 月 4 日：臺大歷史系三十年系友同學會座談會。系友陳銓鏐、林珮秀與王健文主辦，邀請鄭欽仁老師及黃俊傑老師與系友敘舊憶往。
- 6 月 7 日：公告 100 學年度博士班正取、備取名單，正取 7 名：傅揚、李佩蓁、高震寰、張銘、鹿智鈞、林慧芬、楊曉宜；備取 1 名：陳世芳。
- 6 月 16 日：博士生林楓珏、碩士生林盈君獲 99 學年度傅樂成獎學金。
- 6 月 16 日：第五屆臺大歷史金品獎頒獎暨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期成績優良獎頒獎。
- 7 月 4-8 日：臺大歷史系系學會主辦第九屆臺大歷史系史學營「Specific 史無前例」。
- 7 月：本校進修學士班部於 2011 年停辦，本系製作「一起記錄我們夜間部的四十年」紀念網站。
- 8 月：100 學年度起本系與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簽署校際選課協議（研究生適用）。
- 9 月 10 日：臺大歷史系 72 級畢業 30 週年同學會籌備會，由系友莊佩璋、張隆志與黃銘明主辦。
- 10 月 18 日：徐和謙系友返系座談。
- 10 月 20 日：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學位論文發表會。
- 10 月 26 日：雷晉豪（博三）、韓承樺（博二）、蔡明純（博四）三位研究生獲頒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 年黃彰健院士學術研究獎金」。
- 10 月 29 日：《史原》復刊第 2 期（總期 23 期）論文發表會。

